

571.71

5534

世界革命與蘇俄

佛勞林斯基著
董霖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M. T. Florinsky
董霖譯

世界革命與蘇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34641·2)

世界革命與蘇聯一冊

World Revolution and the U. S. S. R.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M. T. Florinsky

譯述者 董霖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目錄

第一章 世界革命的理論	一
這問題——共產主義的『宗教』——辯證法——列寧與世界革命——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	
第二章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狂風暴雨』時代	二六
十月革命後——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議——齊諾維夫的論文——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第二次會議——東方人民會議——蘇維埃政府與共產國際——列寧的警告	
第三章 低潮（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	六二
內戰的結局——轉變方針——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新時期的開始——新的失望和新的希望——共產國際第五次會議——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新定理	
第四章 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	一〇六
黨的鬭爭——爭點——三個問題——修正恩格斯的理論——帝國主義——列寧與托洛斯基——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新理論的重要性——托洛斯基的批評——齊諾維夫的態度——新國家主義	
目錄	一

第五章 新理論的國際意義……………一四四

最近的推論——中國革命——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共產國際的綱領——綱領的分析——帝國主

義的戰爭——第三時期——國家共產黨——共產國際

第六章 向合作之路……………一七七

第一步——經濟合作——外交——不侵犯公約——經濟的不侵犯草約——改造的問題——其他前進

的步驟——第三國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難

附錄……………一一二

譯者序

本書的著者是一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佛勞林斯基博士（Michael T. Florkin, Ph. D.）。佛氏對於蘇聯的內政外交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有極深刻的研究。沒有一個作者會把俄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思想上很重要的變遷，做一種比較完備比較具體的研究，這是佛氏認為最大的失望。俄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因為環境的壓迫，不得不把它的理論逐漸修正，由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轉變到斯達林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這世界革命的理論的轉變，是決定蘇聯最近幾年來內政外交的總關鍵。

佛氏認為共產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就是世界革命的理論，所以本書的範圍，只限於與世界革命問題有關係的理論和實際政策；其他關於共產主義的整個理論，蘇聯的對外關係，和俄國共產黨內部的分裂，都沒有詳細的敘述，除非與本書的題目有關係的部份。

全書共分六章，取材和論斷，都站在絕對客觀的立場，既不迷信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成功，也不無理性地反對它好像是毒蛇猛獸一般。這種嚴正的態度，我們可以引著者的一段話來證明：「一方面，蘇聯想以誠懇的堅決的努力，把俄國的羣衆從過去愚蠢、貧窮、痛苦、不幸的狀況中拯救出來，使他們變成有思想有知識的人類。我們覺得，他們想達到這目的所用的手段，似乎不健全和令人生厭。我們也許可以說他們的努力會歸於失敗。不過這目的本身——取消人類之相互剝削，設立一個沒有痛苦不幸的社會——就是反對共產主義理論的人也應該努力。過去十餘年間，蘇聯的政策，只在進行這目的，可是我們要複述一句，它的政策我們是不贊成的。」這是佛氏對於蘇聯和共產主義的觀察，也可以說是本書的結論。

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一切新思潮新主義如潮湧而來。什麼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法西斯蒂主義……都亂雜的貫注在青年的腦海中。一般不明瞭國情的人，把它們奉若神明似地去宣傳，這是多麼可憐而愚蠢的事情！不論那一種主義都有它的時間性和空間性，絕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去實引的。當斯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受了西歐和東

方共產革命的失敗的教訓——轉變了它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專心從事國內的經濟建設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偏偏如醉如狂地高唱共產革命，這是完全犯了革命的幼稚病。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的理論，還沒有深切的了解，尤其不清楚中國的歷史和環境，所以陷於嚴重的錯誤。

譯者是一個三民主義的工作者，翻譯這本書的原因有二：第一、蘇聯的國際政治的地位，尤其在遠東的勢力，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它的內政外交的措施和世界革命政策的轉變，對於中國都能發生絕大的影響。所以我翻譯這本書，以供國人的參考和探討。第二、國內有許多青年和工農分子，所以迷信共產主義的最大原因，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去澈底研究共產主義，只受了片面的麻醉的宣傳，不知道它的內在的矛盾，和許多迂腐的不健全的理論。所以我翻譯這本書，以供國人公開的研究，使他們自己得一個合理的結論。因為時間的短促——二十多天——譯文難免有晦澀錯誤的地方，還請讀者指正。

董霖，民國二十三年六月，於北平。

原序

一本論蘇俄的新書，倒需要寫幾句話來說明它。關於蘇聯的問題，許多作者都很注意一件事，謂從前的俄羅斯帝國如今給共產主義獨裁制統治了，但是，據我的識見所及，沒有一個作者曾把俄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思想上很重要的變遷，做一種比較完備比較具體的研究。我想這種疏忽的原因，倒由於完全正當的欲望，把注意力集中於蘇維埃統治的實際成功，同時為適應讀者的迫切要求起見，敘述一點可靠的最近的消息，使大家明白這偉大的社會主義的試驗是怎樣進行，它的成功已經達到什麼樣的程度。要答覆這問題自然也是一件巨大而專門的工作。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共產主義各團體思想上大變遷，甚至把馬克思列寧的教訓加以徹底的修改，關於這問題的學術上的研究，至今還沒有人注意到。但是，讀者如稍為考慮一下，便會感覺到思想的變遷是許多非常重要問題的原因，從蘇聯所遭遇的內政問題的觀點看來是這樣，從它居於國際政治

原動力的地位看來也是這樣。

蘇聯是個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國家，同時也受共產黨的統治。所以，假如我們要尋求蘇聯的內政外交的政策顯著的變遷，那共產黨的理論便佔了萬分重要的位置。我並不是說莫斯科政府讓純粹的理論來指導他們的活動。反之，在這本薄薄的小書裏，我打算說明共產主義的理論因為外來努力的壓迫，已經修正了不少。只要把馬克思、列寧和斯達林的教訓放在一起——因為自一九二四年後，斯達林已變成一個大家共曉的人物——研究他們的思想，和政治經濟的相互作用，然後能具體地知道整個的情形。我的題目，就是我認為共產主義最重要的理論——世界革命的理論。所以我打算專論這問題，因為這問題是蘇聯現時正在實行的經濟計劃和工業化，及其對資本主義國家改變態度的總關鍵。

本書不是把共產主義的整個理論作具體的研究，或者把蘇聯的外交作全部的調查。在本書內，理論和實際政策都提及，但是只限於與世界革命問題有關係的部分。我也不打算詳寫俄國共產黨的分裂，除了那部分對我的題目有點關係。雖然本書的範圍很狹小，但是於那些對於蘇俄的

革命，試驗無奢望而有較深刻與基本的觀念的學者，不無稍有補益。

我所討論的兩個要點——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 (permanent revolution) 和斯達林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 (socialism in a single country) ——在托洛斯基所著的不斷革命論，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après Lénine) 和俄國革命史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第三卷的兩篇附錄裏都有所討論，當最後的一部書出版時，本書已經完全寫就了。托洛斯基言論之富有趣味和歷史的價值，用不着我來介紹。不過他的著作的範圍和立場是與本書完全不同的。

我所根據的材料，除托洛斯基等人的著作不便找到俄文版以外，一概都根據蘇維埃官方的出版物。我時常引用列寧的著作，及蘇維埃和共產主義各團體，尤其是俄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各次會議的紀錄。

我深謝社會科學研究會 (Social Science Council) 及國際關係研究綱領的導師蕭威爾 (斯教授) (Director of its Program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 J.

T. Shotwell) 給我許多幫忙。他們使我能够於一九三一和三二年參觀倫敦、巴黎、日內瓦、布拉格 (Prague) 北勒斯勞 (Breslau) 和柏林的圖書館與科學研究院。假如沒有這次的參觀，我恐怕不能著成這本書。布拉格俄國歷史文件保管所 (Russian Historical Archives in Prague) 北勒斯勞東歐研究院 (Osteuropa-Institut in Breslau) 和日內瓦國際勞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in Geneva) 對我更有幫助。這些機關的行政人員的優待也令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蕭威爾斯教授和沈克何維夫教授 (V. G. Simkhovitch) 讀過我的原稿，並給我許多有益的批評。至於我所發表的意見，他們絲毫不負責任。

本書的大綱曾登載於一九三二年六月份的政治科學季刊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我感謝該刊編輯蒙那教授 (P. T. Moon) 准許我再用這樣的材料。

我也非常感謝馬法蘭先生 (A. E. MacFarlane) 之熱心改正我的文字。但是，假如本書還有不妥當的地方，他不該受責備的。

佛勞林斯基 (M. T. Florinsky)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序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世界革命與蘇聯

第一章 世界革命的理論

這問題

在歐洲大戰的期中，蘇聯（The 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 簡稱蘇聯）從俄國的帝國裏產生出來，這事情便引起許多新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有一件外國人不甚知道，然而對資本家們頗關重要的問題，就是俄國共產黨和蘇維埃的領袖們對於世界革命的態度有顯然的改變的問題。這問題決定了蘇聯的內政和外交的政策，而且也是近年來各種發展的關鍵，否則這些發展便感着困難。

大家都知道共產主義的最後目的是建設沒有階級的社會，永遠毀滅人類間的相互剝削，而把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主要信條置諸實行。要達到這偉大的目的，必須把這資本家剝削勞工階級，同時又會自己消滅的資本制度推翻。按共產主義的教訓，謂人類整部歷史，只是階級鬭爭，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鬭爭。這種鬭爭，自然會引起革命，由這革命裏又生出世界革命，其間經過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獨裁的過渡時期，以後人類便能過千年太平的日子。

但是，假如世界革命和推翻資本主義的世界這兩件事情，是迫切而又快意的話，那麼現時蘇維埃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合作的政策，應該怎樣解釋呢？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五年計劃，全靠輸入巨量外國機器，聘請許多專家和技術上的顧問。這些費用大部分以出口貨的收進來抵償，真的，前幾年間，國際貿易關係的發展，是莫斯科（Moscow）很關心的事情。這種種活動與共產主義所宣稱的以有效的方法來促進世界革命的意思相符合嗎？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幫助，來建設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又要把這些最能實現共產主義的甜夢的國家毀滅，這個事情是可能的嗎？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是不是出賣共產主義的呢？

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一九三三年俄國共產黨及其所支配的蘇維埃政府對世界革命的態度，與一九一七年十月至十一月政變後的幾年間，大不相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的教訓，經過多年的修正後，便煥然一新。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六次會議所採納的官方的綱領，就根據這修正過的教訓。這種修正的手續，斷非易事。在共產黨內曾有劇烈的鬭爭；而斯達林及其黨徒所得的最後的勝利，是由於驅逐黨內幾個重要的領袖以作代價。這次鬭爭，世界革命的理論佔着非常重要的部分。作者希望，把布爾希維克（Bolshevik）統治後的十五年間，這理論的發展做一個大綱，也許能夠使人明瞭蘇聯政府和第三國際政策基本的普通的意義。

共產主義的「宗教」

令人迷惑的神聖俄羅斯（Holy Russia），忽然生出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教訓，及鼓勵許多列寧的信徒以宗教的熱心，這自然會引起許多著述蘇維埃情形的人謂共產主義為一種新宗教。這話像其他空泛的概論一樣，也許是真實或錯誤；只看我們對宗教這個名詞所下正確意義是怎樣。

這話本來是根據那種不確實的假設，謂截至現在止，俄國人常是東方教會（Greek Orthodox Church）的忠實信徒。到底這話有沒有適當的證據，還是一個大疑問，因為蘇維埃政府在蘇聯境內打倒宗教時，毫不費力，所以許多作者說什麼俄國農民和智識階級的宗教感情時，必須加倍當心。

假如把宗教這名詞按普通的用法，如牛津大字典（註一）裏所下的定義，謂『人類認識神權的統治力，尤其是那個受人信服的上帝，及這樣認識在行動和思想上所發生的影響，』那麼我們馬上便知道這種比較法是不對的。共產主義的教訓，主要是在唯物的理論，什麼神權統治或上帝等觀念，都在摒棄之列，而且認為是庸俗的迷信。共產主義的行動範圍終了之處，正是宗教的真正範圍開始的地方。每個人必需渡過這種奧妙而又不能避免的境界，這界線把我們塵世的人和世外隔開。共產主義能得羣衆忠誠的全副精神的幫助，因為它允許他們將來有更好的生存，而資本

（註一）牛津大字典（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是現在世界上最詳盡精確的

主義的世界常見的不平等、苦痛、不快樂、卑鄙等事情都消滅了。但是，它對那種使男男女女放棄世上一切的安樂、滿足、快樂，以求他們認為永遠能得救的言論的力量，實無法對付。馬克思和列寧的唯物理論，與宗教的教訓，是訴諸人類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感；在這種深刻的和更基本的方面，二者實沒有相同的地方。

然而，從別方面來看二者的外表，共產主義和宗教的比較是很對而又有用。像許多有廣大社會性的運動，尤其是以少數富有組織的有錢的團體所支配的運動一樣，俄國共產黨非常成功地傳播它的教義，激勵它的信徒以宗教的熱心，這種熱心真可與早年的基督徒相比擬。它表示武俠的精神，對於不肯信從的人，絲毫不能容忍，這事情也可與宗教鬭爭最顯著的例子相比擬。它以非常殘暴的手段責罰黨的異端分子，這事情很像天主教的異教徒裁判所（Roman Inquisition），雖然二者的最後動機還是不同：共產黨處置黨內討厭的錯誤的分子時，完全照世俗的方法，可是異教徒裁判所的最後目的，是要拯救那般受死罪的男男女女的靈魂。像專制的命令一樣，俄國共產黨要給黨員以嚴厲的訓練，不但要支配他們的行動，而且也要支配他們的思想。在這種種地方，

無疑地，共產主義和宗教有很多相似。但是，一切普遍的社會運動，大抵都是這樣，舉個例說，美國的禁酒運動。

但是，現在蘇聯有一件事情，更表明共產主義與宗教有密切的關係。這就是已經發起的真正宗教的崇拜，把布爾希維克革命時最大領袖列寧的偉績，視爲神聖的東西。在赤區 (Red Squire) 列寧的墓前有人等了幾個鐘頭才得見他墳墓，像這樣的事實，是不易下一定的斷語。這般共產黨的遊客的動機，是否像革命前俄國的農民一樣，旅行了幾百里的路程，去參觀古寺的聖像，或者像現代紐約倫敦一般羣衆的心理一樣，徹夜不眠，忍着艱苦，只求見一次卓別靈 (Charlie Chaplin) 嘉寶 (Greta Garbo)，或世界上有超等力量的拳術冠軍。大家要記得蘇聯沒有什麼電影明星，而普通蘇維埃人民的生活是帶着灰色的。

但是，紀念列寧的普通態度，及各種外面的表示，假如可用幾種不同的解釋法，那麼他的著作對於共產運動的智識領袖們有至上的權威這事情，自然是不成問題。一般熟悉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人，也許會感覺奇怪，這次對世界革命的問題的激烈辯論，像蘇聯其他一切的討論一樣，全

靠大師（指列寧）的解釋法。蘇維埃領袖們的演講和著作裏，常常引證列寧的言論。他的著作的一點一滴有列寧格勒的列寧研究院（Lenin Institute in Leningrad）的專家們以宗教的熱心來搜集、研究、註釋。這整個精神，和討論的外表形式，分明是帶宗教的意味；而且像爭論宗教的教義一樣，共產黨對這種舉動，絲毫不能容忍而又很嚴厲。要證明什麼東西，只須說列寧曾有這意思。假如誤釋列寧的意義，便犯着異端之罪，結果就大受處分。在共產黨的討論裏，從來沒說過列寧有什麼錯誤，或者不能預見未來的發展。他的著作是一切靈感的來源，任何新的政治情形，都以他的著作為最可靠的嚮導。他的地位超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他是現世界和未來世界的先知。他是惟一的真理的源泉。

辯證法

這種行動的方法，及蘇維埃的領袖們的應用列寧的著作，是否與馬克思的辯證法——那種偉大的無可抵抗的共產主義的武器——相符合，還是一個大疑問。辯證法常與黑格爾（Hegel）

的名字連在一起，不過自經馬克思恩格斯應用之後，即有重要的變動；馬恩二人很審慎地指出，雖然他們常用黑格爾邏輯的方法及其特別的名詞，（註一）但他們是研究歷史發展的問題，這與德國的哲學家，的確沒有多大關係。辯論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很有趣味的，不過這問題是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外。我們如引證一點列寧對辯證法的態度，也許對我們有所補益。一八九四年，他所著的長篇論文，誰是「人民之友」，他們怎樣反抗社會民主黨（註二）對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有詳盡的討論。這篇文章以膠印器印刷了很多份，不過大半都已消滅了，後來蘇維埃政府又把它翻印出來。

列寧說：「關於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只知道這是社會學的科學方法，把社會當做一個有生命的，繼續發展的有機體（不是一種機械式的積聚，可以各種成分任意混合，）所以研究時，必須把那種影響社會形態的生產情形加以客觀的分析，並且必須研究生產的機能和發展的定

（註一）黑格爾的辯證法，是正反合。

律。」(註一) 據列寧的意見，凡人細心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一定會知道黑格爾的名詞與他們的方法，毫不相干，因為他們的方法是把「社會進化當做社會經濟形態有機體的歷史發展。」列寧叫他的讀者們記得，當馬克思發表初版資本論（用德文寫的）時，大部分德國的批評家都不能適切瞭解馬克思的辯證法，他們罵馬氏爲「曲解黑格爾的人。」爲辯駁起見，馬氏於第二版時，附錄一篇「結論」在那裏他引了一個俄國的著作家對他的方法的陳述。(註二) 據馬氏的意見，這篇陳述是精審翔實，我們做列寧的方法，充分引用原文。

這位俄國人說：「有一件事情對馬克思頗重要，這就是要發見他所考究的支配現象的律，這些現象的發展，是從一種形態到另一種形態，從一時期的社會關係到另一時期的社會關係。馬克思的主要成見，是以正確的科學的研究，來表明社會關係必然的情形，並且敘述詳盡的事實，作議論的出發點。他已經證明現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的）關係的必然性，同時他也證明一定有另一

(註一)前揭書，第九三頁。

(註二)歐洲的先鋒(European Messenger)第五號，一八七二年出版。

種這樣關係的社會形態，由從前的社會形態裏產生出來，不管人家相信或不相信，知道或不知道。馬氏把社會發展當做一種有機體的歷史的進展，不但受人類的意志、意識、目的的支配，反之，它會支配人類的願望、意識、目的。……假如意識的成分在文化史上佔着這樣次要的地位，那麼我們可以知道那種反對文化的批評，自然不能根據任何意識形態。換一句話說，這出發點不是什麼觀念，只是一種外表的客觀的現象。一切批評，不該以某種事實拿來與某種觀念相比較，但必須與另一種事實相比較。惟一重要的條件是：兩種事實都應該細心研究過，在二者的相互關係上，應該能夠代表不同時期的發展，尤其重要的是，對於整個已知的時期，及其結果，與各時期發展上的相互關係，也應該同樣細心研究過。馬氏特別否定過去的經濟律和現在的經濟律相同的理論。反之，某時期有某時期的律。經濟發展的現象是與生物學上的歷史相似。從前的經濟學家不懂經濟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律拿來和物理學化學的律相比擬。細心的分析，就能夠使人明瞭各種社會組織的不同，恰如各種動植物的差異一樣。從這觀點看來，馬克思決定他的問題是在乎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同時他把研究的目的化爲一個嚴密的科學的公式，每次研究經濟的發展時必須應

用它。這樣研究的科學意義，是在乎實行這種特別的（歷史的）定律，這定律是支配某種組織的出現、存在、發展、死亡、及其被別的高等的組織取而代之的問題。」（註一）

上邊的一段是馬克思認為敘述辯證法的最妙的文章，他說他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方法正「相反」。照黑格爾的說法，觀念的發展是決定實際的發展。馬克思則謂「觀念不過是物質的反映，」所以這整個方法可歸納為「積極瞭解現在及其必然的發展。」

簡單說一句，上邊的一段論辯證法的性質的權威的敘述，曾經得到馬克思列寧的贊同。社會主義者認為辯證法是他們無敵的武器，正確的工具，不但使他們研究過去和現在時能得到可靠的詳盡的分析，而且使他們預測將來百無一失。對於這種話，不管我們有什麼感想，但是我們可以知道，把辯證法很成功地應用於某種問題，實在不甚容易。列寧死前的最後一封信，論及他的同志對於馬克思的辯證法的技巧的問題，大可證明他自己的意見。他這封信是寫給蘇聯執行委員會，後人把它當做他的遺囑。他討論布爾希維克黨內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材，共產主義的理論最大權

（註一）列寧前揭書，第九三至九五頁。

威的作者布哈林(Nicholas Bukharin)的時候，他說：『布哈林不但是本黨內最有價值的最重要的辯證法家，而且應視為全黨內最可愛的人；但是他的理論的觀點不能認為是真正馬克思的觀點，因為他還帶一點迂闊的意味。我想他一定沒有受過辯證法的訓練，並且不能充分瞭解。』

(註一) 一個人既沒有受過辯證法的訓練，又不能充分瞭解它，然而這個人偏能做黨內『最有價值的最重要的辯證法家』，要明瞭這件事情，實與應用辯證法一樣困難。但是，假如列寧能夠再生，他一定會罵他死後的一切討論——他的名和著作佔着重要的部分的討論——為非馬克思主義的迂闊的討論，恰如他會罵那般識字不多的俄國農民對他的墳墓的禮拜為非常迷信一樣。

在我們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常常會見到共產黨還有一個特點。這是他們討論時，往往把將來的事情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們曾指出，有人以為馬克思的辯證法，可拿來預測將來的發展，而百無一失。至於馬克思列寧所最關心的資本主義的命運，他們斷定這制度一定消滅，『不管人家

(註一) 原文載在斯達林論共產主義布爾希維克黨右傾份子的反對第六三頁，吉斯斯基(Gaisinaky)與脫離本黨普通路線的人鬭爭第一七頁內曾引用此文。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三〇版。

相信或不相信，知道或不知道。」列寧的信徒相信資本主義崩潰臨頭，而且完全知道會這樣，所以他們老是愛談將來的事情，尤其是愛談最近的將來的事情，說時非常確信，但後來又很懊悔。利用未來的事情作政治上的討論，是有益而又有害的。它使人生出美麗的幻想，以為將來會過舒服的日子，尤其是這種好日子，可以一捉即到，或者近在身邊，使人避免現時不如意的情形，和忘記現時失望艱難。這些希望的失敗，預期的不能實現，正是相反的結果，如共產黨的領袖們由一九一八至二〇年的經驗，及其他各種經驗裏，逐漸知道這事情。

列寧與世界革命

以現時共產黨徒對於列寧的意見非常重視這點看來，在這時期我們能夠找一點列寧對世界革命的態度，也許有點益處。複述一句話，反對派的黨員時常引用他的著作。這可以證明，在革命的初期，他難免以過度的革命熱誠來鞭策他的黨徒。但是，對於過分的希望，他曾提出警告，布爾希維克的領袖們，很少能夠有這樣澈底的警告。

一九一四年，他說：「內戰時，無產階級一定參加——假如今天不參加，那麼明天便參加，戰時沒有參加，那麼戰後，或第二次戰爭時便參加——不但有成千成萬負責的工人，而且幾百萬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參加。他們現時都諂媚好戰的思想。因為戰爭的恐怖，不但不能使他們害怕，而且會給他們以鼓勵、教訓、組織、力量、準備，以便和國內外資產階級鬭爭。」（註一）

一九一五年列寧所著的反對柯祖基和他那一派的社會主義者一文，把這件事情說得更詳細。他說：「現時的狀況能夠維持得多久？前途會變成怎麼樣？會不會革命呢？我們不知道，人家也無法知道。只要革命的情緒增加，和最前進的社會團體——無產階級——肯決心行動，才能答覆這問題。「幻想」和沒有實踐這步工作，是毫無疑問，因為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時有一個社會主義者，肯負起這責任，保證革命會發生於這次戰爭，不是第二次戰爭，今日的革命情形，不是明日的革命情形。我們是說，每個社會主義者最基本的真正的義務，這義務是叫羣衆知道革命情形還存在，給他們解釋這種情形的深刻性和可能性，喚醒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和決心，幫助他們採取革命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十七頁。

行動，並且在現時的情形下，成立組織，以便實行工作。』（註一）

布爾希維克政變前三星期左右，列寧曾抱同樣的慎重態度。『我不知道明天或後來我們能否勝利。我個人以為明天我們會勝利——我寫這幾行時，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六日——奪取政權這工作，我們也許是太慢了；無論如何，明天是明天，不是今天。我們不知道這次成功後，西方各國到什麼時候才能發生革命。我們也不知道，這次成功後會不會有一段反動的過渡時期，被反革命份子佔優勝。』（註二）

一九一八年關於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 (Brest-Litovsk Peace) 的討論，列寧在他的言論裏，對於革命的情形，也有所勸告。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時，他複述他的勸告，因為那時候紅軍深入波蘭的京城，許多列寧的信徒，認為這次的勝利已經把資本主義，至少已經把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四二頁。

（註二）原文見第四次共產國際世界大會，退爾曼 (Thaelman) 曾引用於報告書和議決案的選集，第二一四頁。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

歐洲東部的打破了。

列寧說：『我們現在把革命危機的問題，當做我們革命行動的基礎，這裏我要你們注意兩種普遍的錯誤：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把現時的危機當做不如意的擾亂——引用英國作者雅緻的語言；另一方面，有的革命家要證明這危機絕對沒有影響。資產階級的行動像瘋狂的野獸一樣；錯誤越積越多，結果自己催促滅亡。這一切事情都是真的。但是你無法「證明」資產階級絕對不會利用一點小利來緩和少數被剝削者，或者利用少數卑鄙的被剝削者來壓服暴動或運動。要預先證明一種情形是「絕對沒有效力」，便是玄學或無益的空想。諸如此類的問題，只有事實是惟一真正的「證明」。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制度正經過很嚴重的危機。現在必須以革命黨的行動來「證明」該黨是有充分的組織和能力，以與被壓迫的羣衆合作，充分的決心和技能，以產生一個成功的勝利的革命。』（註一）

拉狄克 (Karl Radek) 於一九三一年寫一篇文章，謂列寧早已預料到無產階級和資本制

(註一) 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頁。

度有一度長期的鬭爭，在這時期裏常有國家革命和殖民地的暴動，不過要把東方的民主革命和國家主義的暴動，最後變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必須經過慢慢的長久的步驟。（註一）

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

世界革命的理論，自經過列寧的十月革命的重要同志，前任紅軍總司令，現時徒流於普林吉波（Prinkipo）這位不屈不撓的激烈的多才多藝的托洛斯基的精悍生動的文筆敘述後，它才有充分的動聽的言論。

在一九〇五，一九一七，及以後多年的革命事業裏，托氏的地位，舉世皆知，用不着再述。沒有一個俄國革命的領袖——縱使是列寧——能夠像他享受這樣大的國際名譽，尤其是他被困於土耳其時，得有餘暇致力於文學上的工作，使他能夠表現出非常能幹。無論他怎樣謙遜，他的才力誰也知道的。一九二四年的秋天，他已經開始與蘇維埃的領袖們破裂，那時候斯達林宣布一個新公

（註一）拉狄克：列寧的世界革命的理論。載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消息報（Izvestia）。

式或口號，『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這與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的理論，站在不可調和的反對地位。此後，蘇聯的領袖們逐漸努力奪取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地位。下章我們當述這次非常重要的辯論，它的結果決定蘇維埃未來內政外交的路線，和第三國際的政策，現在則僅述托洛斯基對革命發展的觀念。這並沒有說得過火，俄國在共產統治下的頭六七年間，國際上只知道共產主義的共同信仰，是『不斷革命』的理論。

這理論並不是很新奇。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沒有暴發以前，托氏已經創立這理論，不過他後來的著作更把它發揚光大些罷了。『不斷革命』的理論最完備最新的著述，就是一九二八年他沒有去土耳其前的幾個月間，在亞爾馬·亞塔（Alma-Ata）寫成的一部小冊子。（註一）為忠於馬

（註一）在托洛斯基初期的著作裏，關於革命發展的普通路線最重要的文章，是過去的成功與未來的展望。見我的革命（Nash revolyutsia）第二二四至二八六頁。一九〇六年，聖彼得堡版；又見一九〇五年這部書的導言，一九二二年版。

托氏關於這問題最詳盡的著述，可看他著的『不斷革命論』一九三〇年，柏林版。本書英譯本，是柴德曼（Stachman）譯的，裏面有一篇富有趣味的序文。一九三一年，紐約先驅公司版。

克思的辯證法，他覺得不斷革命是不贊成任何階級專政，不止於民主的階段，努力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與外界的反動相抵抗的革命，『這革命的後期，實隱伏於前期，結果是要取消階級的社會。』不斷革命的理論含有三種思想：（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便取消民主革命；（二）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社會便逐漸變動；（三）社會主義的國際性。這幾點都應該加以解釋。

不斷革命的基本觀念——社會主義革命時，必須消滅民主革命——托洛斯基實祖述馬克思。馬克思最初成立這偉大的原則時，爲的是答覆民主黨領袖們的辯論，他們相信，設立有意義的——就是民主的——政府，以和平的進化來解決一切社會的經濟的問題。照馬克思看來，一八四八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不過是進步到社會主義革命一個方法。這種希望全不實現，但是馬克思這次『錯誤』是事實上的，不是方法上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沒有產生民主的政府，反而生出資產階級專政。一九一八年德國的革命也是一樣，它真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它的失敗是因爲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掠奪的政策，結果，以民主的制度來掩蔽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俄國和別的國家內所謂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者，曾發明社會的歷史發展的理論，照這理論看來，每個社會遲早會達到民

主的組織，然後進一步成立社會主義。由民主到社會主義，有各種各式的說法。有人相信可以由和平的進化達到社會主義，又有人相信必需用激烈的革命方法。各派有一個共同的要點，就是這種革命是指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他們覺得民主和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上的兩個時期，不但分別得很明顯，而且相距也很遠。俄國社會主義黨的重要領袖蒲力哈諾夫（Plekhanov）謂現時俄國可實行社會主義這種觀念為荒謬絕倫。而現在俄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回顧一九〇五年的社會主義革命，甚至十月政變前的情景，都覺得好像『悠遠的未來的混亂音樂』一樣。

一九〇五年托洛斯基所修正的不斷革命的理論，與上述的意思完全相反。它表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對民主的希望，勢必達到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又不能不力行社會主義的政策。托洛斯基說，這就是他的理論的中心思想，與普通意見完全站在相反的地位。他宣稱民主和社會主義不但是歷史發展上兩段分別得很顯明的時期，而且是同一歷史發展上的兩個時期，有了前者，一定有後者。革命發展的『不斷性』（或永久性）就這樣成立了。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社會的變動成爲不斷革命的理論裏的第二個要點。因爲階級社會還存

在——這就是必需無產階級專政的理由——變動的手續不得不採取階級鬭爭這方法。所需的時間，不能預先決定，也許要很長的時期，內外戰事，及和平的進化，都是免不了的。這手續的本身，倒是很合辯證法，後期是由前期裏有機體地產生出來。這手續對於人類活動的一切範圍，如經濟的組織、技術、科學、家庭關係，社會習慣上都有很大的變動。這些變動因為是繼續不斷，而且發生密切的相互關係，所以使社會不能達到均衡的狀態。因此，革命的『不斷性』又被重視了。

在本書裏，對我們有特別趣味的不斷革命的理論的國際意義，是現代人類經濟政治的發展上的直接結果。現在世界各國是相互依賴的。恰如每個國家為國際市場而生產，而且受地球上最遙遠的部分的經濟變遷的推移一樣，無產階級的鬭爭，也是帶着國際的性質。真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由一國開始；但是，只限於國內，它休想得到澈底的成功——階級消滅。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局部的制度，雖然它也許是最後的，如蘇聯的情形一樣。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國內外的反對者勢必蜂起，假如幾個前進的國家得不到勝利的革命，那麼這個單獨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一定趨於滅亡。從這觀點看來，托洛斯基說：『一國的革命不算一個自制的單位；它不過是國際的連鎖中

的一個小環罷了。世界革命雖暫受挫折而低落，它卻是永久的在進行中。」

這種革命發展的計劃，不但是深入赤化教授們的腦海中的迂腐觀念。申說一句話，它是一個普通原則，曾經決定一個強國的政策。一九二四年前，托洛斯基的理論最受人攻擊的部分，是第一項，社會主義革命時，必需消滅民主革命。假如有人知道他所謂民主革命後接着便是社會革命的時期，那麼問題便發生了，什麼樣的社會團體，什麼階級起來負責行獨裁制的責任？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列寧所提出的公式，謂「工人農民民主式的獨裁。」托洛斯基謂這公式是「代數的」公式；它只說出被剝削階級與資產階級是站在不可調和的反對地位，但是它不能預先決定在獨裁的時期裏它們的相互關係。在革命獨裁的時期裏，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絡，歷史上倒沒有見過，這就是列寧所以有意把他解決的方法帶點普通的抽象的性質。農民的態度是「完全不得知道，」所以不能預測革命發展的正確途徑。那時候及以後的幾年間，列寧相信革命發展後，一定要創立強有力的富有組織的軍隊。一九〇九年，他說：「革命已經達到……這樣進步的時期，毫無疑問地必須創立一個富有組織的強有力的革命的農民黨。從反面說來，我們知道有的成人的主要器官，在

體質形式和發展的程度上，都很幼稚。」（註二）據托洛斯基的意見，一九一七年的事件，澈底證明農民不能創立這樣的黨，當危急存亡的時期，它應該受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領導。所以從資本主義至將來沒有階級的社會這過渡期間，惟一可能的獨裁制度，是「領導大批農民的無產階級獨裁制。」一九一八年，列寧似乎會接受這意見，他說：「整部經濟學，整部革命史，整部十九世紀政治發達史，告訴我們說，農民是聽從工人或資產階級。假如有人問我是什麼緣故，我便叫那般問我的人……去默想十八世紀，十九世紀重要革命的發展，或者二十世紀任何國家的政治史。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學是，統治的力量不是資本，便是推翻資本的無產階級。現社會的經濟學，實沒有別種力量。」（註二）托洛斯基指出這些話，是對落後國家的革命而發的——列寧所以引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當例子——它們完全取消「民主」獨裁的可能性。無產階級獨裁，是惟一可信的實際的方式。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一部，第二三〇頁。

（註二）前揭書，第十六卷，第二一七頁。

這個原則實際上的重要性，馬上可以看出來。一方面，它決定革命時的兩種成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另一方面，它表明蘇維埃政府和第三國際在別的國家，尤其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暴發的期中，應該遵從的政策。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要點，是指摘它忽略或不知道農民在勝利的革命中的地位。這些話實在沒有半點根據。在托氏的許多論文和演講辭裏，他常常注重農民在任何革命的暴發時的重要性。真的，好幾次他都說，革命運動時農民的熱心參加，是成功的主要成分。不過他也主張獨裁不可帶民主的性質，它不可把無產階級和農民連合在一起，反之，它應該完全在無產階級的掌握中。無產階級獨裁的一部分責任，是以教導的政策，得與農民合作。

據托洛斯基的意見，在國際的方面，不把無產階級獨裁的原則為惟一可能的方式，使斯達林和第三國際在組織、指導、贊助各國，尤其是東方革命的暴發等事情上，完全失敗。照他看來，最大失敗的例子，是莫斯科的共產黨對中國的政策，及中國革命的相繼沒落。

托氏主張不斷革命的理論的一切成分，組成一個完備的行動綱領，各成分是互為因果。無產

階級奪取政權，設立獨裁制後，它便進一步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整個推翻。不過一國家的社會政策，不能算做目標，它最少是使幾個前進的工業國家能發生革命，否則社會主義的社會便無法設立。所以這些政策不該去追求那些得不到的事情——就是，想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反之，可以利用它去達到世界革命這最後的目的。當內部的地位增強而又堅固時，已勝利的無產階級應該常常記得，這個目的能鼓勵它，並且好生處置國內的問題和各國的關係。要成立民族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而犧牲世界革命，不但是出賣共產主義，而且也是自殺的瘋狂的政策——看不清現時的情形，和世界上經濟政治的相互依賴——以致自陷於不能避免的沒落。這是不斷革命的一部分理論，使斯達林和托洛斯基於一九二四年秋天作激烈的爭論。

總而言之，不斷革命的理論，並不是沒有邏輯上的統一性和相當的重要性。托氏堅決地爲這理論奮鬥，他寧願做亡命客，不肯屈服於敵人之下。

第二章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狂風暴雨」時代

十月革命後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皇室顛覆後，同年十月（即西曆十一月）又有布爾希維克黨奪取政權，設立無產階級獨裁制。我們現在回顧二十世紀初期俄國所經過的多事之秋，就可以明瞭一九一七年的兩次革命——推翻專制，誕生蘇維埃——僅是同一歷史發展上的兩個時期，自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後（註一）俄國所發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情形已經充分準備這個革命。不過自經這事情後，就容易明白了。當一九一七年紊亂的時期，實在沒有適當的時間給人作歷史的分析；我們現在以為是某種歷史條件合乎邏輯的必然的結果，但在非常的大事變時，會使人莫明其妙。這次大事變，是連合大戰時一切破壞和建設的成分，毀滅舊皇朝，破壞根深蒂固的政治制度，農民暴

（註一）關於本書的作者對俄國革命的解釋，可參看夫羅林斯基的俄羅斯帝國的結局。一九三一年，耶魯大學版。

動的動搖人心，和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這話似乎有點矛盾，當一九一六年和第二年的頭幾星期，大家都希望和討論俄皇讓位的事情，但真正讓位時，舉國又非常驚異。因為事情轉變得頗快，舊時自由主義反對黨的領袖們，不能預見到，而又無法準備。來服親王(Prince Love)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任臨時政府第一次的主席，幾星期後，他很坦白地承認，這種事勢使他和他的同事們離本來的期望很遠。他說：『我們飄搖無定，好像狂洋上的一片廢物一樣。』(註一)

但是，假如我們覺得俄國自由黨的領袖們，在革命的時期像寓言中愚昧的處女甜睡未醒一樣，那麼這般後來做俄羅斯帝國臨時政府的革命社會主義者，也不見得有怎樣預備。戰前的革命社會主義者，自一九一四年六七月間的罷工後，差不多給帝國政府的壓迫運動消滅了。在戰爭時，他們的活動也很低落。大部分重要的革命領袖，或出洋，或坐牢。列寧在瑞士，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才回到彼得格勒。托洛斯基在紐約，比列寧後一個月回俄。據一位共產黨員勺來亞涅哥夫(Shlyapnikov)說，革命後頭二星期彼得格勒布爾希維克黨的全部工作，只有三個人在那裏進行。實際

(註一)前揭書，第二四五頁。

上是沒有黨的機關，沒有錢，沒有印刷機。尤其重要的是，各革命領袖間，完全缺乏諒解。社會革命黨，本來是代表農民的，現在與社會民主黨相爭，而社會民主黨的布爾希維克（多數黨）和孟雪維克（少數黨）兩派又有深刻的裂痕。就是布爾希維克黨中，也沒有一致的政策。列寧和托洛斯基的教訓，謂三月的民主革命後，馬上就有社會主義革命，很難得人的信服。舊黨的工作人員中，有許多人還是相信，俄國必須經過一段稍長的民主時期，然後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帝國一滅亡後，斯達林就發表這樣的主張，後來加孟涅夫（Kamenev）來可夫（Rykov）齊諾維夫（Zinoviev）也有同樣的主張，他們想列寧相信，除非先把英國和其他前進的國家的資本主義推翻，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難實行的。不過革命所解放出來的大力量，都是為布爾希維克運動努力。列寧在他的旗幟上所寫的口號，『即刻停止戰爭』，『一切土地歸還農民』，『已經被奪去的東西都奪回』（這就是說，把私人財產分配給工人）都是真正代表渴想土地，討厭戰爭的農民們被壓迫了好久的願望。自由主義者和中庸的社會主義者，讓位給十月革命的布爾希維克黨，恰如八個月前俄王讓位給他們一樣，毫不費力。新領袖們當統治這一個大帝國時，如他們的前輩一樣，感着很驚異，同時也

不知道到底應用什麼政策。就是那班在革命時佔了重要的地位，因而把持大權的布爾希維克黨，也不知道前途到底是怎樣。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希維克黨暴動時的主要領袖托洛斯基，很坦白地說出：『我們或者會久握政權，或者會被人打倒，現在實不能預言。』他有許多同事都公開反對他們認為鹵莽的，其實是自殺的步驟。

布爾希維克黨執政的初期，過着非常困難的日子，他們自然想得世界革命的救援。那時候，沒有人會懷疑，假如前進的國家遲遲不發生社會主義的革命，結果一定會使他們失去政權。但是他們所熱望的東西，似乎可以得到。戰事的大擾亂已經有三年多了，世界的財力有沒有耗盡？協約國和德國的軍人是否像俄國的兵士那麼疲勞厭倦？城市的工人豈不是過着空前痛苦的日子嗎？似乎很明顯的事情，世界快要學俄國無產階級的模範。一九一八至一九年的歐洲滿藏着炸藥，俄國革命的成功，恰如星星的火花一樣，會引起世界的大火。惟一應幹的事情，是向世界各國說，俄國因使用這方法，不但能脫離俄王，而且能脫離資產階級的剝削。這種議論是無可抵抗的，它一定會發生效果。

這是一九一八至二〇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普遍態度，那時候正與協約國美國所擁護的白色勢力作激烈的鬭爭，齊諾維夫很敏銳地把這時代革命的宗教的熱心叫做「狂風暴雨」時代。（註一）共產黨的領袖們相信一用武力來反對壓迫者的時候，全世界的革命工人一定會覺悟。他們既得這個使命後，自然有所響應，而這使命是由蘇維埃國家和第三國際轉遞給他們。

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議

蘇維埃政府統治後的頭兩三年間，直接鼓勵革命的政策，支配了一切國際活動。那時候，俄國因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的影響，及協約國的封鎖俄國，和內戰危急的時候協約國的擁護白色軍隊，致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俄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政策，並不是完全聽理論的指揮，大體上實由自然的結果。俄國的事情，使大不列顛、法、意和其他弱小的協約國，大受震動，她們覺得蘇維埃政府的摒棄協約國，實在有一點類似大逆不道。自一九一八年一月停戰簽字後，牠們對於俄國邊

（註一）齊諾維夫黨的布爾希維克化。載在共產國際第一期第三頁，一九二五年版。

境的一批一批革命宣傳品，想盡方法來防範。完全過分估量革命宣傳品的效力，是這時期的特點。在全世界深受戰爭震動的時候，在帝位制度崩潰，和疆界的一再變換，引起國家和社會上非常反對的當兒，不但布爾希維克黨會相信革命宣傳品是最有力量的武器。另一方面，那時候沒有一個歐洲的政治家會承認蘇維埃政府能夠維持到十五年；它是完全不穩定的。我們知道布爾希維克黨自身也覺得前途很渺茫。歐洲各京城的人都相信，只要有人能使國內的羣衆不受巨毒（指革命宣傳品）的渲染，他們的統治實不能維持得久遠。布爾希維克黨最直接的、最積極的宣傳品，在俄國邊境的一方面是給人家認為主要的危險物，另一方面又被認為主要的武器。

重要的蘇維埃團體中，對於世界革命一定來臨這種堅決的信仰，可以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議期間，布爾希維克黨關於這問題的討論來證明。蘇維埃的全權代表，在先有越飛（Толст），後來又有托洛斯基，自由利用這和議，當做特別的機會，向德、奧、匈、保（保加利亞），土諸國討厭戰爭的人民作革命的宣傳。列寧的審慎的態度，正與那般所謂左派共產黨和托洛斯基的意見相反對。左派共產黨主張神聖的戰爭。他們覺得那時候歐洲的情形，特別適宜促進世界革命並且把奧

德的罷工當做無產階級暴動的初步。據他們的意見，世界的革命不但成熟了，而且已經真正開始。他們知道俄國自然要準備參戰，但是他們相信，紅軍的支隊碰着德國的軍隊時，他們不會打仗，反而手攜手地與全世界資產階級宣戰。左派共產黨們很希望那種所謂『戰壕的和平』這就是說，戰壕中的德國兵士和他們的俄國敵人相友愛。據他們的意見，這才是達到共產黨真正目的惟一的方法。至於與德國帝國主義者單獨訂立和約，不但使列寧不得遂其主張，而且是咀咒俄國和世界的革命滅亡。

托洛斯基雖然也相信左派共產黨的議論所根據的原則，但是他從這原則裏得到不同的結論。他的結論是這有名的公式，『沒有戰爭，沒有和平』這就是說，要宣布停止戰爭，解散軍隊，不要與敵人作什麼和議。這政策是根據德國不敢進攻俄國這觀念。人民委員會正式承認它，但因列寧的反對，致和議決裂。托洛斯基深信演講的宣傳價值，就是德國兵正在進攻俄國時，他還這樣堅信。左派共產黨努力擁護他。布哈林 (Bukharin) 說：『我們主張，俄國革命或者進展，或者給世界帝國主義毀滅了。』因此便生出這種意見，謂俄國革命的利益，應該為世界革命而犧牲。取消俄國革

命也許會達到這高尚的目的。洛莫夫 (Lomov) 說：『我們的失敗，也許能幫助西方的革命發動起來。』另一方面，保護俄國革命政府的人說，這種政策也許有害於世界革命。布哈林說：『我們因救護社會主義共和國，便失去促進世界革命的機會。』（註一）

德國政府堅決的態度，德國軍隊的速進俄境，迫近彼得格勒，使俄國不得不放棄從前的政策。自接到德兵佔領特明斯克 (Dvinsk) 的消息後，執行委員會以七對六的票數，決定無條件地聽從中部各國的要求。因此，他們放棄從前『沒有戰爭，沒有和平』的政策，和神聖戰爭的提議。和議一開始時，列寧因事情的危急，同時也因這樣才使革命根據地的布爾希維克的俄國免於毀滅的惟一方法，所以他主張接受德國的要求。這可以證明蘇維埃領袖們一般的思想，雖然在列寧的權威下，他們最初還不接受這意見，後來只因德國武力的威脅，這才接受。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蘇維埃政府贊同德國的嚴重的條件，到三月三日，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簽訂了。那時候，彼

（註一）俄國社會民主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報告書，第三十號，列寧研究院出版。前揭吉新斯基的書，第二三至二四頁曾引用它。

得格勒和莫斯科（三月十一日政府遷移莫斯科）的人都相信，這條約不過是一種廢紙。後來這期望果能實現，雖然不像俄國預期以中部國家的共產革命來取消這和約，而是因德國軍事上的失敗，把這和約取消。真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停戰，曾有這條件。

列寧因主張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政策，使國家得以存在，此後人家便認為這是他的最大功績之一，而且很明顯地表現他的政治天才。那時候，他的確比他的同事們對於政治的實際情形，更有敏銳的觀察。因為他們只知道世界革命是解決目前的問題的惟一方法。

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的簽訂，不但使蘇維埃政府免於毀滅，而且給它一個機會，得在中部歐洲作深刻的革命宣傳的運動。這些活動的中心點，是在柏林的蘇維埃使館，領導的人是革命專家越飛。此後，蘇維埃的公使宣稱，推翻德國的帝國政府，一部分實由他的功勞。（註一）他這樣活動，所以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他和全體職員被逐出柏林。直至一九二二年，才與德國復交。

（註一）西方生活（*Vestnik Zhizni*）第五號菲雪（*Fisher*）著的在世界事件裏的蘇維埃第一卷第七頁曾

齊諾維夫的論文

除越飛在柏林的短時間任務外，直至內戰終了時——這就是說直至一九二〇年秋天——蘇聯實際上還與外國斷絕關係。在這整段時間，莫斯科和外國京城間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布爾希維克領袖們的心裏常常關懷國際事情，同時他們也富有國際的觀念。對世界的事情有這麼深刻的興趣，不但因為資本主義的國家的敵對態度及其不願承認蘇聯的存在所促成，而且因為俄國的新當局們堅信先進國家的革命是最近將來的事情。這種信仰，在前任第三國際主席，後充俄國共產黨重要領袖的齊諾維夫的言論裏，有強有力的說明。他的名譽與所謂「齊諾維夫的信札」有關，這封信在一九二四年英國選舉時，佔着重要的地位，不過它的真實性還是不能斷定。他後來行動的變化，最後的完全失勢，和近時的被開除黨籍，對於從前已得的權威和重要地位，毫不減少。假如因為將來他不能得高位，把他在一九一九年言論的價值減少了，好像因為托洛斯基於一九二八被放逐至土耳其，就否認十月政變時他的地位，或者因為喬治·魯易 (Joynd George) 英首

相)之聽從一九三一年的國會,便這樣估計他在大戰時當領袖的資格一樣的荒謬。

據說有一次喬治·路易曾說過齊諾維夫的演講是他的勁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選舉運動時,他的言論的記錄,很可以反映出他的苦衷。大不列顛前任首相這種悲觀的論調,齊諾維夫也很同意。大家須記得,共產主義是有科學的理論,它的政策是根據客觀地公正地研究現存的情形;所以它比其他一切制度下政治經濟的理論都佔了極大的便利。不過對於這種主張的證明,齊諾維夫是沒有什麼貢獻的。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共產國際的新代言人在莫斯科發表了一種刊物的創刊號,這刊物叫做共產國際(Kommunisticheski International),同時用幾種文字發表出來。出刊的目的,由這雜誌的名稱和那張表現工人破壞束縛地球的鎖鏈的封面,可以想見。在這世界革命機關報的創刊號裏,齊諾維夫寫了一篇文章論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註一)這個代表時代的有特點的宣言,倒是富有趣味。

(註一)齊諾維夫: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載在共產國際創刊號,第三七頁,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莫斯科·彼得格勒版。

齊諾維夫說：「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產生了，更正確一點說，這個嬰孩實在於一九一八年產生……那年五月，俄國布爾希維克黨完全奪取政權，已經採用俄國共產黨這個名字，幾個月後，那個已有光榮的歷史的德國的斯巴達卡斯運動（German Spartacus Movement），也使用德國共產黨這個名字，每個革命家都知道第三國際已產生了。一九一九年，我們不過正式追認既成的事實……我們現在執筆寫這幾行文章的時候，第三國際已經有三個蘇維埃共和國——俄、匈（匈牙利）、巴（巴維利亞）——當做它的基礎，但是當這篇文章拿去付印時，我們不只有三個，而且有六個以上的蘇維埃共和國，對於這種奇蹟，大家也不會驚異。舊歐洲迅速地趨向無產階級革命……上邊我們假定歐洲的革命運動只限於「民主」的勝利……這種假設與事實完全相反。現在我們都知道歐洲的運動的進展比莫斯科第三國際會議裏最樂觀的人所預料的還快得多。匈牙利資產階級的「退讓」並不是局部的發展。它是這時代最特別的象徵。從歷史的眼光看來，整個歐洲的資產階級都開始退讓。德國共產黨的勝利是不能避免的。在最近的將來，也許有所失敗。但是最後的勝利是屬於赤色黨；這種勝利，也許是下月，或下星期。運動進展

這樣快，所以我們敢堅決地說，十年內共產主義已經用不着在歐洲奮鬥了，因為在這一年間，整個歐洲將變成共產黨。共產主義的鬭爭，將移至美國，或亞洲及世界上其他的部分。

「從地理上說來，無產階級革命是由東往西移。這種趨勢現在已明確地成立了。土耳其最近的事變很充分地證實這趨勢。共產主義在俄國得到首次的勝利，因為俄國的資產階級比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更怯弱更沒有組織……爲什麼法意兩國的資產階級現在最有武力呢？因爲法意兩國的資本家沒有損失什麼東西。他們惟一的門路，是與俄國兩國絕交和宣戰。他們要激起德國來反對俄國；簡單說一句話，他們想請人幫忙。

「或者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幾年內，美國的資本主義與歐洲的共產主義能同時並立。或者在這一兩年內，英國的資本主義與整個歐洲大陸已勝利的共產主義能同時對立。不過這種同時存在，不能維持得很久。用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時報 (Le Temps) 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的美國與共產主義的歐洲是不能並立的。真的，片刻也不能並立。不過在過渡的時期，如上邊所述的情形的可能性，是不能避免的。

「無產階級獨裁是當今整個文明世界的秩序。我們現在的一切失望，與幾個月後所得的大勝利相較，實在算不得什麼一回事。第三國際的基礎是奠定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沒有一種建築比它更耐久。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下，勞工階級在整個世界都勝利。」

其他布爾希維克的領袖，也發表一點與齊諾維夫相同的意見。布哈林說：「現在完全知道，目前凡是大戰爭，遲早一定會發展到世界大戰；凡是大革命，一定會影響到全世界，取得無產階級的同情，奪回帝國主義的武器，以發展到世界革命。在現時世界經濟及其相互依賴的情形之下，各國——資產階級有組織的團體——是相互依賴的，所以一個國家內的鬭爭不能單獨成功，假如其他文明國家裏同樣的戰鬭員是不能勝利的話……工藝上的必需品如很方便時，我們的經濟發展毫無疑問地會往前邁進。這就是在前線的我們的問題，同時也是世界革命發展的問題。」（註二）齊諾維夫和布哈林這些宣言，很正確地反映出一九一八至二〇年這一時期內蘇維埃領袖們普遍的態度，這種態度因設立第三國際及第一第二兩次會議時的討論和政策裏，得以發表出

（註二）布哈林：俄國無產階級獨裁與世界革命。載在共產國際第四號，第四九一至九二頁，一九一九年八月版。

來。大家須記得，齊諾維夫在世界無產階級新軍事組織中，是當主席，同時也是重要的領袖。

第三國際

第三國際或共產國際並不是一個新組織。它的前身是馬克斯和恩格斯在倫敦所成立的第一國際（一八六四至七二年）和一八八九年所產生的第二國際。據蘇維埃領袖們的意見，第二國際已於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的時候取消了。共產黨相信第二國際完全沒有盡它革命的使命，它由一個促進無產階級反對壓迫者的組織，降為資產階級的忠僕。因此共產黨只想從第一國際得到鼓勵和指導。一九二〇年七月第三國際開第二次會議時所採取的法令的普通原則，就是根據一八六四年倫敦國際（即第一國際）的法令。它宣稱：『勞工階級的解放只有勞動階級自身才能夠得到；工人為解放而奮鬥時，要努力不產生新的特權和壟斷，只須造成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把一切階級的統治都取消了；工人在經濟上依賴生產手段的壟斷者，是一切奴隸，一切社會罪惡，一切精神上的墮落，和勞工階級在政治上的無能的主要原因；工人經濟的解放是最大的目的，一

切政治運動只是達到這目的的手段；截至現在止，爲這目的的一切企圖都是徒勞無功，因爲一國裏各種工人既沒有團結，而各國間的工人又缺乏聯絡；勞動的解放不是局部或一國的問題，而是一切國家都有關係的社會問題，這問題的解決，必須使各先進的國家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有所合作；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歐洲工業國家的勞動運動同時復興，一方面引起新的希望，另一方面警戒我們不要再蹈覆轍，同時把一切運動團結起來。」（註一）第三國際鄭重地宣稱這是它的目的，並且答應使一八六四年那般前輩所幹的事業得到最後的勝利。

但是，假如共產國際的目的是與它的先輩相似，並且是從過去遺留下來，那麼它目前爲取消資產階級所遇的戰略問題，從前並沒明白的限定：第一國際在那種完全不同的環境下所過的短時期的經驗，是得不到什麼指導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國際第一次會議時，關於組織的問題，並沒有嚴密的考慮。複述一句話，這次會議正在內戰期間，那時候俄國蘇維埃的團體內還沒有堅決主張最少有幾個前進的國家會發生共產革命這思想。當勝利快要實現的時候，誰肯計劃延長關

（註一）共產國際第二次會議報告書第六一九至二〇頁，一九二一年彼得格勒版。

爭的時間？我們上邊所引的齊諾維夫的論文，就在這時期發表出來。歐洲好像一個火藥庫一樣，隨時都能夠暴發。只要燃着導火線，那各處已經準備的世界革命便會暴發起來。那時候，共產國際還是很幼稚，而俄國一般的情形，都很適宜草創將來一定的計劃。

共產國際第一次會議，把它的活動限於最簡單的革命宣傳。齊諾維夫說過，共產國際產生後的第一年，只是做革命宣傳的機關，把共產主義的思想傳播給民衆。（註一）他相信這事情是那時代的大收穫。第一次會議發表一篇告世界無產階級的宣言，在這宣言裏，黨員們再宣誓聽從七十二年前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裏所定的原則。它主張馬克斯對於資本制度迫切的崩潰的分析，已由歷史發展上的正確路線證明了，雖然最後的鬭爭比世界革命的信徒所預料的還慢些。但是現在已臨頭了。新國際的目的是要盡力使共產主義迅速地得到最後的勝利。（註二）在另一篇告世界工人的宣言裏，這會議主張在一年內整個歐洲會受蘇維埃的統治（註三）無產階級獨裁和設立蘇維埃式的政府，是使世界避免新的世界大戰的恐嚇的惟一方法，因為戰爭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註四）這種議論得到一九一九年歐洲厭惡戰爭的人的響應。它預先斷定國際聯盟的組

織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革命的神聖聯盟。」（註五）國聯是社會主義黨所採取的計劃，爲的是聽從資本主義雇主們的命令，捨棄共產主義的羣衆，來擁護反革命。工人只信託自己的領袖。我們與資產階級毫無妥協的餘地，反之，只在莫斯科政府和莫斯科國際的領導下，爭取最後的勝利。

共產國際第二次會議

雖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不能把革命的頭幾個月的高尙的希望置諸實現，那年

（註一）前揭書，第一九三頁。

（註二）共產國際宣言，載在共產國際創刊號，第六至七頁，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版。

（註三）前揭書，第十二頁。

（註四）參看共產國際第二號，第一五四頁，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版。

（註五）第一次會議所接受的關於國際情形的議決案。載在共產國際創刊號，第一一五頁，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版。

第二章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狂風暴雨」時代

七月共產國際第二次會議時，它的思想與第一次會議並沒有重要的差異。有幾個明顯的理由能令人樂觀。蘇聯在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的反對下，居然能夠維持下去。內戰雖沒有停止，但也快會解決了。反對波蘭的運動，是最有希望的。當十月政變後，沒有人會相信能夠有什麼成功。國內的困難還是很大，糧食的情形一天壞似一天，國際的情形雖然比頭一年好些，但是也說不定。把資本主義迅速地推翻這希望，也是無法實現。世界革命比最初所期望的還來得慢些，但是大家總以為它快要實現，並且把蘇聯內部一切困難都解決了。

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開第一週年紀念會時，列寧曾討論着國際的前途的問題。據他的意見，共產國際在成立後第一年間已做了不少事情。他覺得當大戰告終的時候，一切情形都最適宜社會主義的革命。只因歐洲的無產階級沒有團結，尤其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們的叛變，致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實現。他說：『假如（第二）國際不在那班把資產階級從危急的時期救回的叛徒的掌握中，那麼許多交戰國與幾個中立國裏都有好機會，戰爭完了，接着便是革命，其結果大不相同。』然而，事情並不是這樣，所以各國也許要走俄國自一九〇五至一七年的

革命所經過的路線，假如它們要知道怎樣領導無產階級的羣衆的話。(註一)

列寧這種很莊重的態度，對於共產國際第二次會議的工作上，並不是沒有效力，雖然大家對世界革命的熱心已經很明顯。關於這次會議時的一般空氣，齊諾維夫會有生動的描寫。那時候紅軍正迅速地進展到華沙 (Warsaw)。會議場中陳列了一張俄羅斯波蘭的地圖，軍隊的進展圖上都有標記。齊諾維夫說：『每天早晨，許多關心的代表們擠着地圖的前面，國際無產階級的代表們更聚精會神地注意我們的軍隊的進展，大家都懂得軍事上的成功就是催促國際革命。大家都知道那時候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運命，實際上是靠紅軍的前進。』(註二) 在這種情形下，世界革命當前的問題，自然是各代表們所最關懷的。

但是，現時政治上的實際情形，使他不得不退讓。齊諾維夫坦白地承認一年前他對革命的熱

(註一) 列寧：第三共產國際。載在共產國際第十號，第一四五三頁，一九二〇年版。

(註二) 齊諾維夫關於共產國際的工作的報告，載在俄國共產黨第十次會議的報告書，第一八七頁，一九二一年彼得格勒版。

心未免有點過火。參看上邊我們所引的言論，他說他對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估計，也許太短促。要創設共產國際所統治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不像他原來所預料的一樣是幾星期或幾月間的事，而是要二年或者三年。這就是一九二〇年夏天他所願意說的話。（註一）

共產國際第二次會議時，列寧很有力地提出他的理論，謂那些在戰後已經開始發展的落後的國家，並不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假如前進國家的蘇維埃政府肯用全力來幫忙，落後國家裏已勝利的無產階級肯做富有組織的宣傳運動，這個階段完全可以免去。列寧宣稱共產國際的責任，不但要在殖民地創立共產主義的組織和教導它們以公正的精神，而且要給落後的國家以理論的基礎，使它們能夠運用政策。這理論的基礎，就是使殖民地的國家直接達到共產主義，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的原則。（註二）第二次會議的議決案裏曾有這原則。

會議的大部分時間是拿來討論共產黨中央集權是與資本主義鬭爭必要的初步的問題。齊

（註一）共產國際第二次會議報告書，第十六頁，一九二一年彼得格勒版。

（註二）前揭書，第一一〇至一二〇頁。

諾維夫自說過一九一九年的共產國際是革命宣傳的團體後，宣稱共產國際須改爲「國際無產階級的軍事組織。」第二次會議的職務，是要把第三國際變成一個鬪爭的團體，不但能夠傳播共產主義的思想，而且把這思想真正實行出來。他說，第一國際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機關，打算統制指導每次經濟上的罷工。在現時的狀況下，勞工運動已經變成世界生活最大的成分，這樣嚴格中央集權自然不能實行。在另一方面，第二國際的組織太散漫，中央毫無真正的指導和統計。齊諾維夫用黑格爾的公式來說，它們（指第一第二國際）是「正」和「反」。第三國際應該是「合」，是整個歷史發展的程序上的最高點。它應該是行動的國際，無論和平或暴動的時期它應該做鬪爭的工具，那部分已經覺悟到歷史的使命而又願意爲它奮鬥的國際無產階級，更應該努力。（註一）

在後來的辯論會裏，齊諾維夫宣稱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全在領導羣衆，不要等羣衆來推動它。他說：『我們已經等了好久。勞工階級已經等了好久。殊死戰的時期現在已臨頭了。』（註二）

（註一）前揭書，第一九四至九六頁。

（註二）前揭書，第三二四頁。

這種思想在第二次會議及其所採取的第三國際的法令裏發表出來。有一條議案說共產國際是世界上革命的無產階級集中的意志。它的使命在乎組織全世界的勞工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設立共產主義制度。第三國際是軍事的團體，它應該聯合世界上革命的力量。（註一）

法令第一條給共產國際的目的的下一個精密的定義：『新國際勞工同志會是為各國無產階級的共同目的而成立的，他們的共同目的，在乎推翻資本主義，設立無產階級和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獨裁制，毀滅階級社會，走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第一個階段。』（註二）該法令的序言把這話說得更詳盡：『共產國際的目的，是以一切有效的方法——包括武力——來推翻國際資本主義，設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以達到國家完全消滅。』（註三）無產階級獨裁，加以蘇維埃式的政府，是使世界免卻資本主義制度的威脅的惟一方法。第二次會議發表一篇宣言，鄭重地宣稱

（註一）前揭書，第六〇四頁。

（註二）前揭書，第六二一頁。

（註三）前揭書，第六二〇頁。

「共產國際以蘇聯的主張爲自己的主張，國際無產階級非達到蘇俄會變成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聯盟裏的一員，定不停止作戰。」（註一）

將第二次會議及其議決案裏辯論的一般趨勢拿來看一下，大家就能明白它們在本質和語氣上都與第一次會議沒有很大的差異。那時候還在布爾希維克革命「英氣勃勃」的時期，大家雖不敢說共產主義的國家就在明天，但最近的將來總能實現。齊諾維夫承認共產國際第一第二次會議沒有把現在的情形估計得很正確。每次勞工的騷動，每次罷工，都以爲資本主義末日的最後鬭爭已經開始。但是爲擁護第二次會議所成就的理論工作起見，齊諾維夫承認它的領袖們的一般態度大抵與一九一九年三月時相同。開會的時候，還有人堅持世界革命是很迫切的信仰。（註二）直到一九二一年，它才肯承認這些希望都失敗了。

（註一）前揭書，第六四七頁。

（註二）俄國共產主義布爾希維克黨第十一次會議報告書，第一八七至八八頁。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版。

東方人民會議

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巴庫 (Baku) 所召集的東方人民會議，是實踐當時俄國共產黨一般思想的重要事業。關於推翻資本主義，列寧很重視殖民地 and 落後的國家的地位。資本主義箝制殖民地的能力是非常薄弱，因為殖民地反抗外國壓迫者的暴動，很容易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我們知道齊諾維夫曾宣稱「從地理上看來，無產階級是從東方向西方移。無產階級革命這種趨勢現在已經確立了。」同時拯救世界的人也是從東方來的。

一個蘇維埃的著作家討論俄國所處的特殊地位，謂俄國是歐亞兩洲間清算處 (Clearing house)。姑引赫參 (Herzen) 的名言，謂「歐洲人以爲俄國是屬於亞洲；亞洲人以爲俄國是屬於歐洲。」這就是俄國在舊時俄皇統治下所處的地位，在歐洲她充國際的警官，在亞洲她又實行歐洲帝國主義的政策。這種情形就在布爾希維克革命後還存在，雖然俄國現在的地位是與從前的大不相同。資本主義的歐洲以爲她是「亞洲布爾希維克主義災禍」的發源地，而東方的人又以

爲她是歐洲共產主義革命思想的產生者。(註一)東方社會關係的非常複雜，封建制度和氏族家族組織的存在，正是共產主義的領袖們認爲最有希望的地方。

第一步工作是要向東方的人民證明蘇聯不像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她是他們真正的朋友，她很關懷他們的福利，自己並不貪什麼東西。一九一九年六月蘇維埃政府遞一張照會給波斯，把波斯從前向俄羅斯帝國政府所借的債務一律取消，俄國租界也歸還，俄國在波斯所有的銀行、鐵路、電力廠等都讓給波斯的人民。一切條約也取消。加拉罕 (Karakhan) 替莫斯科的政府簽訂照會後，鼓勵波斯要英國給它以同樣的「報酬」。對於其他亞洲的人民，蘇維埃也採取同一的態度。當這基礎工作做完後，共產國際就進一步把亞洲各國組織起來以抗歐洲的壓迫者。它的最重要的步驟，是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巴庫所召集的東方人民會議。

這會議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召集的。到會的人共一千八百九十一位，代表三十二個國家。大家一致推舉齊諾維夫爲主席。這會議討論一般政治情形，國家、殖民地、農民、蘇維埃東方政治

(註一)沙發路夫 (G. Safarov) 東方與革命。載在共產國際第十五號，第三一九〇頁，一九二〇年版。

部，和組織的問題。齊諾維夫和拉狄克宣布開會，叫大家與協約國的帝國主義政策鬭爭，叫東方被剝削的羣衆對外國暴虐的待遇作神聖的戰爭。齊諾維夫說，據他的意見，東方還沒有到共產主義的時期，所以共產國際現在願意與國家社會主義和革命分子合作，同時也幫助東方人民很薄弱的共產主義運動。

雖然該會議得到俄國共產黨的熱心贊助，通過他們所提議的關於軍事上的議案，內含農民問題的議案，要求無條件地取消不動產和一切封建的特權，並且擁護蘇維埃爲東方國家而設立的政治部，但是共產國際的成功並不像最初的期望那麼圓滿。它不久便發覺會員間分爲兩派——共產主義的代表和大部分沒有黨派的代表。據齊諾維夫呈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書說，那些沒有黨派的代表內含有真正沒有參加任何政黨的代表，如農民和都市裏半無產階級的代表，同時也有一班自稱沒有黨派，實際上是代表資產階級的人物。有一個土耳其的教授而又做『團結與進步』派的代表宣稱他們對俄國惟一的要求，只是武力。齊諾維夫問，土耳其人知道布爾希維克到底是什麼東西，安佛巴札 (Enver Pasha) 答道，土耳其人說：『布爾希維克是英國

的敵人。」齊諾維夫再問「布爾希維克與資本主義和地主鬭爭，他們對這種事情有什麼感想」答道：「這種事情土耳其人不感興趣。」

這會議決定設立的永遠的組織，不消說是失望了。本來想設立一個能夠統制東方一切蘇維埃的組織，同時又可以充中央執行部和審判處的提議也失敗了。因此這會議決定組織一個「東方人民宣傳行動會」它的職權沒有明白規定。會員共四十五人，打算最少每三個月在巴庫開一次會。但是從一九二〇年後，再沒有聽見這種消息。（註一）而東方人民會議會正式稱爲「第一次會議」以後沒開第二次會議。東方的革命恰如西方的一樣，是慢慢地實現的。

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們對於遲延革命的原因，等了好久才能同意。一九二〇年十月齊諾維夫在哈萊（Haile）德國獨立黨的會議演講時，他注重第三國際對於東方革命的重要性。『馬克斯會說歐洲革命如沒有英國參加，就等於在茶杯裏起颶風，我敢說無產階級革命如沒有亞洲參加，就不算世界革命……在巴庫會議時，我們發現過去無產階級運動缺少了一個成分。亞洲的被

（註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報告書。載在共產國際第十四號，第二九四一頁，一九二〇年版。

壓迫羣衆應該醒來……我應該承認：在巴庫的時候，我看見幾百波斯人和土耳其人連合起來唱『國際歌』，我不禁爲之落淚，並且認識世界革命的空氣。是的，這裏我要着重說一句，那種情形不是歐洲的，而且是世界的革命。現在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人都起來反抗資本主義。』（註一）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領袖們間不久便會採取更嚴重的態度。

蘇維埃政府與共產國際

公開宣傳世界革命思想這政策也有不利的地方；蘇維埃政府由多年的經驗才得到這教訓。大戰一終了後，協約國第一步便封鎖俄國；接着在俄國內戰的時期，就有資本主義的國家來幫助白色的軍隊。協約國的政府敵對的行動，毫無疑問地一方面是因爲俄國共產黨不能實現他的主張，另一方面是由歐美京城的人民過分害怕莫斯科廣播煽動的宣傳。過了幾個月，世界革命還不

（註一）齊諾維夫：世界革命與共產國際。一九二〇年十月四日在哈萊德國獨立黨開會時的演講。一九二一年彼得格

勒版。

能實現，新俄國的政府勢必找個解決的方法，使自己能夠繼續在各國做革命的工作，同時也準備恢復各國的關係。這種解決的方法，是根據第三國際不依賴蘇維埃政府這理論。等到後來，這理論才能夠充分表現。蘇聯和歐洲各國政府的衝突，尤其是與害怕共產主義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發生影響的英國的衝突，大抵都由於這理論。那時候這理論的大綱已經草出來了。大家都知道它的內容是說蘇聯和第三國際統治的機關是沒有關係；後者是一個完全獨立的組織，蘇維埃的領袖們的參加這組織，只算私人的活動，與蘇維埃政府沒有關係，所以也不必負這責任。實際上俄國共產黨是統治蘇維埃政府和第三國際，所謂第三國際不依賴蘇維埃政府者，只是法律上空洞的想像罷了。

另一方面，這也可以說法律上的想像在國際事件上面的運用，並沒有限制這新生的外交場合——俄國布爾希維克黨。同樣的例子可見於華盛頓政府屢次所提出的抗議，謂債務與賠償，絕不可混為一談。自然歐洲是不接受這意見的，所以美國只好聽從債務國堅決的要求，因而產生一種奇怪的外交文件。譬如說，附於楊格計劃 (Young Plan) 的一篇有名的「一致的覺書，不是報

告書的一部分』(Concurrent Memorandum, but not a Part of the Report)是指美國的債務國家會減少債務的償還。這種文件不但沒有提出美國，而且盡力想法不提出協約國間的債務。關於承認蘇聯的問題，美國的一般政策也不時受人非議。誰也知道一大批一大批美國人會去參觀俄國，而俄國人也可以前往美國。此外，蘇維埃政府聘請了許多美國的工程師和技術專家去實行工業化俄國的機關如安姆托格(Amtorg)和華盛頓國際情報處，假借美國公司的名稱，在該國活動。誰也知道，自經美國的提議後，法國才請蘇維埃政府加入凱洛公約，後者果然也聽從這種要求。據一位美國有名的國際法學者說，這種事情可以算是『默認』。(註一)雖然如此，美國對俄的官方態度，還沒有變更。(註二)蘇維埃政府不承認自己與第三國際的關係，這豈不是離開

(註一)摩爾(J. B. Moore)公正和常識，第十三頁。一九三〇年紐約版。

(註二)紐約高等法院上訴部發表不同的意見，『雖然美國政府沒有與俄國蘇維埃政府成立外交的關係，或者承認該政府是個正式的政府，但是事實上仍承認它的存在。羅斯福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把裁軍的消息直接告訴蘇維埃國家的首領加列寧，正是與紐約高等法院同意。』

現實的世界，跑到幻想的世界麼？

關於蘇維埃政府對第三國際的態度最早的敘述，應算外長姬采林 (G. Chicherin) 於一九一九年所發表的富有趣味的論文。(註一) 他說第二國際的活動是無產階級的外交，不是政府的外交。無產階級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乎反對資產階級的外交政策；這就是說，發動國際無產階級鬭爭。自蘇維埃政府（當時蘇維埃的著作家和政治家常把『蘇維埃政府』用成多數）成立後，情形便煥然一新了。革命的無產階級第一次在外交政策上採取積極的目的：擁護和鞏固革命的無產階級政府，這政府是世界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鬭爭的根據地。但是，革命黨及其領袖——第三國際——的行動雖然簡單，蘇維埃政府的地位並不見得簡單。姬采林說：『各國的政府既然同時存在，它們免不了會發生關係，這些關係使它們不得不考慮自己應盡的義務。外交委員會應該知道自己的職務是與政府有關，它現在不能一面站在革命黨的地位，一面又想脫離政府的責任。』(註二) 革命的政府是與資產階級的政府相反的，它們不能參加帝國主義的行動。它們應該擁護自己，絲毫不受資本主義的侵犯，同時它們也應該不侵犯人。外交委員會說：『蘇維埃的外交，

完全採取保守的政策，但是它很負責任。我們雖說，第三國際的什麼積極的目的，但我們不應該把共產黨及其所統治的政府當做同樣的機關。」（註三）關於共產黨及其所統治的蘇維埃政府的分別，姬采林沒有再提出其他的理由，他這樣幹是很聰明的，因為一種宣言比一種可以非議的言論更有效力。在另一方面，他很耐心地解釋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是與資本主義的相反，因為前者是擁護被壓迫羣衆的利益，尤其是擁護殖民地自決權的利益。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是以政治情形的變遷為轉移的。據他的意見，以某事情所生的影響而論，那麼蘇維埃政府執政後的頭幾月間，直接實行世界革命的政策是很對的。雖然它的活動大受限制，它還是左派的國際勞動運動的國際政策的中心點。如第二國際一樣，第三國際也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但現在它的政策不再是消極的了，反之，因為蘇維埃政府的存在，它已經採取一定的建設的政策了。對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三

（註一）姬采林：兩個國際的外交政策。載在共產國際第六號，一九一九年十月版。

（註二）前揭書，第八二五頁。

（註三）前揭書，第八一六頁。

國際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目的，以一切有效的方法在殖民地國家裏設立蘇維埃共和國；現時資本主義制度日就衰微，這事情更是易於實行。這就是第三國際對於世界革命的廣義的一般的綱領。

外交委員會所說的一般的趨勢，並不是想資本主義國家深信他的議論，謂蘇維埃政府與共產國際沒有什麼關係。然而莫斯科後來所採用的理論，就在這時候奠定了。

列寧的警告

有人謂一九一八至二〇年流行於赤都（Kremlin）的世界革命行將暴發的普遍的思想對於列寧沒有影響，不消說是錯誤了。他曾在葉德金（C. Zetkin）面前承認波蘭運動的失敗，一部分是因為政治判斷的錯誤：他與蘇維埃政府希望波蘭革命，結果革命不能實現。（註一）但是這位革命理論家和思想家對於俄國在追求最後的目的時——將來沒有階級的社會——應遇的和

（註一）路易士·菲雪：蘇維埃之於世界大局

應克服的大困難，斷不會不懂。一九一九年頭，當齊諾維夫作過分的要求的時候，列寧把整個俄國革命作精細的分析，因而得到某種結論。他指出俄國無產階級雖然比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容易開始革命，但是俄國要使社會主義得最後的勝利則非常困難。列寧指出俄國之所以能設立無產階級獨裁制者，實因舊俄帝國太落後，致易激起羣衆的革命力量。無產階級之對資產階級革命，農民之對地主革命，可以合而爲一，這種聯合，馬克斯在一八五六年討論普魯士農民戰爭可以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已經見到。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爆發，可以算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的預先演習。它給羣衆以很大的教訓，同時也是必要的初步工作，否則十月政變便不會成功。俄國地理上的形勢使它能够抵受許多資本主義的國家長期的攻擊。列寧也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特別關係，前者是站立領導的地位，使俄國得由資產階級進爲社會主義的革命。他宣稱西歐勞動羣衆運動從革命工作和教訓裏所得的經驗，使蘇維埃這樣特殊的政府易於成立。但是，假如俄國無產階級太容易成功，那麼它在達到最後勝利以前一定會經過長期的困難。俄國技術上和教育程度上的落後，非努力奮鬥，不易成功。在歐洲先進的國家裏，無產階級很多

而又很有力量，只要他們肯走俄國這條路——無產階級獨裁——他們便有更多機會。(註一)

這種忠告的真正價值，直到布爾希維克革命的『草創』時期——托洛斯基和齊諾維夫最估勢力的時期——過去之後，才充分地受人賞識。資本主義的國家不但能夠抵受共產主義的進攻，而且沒有很大的損失。以宣傳的方法來實行革命，顯然是不夠。第三國際和共產主義運動於是乎要對付修正策略這個迫切的問題。

(註一)列寧：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的地位。載在共產國際創刊號，第三五至三六頁，一九一九年版。

第三章 低潮（一九二一至二四年）

內戰的結局

一九二〇年，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有重要的變動。有的變動對於這新生的無產階級共和國有明顯的益處。所謂白色的軍隊——包含反布爾希維克的俄國軍隊——一陣一陣崩潰了，因此可以知道這整個運動多麼缺乏切實的基礎。一九一八至一九的上半年，鄧尼金（Deniken），彌勒（Miller），高爾卻（Kalinak），尤登尼（Yudenich）的軍隊擊退布爾希維克的軍隊，並且從東西南北四方直搗莫斯科，這次的失敗更是非常明顯。那時候，許多白俄及其在歐洲京城的朋友們都相信蘇維埃的政權一定會分裂，他們這樣相信，好像齊諾維夫及共產黨徒相信世界革命幾星期內便能成功一樣；可是這種反革命的希望也不能實現。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年，白色的軍隊便完全失敗了。高爾卻、尤登尼、彌勒、鄧尼金及其後任烏蘭格爾（Wrangel）都被打死。1

九二〇年十月杪，烏蘭格爾在南部的剩餘的軍隊統計十五萬人，他們離開俄境，前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因此，在這多事時期的歷史上最悲慘的一頁始告結束。我們現在不管這種失敗的原因。反正那時候反布爾希維克運動和反共產主義運動是不能避免的；不過我們現在知道這種工作實無法成功。最令人敬愛的烏蘭格爾將軍曾坦白地說出它的弱點。他說：『民衆很熱心地歡迎我們的軍隊；他們已經吃過布爾希維克的虧，所以只希望能夠安居樂業，可是他們還要受劫掠、殘暴、專制的恐怖。結果呢，前線混亂，內部暴動……內戰變成軍隊發財的機會；重整軍實反爲它掠奪和侵吞公款……軍隊絕對腐敗了，不久變成商人謀利的集團。』（註一）有權力的長官，則用全力來姦淫鬪狠，而種種不道德的事情，也是數見不鮮。

白色運動的失敗，使協約國不得不改變它們對俄國的態度。一九二〇年正月十六日，高等參議會把停戰後對俄國所宣布的經濟封鎖取消了。協約國的軍隊逐漸從阿堪遮（Archangel），敖得薩（Odessa），高加索（Caucasus），和其他俄國的領域裏退回。一九二〇年十月波戰爭結束了，

（註一）烏蘭格爾將軍紀念集。哥爾斯吞（S. Goulston）譯本第一一二至一三頁，一九三〇年紐約版。

並且於第二年三月十八日在里加 (Riga) 的地方，兩國正式簽訂條約——從俄國的眼光看來，這條約是很繁重。歐洲才慢慢地覺悟到蘇聯真是產生了。

莫斯科雖然以很大的代價才能夠得到成功，但是它對於國際地位的增強是很滿意。俄國經濟的紊亂已達極點，不但使人民非常吃虧，而且對於蘇維埃的政治生命有很大的威脅。那時候國內各地的暴動，尤其是泰晤博夫 (Tambov) 的暴動，足證非常的殘酷。軍隊間常有仇恨的事情，如革命根據地的克郎斯塔特 (Kronstadt) 砲臺的水手的被殺。為避免破裂起見，內政的澈底修改，真是刻不容緩。

從莫斯科政府的眼光看來，世界事情一般的趨勢，也很令人滿意。真的，蘇聯的壽命比一九一七年年底至一九一八年間它的最熱心的崇拜者所期望的還長久；而且它能得到驚人的勝利，把那種受協約國擁護的白色的運動打倒。不過這種勝利在先是不知道，同時俄國共產黨也不願意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尤其是在一個像俄國這樣落後的以農立國的國家裏成立社會主義共和國。這與馬克斯及其信徒的一般計劃很不一致。那時候假定資本主義的推翻，一定有幾個先進的國

家會同時發生革命。我們知道這種思想在布爾希維克革命的『草創』時期很流行，直至白色的軍隊失敗和退卻後，才告終止。從這觀點看來，蘇聯之能够存在，並不見得能够賠償先進國家和東方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一九二一年，『蘇維埃政府』這個名詞不能再作多數的稱呼了。匈牙利柏拉坎（Bohu Kun）的共產主義的統治，於一九一九年夏天失敗了，這次失敗，匈國共產黨對於農民所採的過激政策，應負責任。德國革命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不與東鄰合成一個『難於克服的革命的團體』，反而與協約國相提攜，這未免是一種大失望。（註一）霍因索羅倫和哈伯斯堡皇朝（the monarchies of Hohenzollers and the Habsburg's）的推翻，與更大的失望相較一下，只算一種很冷淡的安慰。從共產黨的眼光看來，歐洲各國給專制或民主的國會統治，都是沒有多大關係。重要的事情是，中部的國家雖然經過戰後所發生的痛苦，不滿足，和厭倦，但它們的民主革命很難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對於歐洲各國快要發生革命這希望，自然不能馬上消滅。政治的範圍都經過審慎的考察，看

（註一）共產國際第二次會議報告書，第六四七頁。

看有沒有使資本主義沒落的象徵。世界革命的怪傑齊諾維夫，對於確定的事實很難同意。一九二〇年十月德國獨立黨在哈萊開會時，他強有力地提出他的意見，謂世界革命會無期延長的話，是毫無根據。反之，他主張社會主義得到最後勝利的經濟上的前提還存在。他承認從現狀進展到社會主義是很困難，因此勞工階級更受痛苦。內戰是被剝削階級脫離壓迫階級的箝制的唯一方法。世界革命之不能實現，不是因它的內在條件，而是因為俄國以外的革命黨領袖缺乏熱心、信念和眼光。據他的意見，世界革命沒有悲觀的理由，他進一步說革命的範圍內有許多光明磊落的事蹟，應認為快達到社會劇變的象徵。最重要的是，英國設立「行動委員會」，他以為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核心。意大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已經開始，工人蘇維埃已奪取工廠，並且成立赤色的衛隊。奧大利也達到這種情形，假如明天報載蘇維埃政府已經成立了，不見得有人發生驚異。巴爾幹各國也這樣，該地的社會主義革命已完全成熟了。（註一）

齊諾維夫這些言論不能激動在哈萊的德國聽衆，就是在俄國，也不如一九一九年頭幾個月

（註一）齊諾維夫：世界革命與共產國際，第十、十三、十四、二十二各頁。

對他的言論發生熱烈的歡迎。無情的事實，不問第三國際的領袖怎樣預言，把他的言論的效力全部取消。英國的行動委員會，並沒有設立一個第二政府。與衛斯民士特（Westminster）的國會同時行使職權。意國不但沒有變成共產主義的國家，反而產生法西斯蒂這種新理論，與布爾希維克做勁敵。奧國雖然受和約所加的經濟上的困難，但它寧願在資產階級的統治掙扎，不肯受莫斯科的領導。巴爾幹革命也不能實現。過分使用將來時間的危險和不利，又得到一個證明了。

轉變方針

一九二一年是蘇聯歷史上有重要事件的一年。修正莫斯科政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白色運動的失敗，因而使第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增強國際地位；另一方面是由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之不能實現。我們知道這情形不是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們所預期的，所以他們對於內政外交的態度必須再加整理。一九一八至二〇年莫斯科政府對內的政策，是與國際關係一樣，都採取不妥協的精神。大家知道這就是『戰時共產主義』的制度，政府負責一切國家的活動，並且把

各種小工業都社會化了。政府不但准許農民把不動產拿來瓜分，而且鼓勵他們這樣幹，因此，有的農民很受虐待，謀生也很艱難。種種事情迫得莫斯科政府實行這極端的政策，而且爲方便起見，對於蘇聯最偉大的領袖如列寧等人更好的判斷，反而起來反抗。另一方面左派共產黨覺得戰時共產主義是能夠實現他們的夢想，所以主張實行進一步的激烈手段。托洛斯基主張勞動軍事化，這事他打算與紅軍同時解組。有人提議澈底取消貨幣，一九二〇年正月還討論以『勞動單位』來估量價值。戰時共產主義是中央集權最嚴厲的時期，市場和國家組織的交易都取消了，結果不但使國家的經濟機關分裂，而且使人民對政府所採的政策大不滿意，如農民在軍隊中的騷亂和殘殺，即可見一斑。這事情可以這樣解釋，俄國是個重要的農業國家，所以俄國的軍隊——無論是帝國的，白色的，或紅色的軍隊——完全都是農民的軍隊，因爲農業社會的種種密切的關係使然。農民既受這樣殘酷的徵發，結果自然會影響到紅軍的士卒。（註一）

（註一）關於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最精彩的討論，請看道波（M. Dobson）著的革命後俄國經濟的發展。一九二八年紐約版。

自一九二一年春天實行所謂新經濟政策後，便放鬆中央集權制，恢復市場，准許個人得在國內做生意，鼓勵私人創辦工業，徵收農民的穀稅而不把它全部沒收，這樣一來，戰時共產主義所產生的不能容忍的情形便告結束。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大部分是列寧的功勞，他主張這政策能够使蘇聯生存，可是那時候有很多人發生疑懼，而左派共產黨更加以嚴厲的批評。此後共產主義的著作家們則謂這政策是列寧的革命天才最明顯的表現。普通擁護新經濟政策的議論，不但承認它是個適宜的方法，而且謂新經濟政策雖然把戰時共產主義所消滅的資本主義的形態恢復了一點，它卻沒有走回資本主義這條路。在新經濟政策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要區別，是後者的政權在於無產階級的掌握中，同時一切重要的工業得受統制。在這情形下，沒有階級剝削，也沒有資本主義，雖然它的形態還存在。無產階級的國家產生國家資本主義，爲的是增強勞工階級，不是增強資產階級。新經濟政策不當視爲放棄世界革命，反之，它只是俄國所採的慢度的政策。（註一）

（註一）共產國際第四次會議的報告書和議決案選集第九六及一〇四頁（托洛斯基報告新經濟與世界革命的前途）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

蘇聯的國際政策，也有類似的變更。在外交界強有力地宣傳世界革命快要降臨，恰如對國內的問題施行戰時共產主義的方法一樣。二者都為國際情形的需要所指揮，同時也表現勝利的革命黨中最激烈的份子的非常熱心。一九二一年蘇聯所處的新情形，迫她不得不轉變對外國的態度，恰如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代戰時共產主義一樣。革命的無產階級暫時不攻擊國際資本主義；可是進攻軍隊還在，進攻的精神也沒有消逝。現在所需要的，只是時間問題。時勢的危急，使共產主義願意退讓，但是它的最後目的並沒有放棄。這就是以退為進的政策。（註一）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共產黨第十次會議在莫斯科舉行時，列寧很明白地規定蘇維埃政府的新態度。列寧指出西歐各國的幫助已經開始了，不過這種幫助，比原來所期望的時間還來得慢。另一方面，世界革命毫無疑問地比一年前有長足的進步。這種進步大部分實由共產國際的活動。自第二次會議後，共產國際變成歐洲各重要國家政策裏一個成分。第二次會議以前，它只是發宣言，不過現在德、法、意已經產生共產黨了。這可以證明無產階級運動迅速的進步，同時資

（註一）齊諾維夫給會議的報告書裏，很懊悔地承認這事情。

本主義國家經濟恐慌的深刻化。列寧說：「但是，無論如何，假如我們根據這情形卸下一個結論，謂西歐各國在最近期間會來幫助我們，藉以延長無產階級革命，那麼我們未免太沒有理性了，我相信在座諸君一定不會這樣想。過去三年間我們知道國際革命不是像我們所期望的一樣，以爲在一定的期間內能够置之實現。革命的發展雖然越來越快，但是究竟什麼時候能够實現也不能知道。所以我們應該和國內外各階級間已有的關係加以聯絡，藉以延長無產階級獨裁的時間，而使我們脫離一切的不幸，及經濟恐慌所給我們的影響。只有這種態度是算健全和尊重。」（註一）列寧繼續說，莫斯科政府的政策早已準備與外國成立和平的關係。在這方面的一個重要步驟，是准許外國資本主義者租借土地，假如沒有他們的幫助，俄國的經濟改造實不堪設想。他主張，只把外國的器具和機器輸入是不能解決這問題。在現時的狀況下，俄國是不能充分利用外國的機器的。避免目前困難的惟一方法，只須在蘇維埃政府的監督下，把本國的富源給外國資本家和專家管理。其他一切方法，對於國家經濟的恢復都有妨礙。（註二）

加孟涅夫（Kameney）的在國際環境中的蘇維埃共和國這篇詳細的報告也有類似的主

張。他指出，當西歐還沒有一兩個資本主義的國家發生革命以幫助我們的時候，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上必須採取聰明的尊嚴的態度。假如這樣的革命已經起來，那麼從蘇維埃的眼光看來，整個問題都已簡單化了，而國際協定、借款、租界等問題也不會發生了。但是，當這樣的革命還在期望中的時候，蘇聯必須好生應付目前的情形，爲獨一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生存而奮鬥。莫斯科之所以與資本主義國家成立諒解者，並不是想放棄蘇維埃最後的目的。與資本主義者諒解，『不過是一種新式的鬭爭——爲這個獨一的國家裏共產主義的團結而鬭爭。我們從來不想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共產主義。然而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下，我們覺得我們所處的地位，是必須維持共產主義制度的基礎——蘇維埃無產階級共和國的基礎。』（註三）據加孟涅夫的意見，這職務是否薄弱的問題，是不關重要的。迫切的問題，是怎麼樣維持俄國蘇維埃統治，等其他國家的無

（註一）俄國共產黨第十次會議報告書，第二〇頁。一九二一年彼得格勒版。

（註二）前揭書，第二一頁。

（註三）前揭書，第一七六至八二頁。

產階級能够起來援助。共產黨內有幾個黨員提出批評，謂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上的關係，供給它以勞工和原料，致使資本主義的地位增強。這種批評，加孟涅夫視為明顯的小資產階級。他說世界資本主義的解體已經達到這樣高度，所以俄國原料的利用，並不會使歐洲革命的步驟遲延一天。另一方面，世界經濟生產力的發展，不能阻礙無產階級革命的進展，反之，因資本主義世界矛盾的深刻化，更鼓勵世界革命。關於外國租界的問題，加孟涅夫宣稱，雖然俄國不用外資，使工人多受一點犧牲，也可以實行經濟改造，可是這樣幹未免太慢，弄得蘇聯不能與外國並駕齊驅。爲達到共產主義的最後目的起見，參與一點資本主義以改造俄國，也是很必需的。（註一）

俄國共產黨第十次會議的議決案裏便採取列寧和加孟涅夫的意見。對於俄國無產階級在反抗白色軍隊及其擁護者的鬪爭時的英勇精神，表示相當的敬意。有一條議案說，這次的勝利和外人干涉的失敗，兼以資本主義者要利用俄國的富源來加增他們的利益，結果對俄國與資本主義國家恢復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關係很便利。這議案說，『我們須利用外資來發展共和國的生產

（註一）前揭書，第一七六至八二頁。

力，和改善勞工階級的地位。除非利用外國的技術，和外國所製造的生產工具，這根本的……問題，不能大規模地在短時間內把它解決。」因此，這議案贊成蘇維埃政府已經開始的外國租界的政策。（註一）

這些宣言的實際價值，因一九二一年三月莫斯科政府與英國成立商業的協定後而大見提高。英國政治家和外交家對於政治經濟的實際情形的明察，雖然受了一些不應該得的自私和出賣等罪名，但是別的國家不久也走這條路。那年年底，蘇聯已與許多歐洲的國家恢復商業關係。

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至七月十二日共產國際開第三次會議，它的義務是要決定對於一九二〇年第二次會議後所發展的新形勢的態度。第三次會議比前兩次更來得嚴重。後來齊諾維夫也承認是這樣。（註二）第三國際主席作就職演講時，把第二次會議以來的世界革命運動發展的情形加以批評。這情形並不見得很好。意國革命的暴發，工人的奪取工廠，紅軍的組織都失敗了，

失敗的責任是由於勞動的領袖把這運動的機密洩與階級的敵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捷克的無產階級更有力的革命運動，也不成功。第二年春天，德國的工人騷動也遇着類似的運命。同時別的國家也做了許多革命精神的表示。齊諾維夫承認個別運動的失敗，但他極端否認共產主義的敵人們說現在的不成功便是共產國際政策的失敗。反之，他主張這些失敗是年齡很小的共產黨應得的有用的經驗，使他們知道將來不要再蹈故轍。世界無產階級整部的歷史就記載着這些失敗的事情。（註三）

齊諾維夫說了一批革命暴發的事件，托洛斯基更張大其辭，把一九二一年英國礦工的罷工和挪威的同盟罷工都加上。托洛斯基雖然把這些事情當做『偉大關爭的重要成分』，可是他很正確地指出，資產階級現在還是得勢。他與齊諾維夫同意，謂勞工暴動之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

（註一）前揭書，第一八六至八七頁。

（註二）俄國共產黨第十一次會議報告書，第一八八頁，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版。

（註三）齊諾維夫在第三國際第三次會議的演講，載在共產國際第十八號，第四四八〇至八二頁，一九二一年版。

不該視為第三國際的沒落。它的一般政策毫不動搖，可是它的實際行動必須按照新的情形轉移。托洛斯基說：『我們現在所遇的問題，不是初步的沒有計劃的往前衝鋒。我們相信當資產階級解體時，往前衝鋒也許會繼續着。這樣，無產階級的領袖們也許會覺悟，同時無產階級本身也許能夠在一兩年內奪到政權。這種歷史的可能性還存在，不過無法實現。歷史讓資產階級……能夠多活幾年。』（註一）

托洛斯基說，關於這事情，沒有一點稀奇。資產階級很充分表現它的能力，以適應戰後貧困的情形。一般的情形比從前更複雜；不過還是很順利。革命不如從前那麼容易駕馭。它有自己的路線、危機、高漲、和低落。一九二一年的情形比第一第二兩次會時大不相同。他說：『我們有廣大的眼光，我們願意決定我們政策的基礎，我們對自己說，「我們走這條路罷，因為在這旗幟下，我們能夠喚醒無產階級來征服全世界」……總之，我們的路線是健全的。從前的失敗，是由於事前沒有看清路線的變遷，可是我們現在已覺悟了……現在才知道我們還沒有躋進最後勝利——奪取全世

（註一）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會議報告書，第四四頁。一九二二年彼得格勒版。

界的政權，世界革命——的門徑。一九一九年的時候，我們說革命的成功只是幾月後的事情；現在我們便說它是幾年後的事情。我們不能正確地知道到底要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可是我們現在知道我們是往目的地跑，而目前的地位比從前強勝許多……鬭爭或者需要很久，我們的進步也許比所希望的會慢些。在這困難的鬭爭中，犧牲是在所不免。我們從經驗裏能得到教訓……我們永遠準備，利用一切機會作革命的進攻，和征服政治的勢力。』（註一）

共產國際領袖們這種新的態度，必需用一種新的實際政策的綱領。拉狄克關於第三國際戰略的報告書，就是說明這事情。他說，雖然世界革命失敗，共產國際還能存在。不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命如果能够延長的話，共產國際的活動必須有所變更。現時的活動不是叫勞工階級準備對付內戰的危急，而是準備組織和煽動，成立支隊作將來的鬭爭。拉狄克深信資本主義的情形一定無法改良，而共產國際的義務就在於對付任何新的情形。所以一般的政策，假設根據世界革命的力量會繼續增長並且會為新的鬭爭而團結起來。他說，俄國共產主義的報紙於一九一八年早已知

（註一）前揭書，第四五至四六頁。

道世界革命會慢慢實現，那時候知道共產國際所領導的革命黨一定會經過長期的鬪爭，並且準備接受不時的失敗。現時不是從公開的攻擊到真正作戰的時期，而是到成立世界無產階級大軍隊的時期。現時革命領袖們所遇的主要的問題，是要使羣衆信仰共產主義的理論。拉狄克說：「共產黨怎麼能够對於無產階級的運動發生影響，而又把這運動深刻化，使變爲奪取政權的鬪爭？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可以由研究我們過去的一切活動，而得到解決的方法。」（註一）

拉狄克既調查目前世界各處的勞工騷動後，他承認無產階級是有失敗；不過這是局部運動的失敗，不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現時這革命才算正式開始。爲促進和組織它起見，共產國際應該有具體的行動綱領。拉狄克與托洛斯基同意，謂革命在發展的途中，不能按直線前進，因爲在繼續前進的時候，它免不了有高漲和低落。這並不是說革命的領袖們可以怠慢。革命的宣傳和革命的行動不是相反的。反之，真正的革命宣傳是行動最好的準備。拉狄克對同志們說：「在這劇烈鬪爭快要降臨的時候，你們應該做個警鐘，以號召這鬪爭。我們現在當偉大的共產國際的會員，

（註一）前揭書第二〇四至二一〇頁。

並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做過有效的煽動工作，而是因為俄國的無產階級和紅軍曾經挨俄流血，使這煽動工作成功，同時也因為俄國的革命曾做過共產國際偉大的警鐘。我們的宣傳工作現時還在初步，還沒有深入羣衆。假如我們知道我們已在大戰的前夕，我們應該對自己說：「第一步，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接近羣衆！」第二步，我們應對自己說：「因為我們不知道明天會變成怎麼樣，因為我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被捲入鬪爭的漩渦，所以我們必須準備。」革命不是組織得來的。一人能夠駕馭軍隊，但是不能駕馭革命。革命是倔強的初步的運動，它決定我們行動的方針；所以我們要羣衆明白革命的意義，並且組織無產階級的支隊，等到革命高潮來臨的時候，便往前衝鋒，領導羣衆鬪爭。」初步的組織工作和直接行動可以同時存在。組織的真仇敵，是沒有行動。應付每種情形必須用該情形所需要的方法。「革命的煽動是鬪爭，革命的宣傳是鬪爭，同時下層的組織，無產階級的軍事訓練，黨化學校，遊行示威，暴動等也是鬪爭。這就是我們的口號。」幼稚的行動與機會主義有同樣的害處。從心理上說來，二者都是不耐心的結果。拉狄克在他演講的結論裏教訓我們說：「明天的事情今天可以不必管。」（註一）

革命策略的問題支配這會議的辯論。列寧的報告書完全討論戰略，使俄國共產黨有所遵從。他說：『我們在相當的時間便參加世界革命，我們之所以這樣幹，並不是因為我們相信自己能轉變革命的路線，而是因為許多條件叫我們必須這樣幹。我們的論題是這樣：或者世界革命會幫助我們，使我們得操勝利的左券，或者我們只做革命的工作，縱使我們是失敗了，對於革命也有裨益。我們知道除非有國際的世界革命的援助，無產階級革命是不會成功的。在「俄國」革命的前後，我們希望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較高的國家不久會發生革命，否則我們便會毀滅。雖然我們所處的環境很困難，可是我們還盡力保護蘇維埃制度，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不但是為自己工作，而且是為世界革命工作。……革命發展的真正趨勢，與我們所期望的頗不同。截至現在止，其他大的更前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發生革命。真的，革命是有進展……這就是經濟上軍事上比我們強勝百倍的國際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致我們於死地的原因……我們現在怎麼樣幹呢？我們應該細心研究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的國家裏怎樣準備革命及其真正的發展。』（註二）

拉狄克在答覆德國的代表對於蘇聯與其他歐洲的國家在利益和政策上發生衝突的批評

裏，努力提高俄國在世界革命上的地位。他說：『我們現在是由外國戰爭轉到國內和平的時期，所以經濟的問題變為非常重要。……假如你們不否認俄國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那麼從世界革命的見地看來，你們便不得不承認，我們以前所做的事情是重要的。……蘇聯所採取的政策是有理由的。它們不但是俄國情形必然的結果，而且是世界無產階級所取的地位必然的結果。假如有人問這政策是否有危險，答案說是有危險。列寧在他的論文裏說，單獨的無產階級的政府只在有限的時間內才能存在。在我們的議會中，我們曾充分討論這種危險。對這情形惟一的補救方法，是促進世界革命。』（註三）

共產主義理論最特出的權威者布哈林也有同樣的意見。『我們能否生存呢？這問題現在無法作肯定的答覆。現在的重要事情是怎樣找到機會。假如我們失敗了，這並不是說西歐各國的革

（註一）前揭書，第二二五至二七頁。

（註二）前揭書，第三五四至五五頁。

（註三）前揭書，第三六五至三六頁。

命也是失敗。由我們的經驗裏，你們能得到益處。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沒有失敗。」（註一）

那種流行於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的思想，由它所通過的議決案正式發表出來，這議案奠定一些原則，作將來共產黨的政策之根據。其中最重要的是這新口號，「到民間去！」用具體的話說來，這就是說共產黨的組織應參加勞工階級日常的微小的鬭爭；參加一切工人的組織，從蘇維埃到體育部和音樂部；時常對他們宣傳無產階級獨裁的思想；叫無產階級信仰共產主義；叫羣衆堅強地有系統地準備行將降臨的鬭爭；很小心地做下層革命組織的工作；耐勞忍苦地供給工人以軍械；創立有權力的獨立的共產黨，脫離一切關係。把工團變成共產主義。

這次會議第二個結論，是承認現在還沒得到勞工羣衆盡心擁護的少數共產黨，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發生暴動，戰勝資產階級這思想爲空想。它拒絕激烈份子謂勞動運動的「活動」；只能用高壓的手段可以成功這思想。自然這並不是說共產黨的活動只限於宣傳。他們還想領導任何勞工騷動，不過除非他們深信一般的情形會使他們成功，他們便不肯作斷然的革命行動。這種

（註一）前揭書，第三八二頁。

聰明，是共產國際經過多年深刻的失望後所得的結果。大戰剛完後的情形，特別有利於推翻資本主義這工作。雖然如此，但世界革命還不能實現，這原因是由於工人的缺乏組織，和勞動領袖們的叛變，私自跑到資產階級的隊伍裏去。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年頭的勞動運動史，特別證明這種叛變的例子。增強革命組織，除去領袖間假共產主義的份子，是目前最重要的職務。

第三次會議這種議案自然大受共產國際最不妥協最不耐心的分子嚴厲的批評，他們指這種議案是完全屈服資產階級，和放棄革命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大目的。馬托夫（Martov）公開地說，這是『共產國際的曙光期。』這大可以表明第三國際自一九一九年後所經過的悠長的路線。齊諾維夫現在很熱心地擁護這新政策，他說我們現在已勝過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已經承認我們不是做夢者和傻子，而是誠懇的，有決心的，聰明的敵人，並且為確定最後的勝利起見，願意作必要的退讓。齊諾維夫雖然讚美共產國際政策的高明，同時也承認現時的潮流是在低落，但他對於兩年前的態度並沒有完全放棄。他說：因為我們不是先知，我們不能很正確地斷定到底要經過幾年，無產階級才能够在一個重要的國家裏得到勝利。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使

我們確信的，而第三次會議對於歐洲經濟情形的觀察也證明是這樣：『革命沒有過去；新的鬭爭不久便會發生了。未來的鬭爭，一定會給歐洲和全世界以空前的震動的。』（註一）

新時期的開始

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後的幾年間，大家都承認世界革命是正在開始，離完全成熟的地步還要相當的時候。這種認識必然的系論是：第一步，把第三次會議所規定的幾個國家裏的共產黨增強起來，第二步，繼續恢復世界各國常態的貿易關係。後來蘇維埃的領袖們深知內政外交的情形之非常複雜，所以他們逐漸地把蘇聯看做革命的出發點，它的盛衰有關於蘇維埃試驗的運命，同時蘇聯也有它的重要目的，從國家的觀點看來是這樣，從世界無產階級的觀點看來也是這樣。這種思想不能馬上勝利，而是以黨的討論慢慢地把人家說服，直至一九二四年秋天斯達林論：『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時，才見完成。在這時期中，蘇維埃的內政與外交的相互

（註一）齊諾維夫：共產國際的策略。載在共產國際第十八號，第四四九至七七頁，一九二一年版。

關係已得正式的承認，國家的經濟改造必須資本主義國家幫助這問題，大家也知道了。此外，容納外資的政策也很重要，那時候以為外資是使俄國經濟獨立的主要成分，這種意見以後是放棄了。

我們已經知道蘇聯於一九二一年間曾與許多歐洲國家恢復商業關係。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間，這問題在熱那亞（Genoa）這種重要的國際會議裏討論。激勵蘇維埃政府的新精神，列寧曾明白地加以敘述。他說：『現時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就是熱那亞……我們參加熱那亞會議，不是用共產黨的資格，而是用商人的資格。我們想得利益，他們也想得利益。鬭爭的結果，只靠我們外交家的技巧如何。』（註一）會議的前途誰也知道不甚樂觀，而德國與蘇維埃代表們所簽訂的拉泊洛條約（Rapallo Treaty）使這問題更形複雜。雖然列寧曾給他們和解，但是蘇維埃代表們一般的態度似乎與歐洲各國不能成立諒解。熱那亞會議既然不能達到它的目的，同年六月在海牙所召集的會議也不見得成功。

一九二二年九月所召集的洛桑會議（Lausanne Conference），蘇維埃政府曾派代表來解

（註一）俄國共產主義布爾希維克黨第十一次會議報告書，第七至八頁，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版。

決土耳其的問題。一九二三年正月，這種問題完全停頓了，但後來又恢復關係。在這時候，蘇維埃政府很想合作。一九二三年七月，簽訂撤退達達尼爾 (Dardanelles) 軍隊的條約，雖然一切款項對於莫斯科都很不利。

當蘇維埃政府努力想得資本主義國家的正式承認和發展各國的商業關係的時候，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附屬的組織進一步去實行第三次會議所定的國際革命行動。大家記得，這政策是總結於這個口號：『到民間去！』這工作的施行，是受各國共產黨和紅色勞工國際所組織的執行委員會的監視。紅色勞工國際是一種工團組織，其目的是使已經組織的勞工運動受共產黨的影響。一九二一年七月才開第一次會議，爲的是與『黃色』的阿姆斯特丹國際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一種非共產主義的國際勞工組織——相抗衡。直到共產國際第三次至第四次會議間，『勞工聯合戰線的策略』才產生。這個頗複雜的公式是描寫一種政策，其目的是把一切願意反抗資本主義的工人的力量團結起來，不管這工人是否有共產主義的信仰。譬如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可以算在內。把各種勞工都團結起來與資本主義奮鬥，希望不但能增加共產

黨和共產國際的力量，而且使勞工運動能脫離那班愛與資產階級妥協的領袖們。同時在這時期內，大家都把共產主義與國際和平混爲一談，把戰爭當做資本主義制度不能避免的結果。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三日共產國際第四次會議開會時，把它的前輩所宣布的政策更詳加討論，並且謂設立勞工政府才能够把聯合勞工戰線這理論充分表現出來。那時候有一種很特別的精神，列寧的俄國革命五週年及世界革命的前途這篇報告書，大部分是擁護新經濟政策。關於必需退卻的條款，這報告書也有明白的議論。他說：『在第一次宣讀這些條款時，我們暫時只可以討論我們的一切綱領，今年都不必作最後的決定。爲什麼呢？第一步，我們現在是沒有充分的時間作精細的討論。同時關於退卻的可能性及怎樣保護的問題，我們實際上還沒有考慮過。現時應該注意改造世界，取消資本主義，設立社會主義等困難的問題。光是計劃我們怎麼樣幹才得勝利是不夠的。在革命的情形下，這事情是不甚困難，並且也不甚重要。最少，這不是頂重要的事情。在革命的時期內，敵人也許會喪失他的領袖，假如我們能够在適當的時候衝鋒前進，那勝利便很容易。不過這種勝利也是靠不住的，因爲我們的敵人如果有充分的自制力，也許早已發動軍

隊，以反抗我們。這就是我說對於退卻的可能性的準備，是非常重要的，並且準備退卻，不但在理論上很重要，在實際政策上也這樣，所以那班準備在最近的將來進攻資本主義的人，對於這問題應詳加考慮。他們應該想一想怎樣保護他們的退卻。」（註一）

共產國際其他領袖們也有同樣的意見。托洛斯基之所以擁護新經濟政策，因為俄國的政權現在已經在勞工階級的掌握中。只要這基本的條件還存在，那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的形態的復活，是無關重要的。（註二）

拉狄克在先付資本這篇報告書裏，懇求改善共產黨及其領袖——共產國際——的組織。他指出，自一九一九至二〇年間，勞工階級對世界革命的態度，有顯著的改變。在革命的初期，社會主義是節節勝利，共產主義的與沒有黨派的工人的分別，不在乎目的，而在乎方法。拉狄克很悲觀地

（註一）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會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三日舉行的）報告書演講辭和議決案選集。

第六二至六四頁，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

（註二）前揭書，第一〇九頁。

說：「反之，以現時的情形看來，世界無產階級的危機還沒過去，這特點是，無產階級對於最近的將來奪取政權的可能性這信仰已經消失了。它現在已經立於保守的地位。」（註一）無產階級應該知道推翻資本主義的惟一方法是內戰。沒有別條路。所以勞工羣衆的組織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方面，還有許多事情應該幹。他說：「勞動運動的一般情形，大可以證明共產主義的煽動，就在最有組織的國家裏，也是太抽象，缺乏一批堅決信仰的人，謂他們所鬪爭的目的在最近的將來便能夠實現。我們的鬪爭現在還是給人以純粹煽動的印象；假如我們不想我們的議論變成消沈，和我們的會議只作革命發展的理論上的討論，那麼我們的黨應該實際上採取一種與前不同的政策，不但是一般政治的傾向不同，而且要有積極的精神。」（註二）世界革命的將來，大抵是靠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工作是怎麼樣。『共產黨是勞工階級的先鋒。他們相信無產階級獨裁。不過沒有黨派的勞工羣衆還是不參加這鬪爭，除非環境逼他們這樣幹。現時大部分勞工階級全不想奪取政權，這

（註一）前揭書，第一三二頁。

（註二）前揭書，第一四〇至四一頁。

是很明顯的。』(註一)這種悲觀的結論，倒與辯論時的一般論調相等。

新的失望和新的希望

共產國際第四次至第五次會議所經過的十八月間，充滿着希望、失望、和對內對外政策的成功。一九二三年，當魯爾 (Ruhr) 的被佔，使德國解體的時候，莫斯科的革命活動大見恢復。那時候，俄國共產黨內有勢力的份子深信在最近的將來德國革命一定成功。這種希望又無法實現。列寧的逝世，使布爾希維克黨喪失了一位公認的領袖，接着就有領袖權的競爭，結果斯達林勝利了。共產國際內有一批領袖們的政治前途非常不穩定，其中如幾個特出的人物，托洛斯基，齊諾維夫，和布哈林。另一方面，新經濟政策使經濟的狀況有顯著改良。在蘇聯新領袖們的腦海中，再改組和工業化這種經濟的問題，很迅速地駕乎純粹的政治問題之上。一九二四年二月，俄國得英國政府和意國的法律上的承認；同年十月，法國也承認。俄國在外交關係上，時常受人搗亂，如一九二四年五

(註一)前揭書，第一七一頁。

月，在柏林的蘇維埃商業代表的被攻擊，和「齊諾維夫的信札」在同年英國的選舉上之佔重要的地位，都引人特別注意。關於「齊諾維夫的信札」，蘇維埃政府很審慎地否認英國所加的訴狀，因為這封信的內容，從前曾在共產國際公布了許多次，並且能够表現莫斯科的新態度。爲推翻資本主義的鬭爭，不消說是蘇維埃的綱領裏的重要條款，可是現在已不如革命後的頭幾年間那麼重要了。假如說共產國際已失去從前對蘇維埃高等團體的影響，這話並沒有過分。

在這種新情形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世界問題的態度，顯然需要修正。就是齊諾維夫現在也承認必須與資本主義國家接近。一九二三年春天他演講的時候，他宣稱俄國外交政策的趨勢，是要與東方被壓迫的國家和戰敗後的德國作更好的諒解和密切的合作。不過這事情並不阻礙對於協約國，甚至對於法國的接近，雖然那時候法國正侵佔魯爾，但大家仍相信大部分法國國民衆很同情共產主義。真的，蘇聯和英、日、美三國的關係也是這樣。（註一）

齊諾維夫繼續討論內政與外交有密切的相互依賴的理論，這種關係最少在俄國是對的。他

（註一）俄國共產主義布爾希維克黨第十二次會議報告書，第十二至十四頁，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

說：「內政與外交很難作機械式的分別，假如說內政站在一種立場，外交又站在另一種立場，這便錯誤了。有一個聰明的德國政治家出版了一部書討論內政外交的相互關係，他定了一個公式：內政是思想，外交是實行。這就是說，內政定計劃，外交作最後的決定。所以我說二者有密切的相互關係。這可以應用到蘇維埃國家和蘇維埃的政策上。我們的內政與外交實在有密切的不可分離的關係。」（註一）於是共產黨的會議通過了一個議決案，充分贊成政府壟斷國外貿易，和鼓勵外國資本家來投資，以發展本國的富源。（註二）

齊諾維夫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共產黨開第十三次會議時，也提出相同的意見。他說：「我們現在更要記得，我們的內政與外交從來不像現在這樣密切。爲什麼呢？在最近的將來我們應該決定下列的問題：我們要不要償還債務；我們要不要付給利息；關於壟斷國外貿易的問題，我們要不要允許；我們應運出多少五穀。這一切問題不但在我們的內政上，而且在我們的外交上佔了重要的

（註一）前揭書，第一八九頁。

（註二）前揭書，第六一七頁。

地位。』爲着重這一點起見，齊諾維夫提出四種要素，據他的意見，它們可以決定那時候蘇聯的外交：（一）發展國際勞動運動，無產階級鬭爭受共產國際的領導；（二）狹義的外交政策；（三）外國租界的問題；（四）壟斷外國貿易，及俄國五穀出口這個相關的問題。（註一）這次會議也有相當的議決案充分贊助這種態度。（註二）雖然共產黨還使用舊時革命的語法，但是凡閱讀這會議的紀錄的人，一定會說內政的成見是比純粹的國際政策的問題佔上風。

共產國際第五次會議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至七月八日，共產國際第五次會議正式承認無產革命的『草創』時期已經結束了。共產國際工作的新時代，最好是由急烈的善於辭令的共產國際的主席齊諾維夫宣布出來。幾星期前，在俄國共產黨第十三次會議裏，他已經承認自一九一九年後，他得了不少教

（註一）俄國共產主義布爾希維克黨第十三次會議報告書，第五十頁，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

（註二）前揭書，第六三四頁。

訓。爲擁護共產國際的政策起見，他說：『總之，我們曾把世界發展客觀的趨勢，作個精確的分析。不過我們對「時間」的估計，並不見得完全都很對。現在我們可明白了。有一個時期——當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Brest-Litovsk)和議的時期——就是列寧也相信許多歐洲前進的國家裏革命的勝利，只是兩三個月內的問題。從前有一時期，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我們，以爲德奧事件的進展，只是幾個鐘頭內的事情。在這方面，我們不消說是錯誤了。但是，同志們，我們很不幸，我們誤斷了「時間」的兩種可能性。我們不但誤斷了革命產生的時期，而且不知道有退卻的機會，第一點，我們相信假如我們能得到政權，那麼明天我們就能夠自由援助其他國家的革命。第二點，我們相信假如這事情因故不能發生，那麼我們以單獨一國的革命，勢必無法生存，因而毀滅了……我們好像沒有經過槍林彈雨的全新的軍隊，既沒有打過仗，又不知道進攻和退卻的規矩。我們不懂空間和時間的定律。現在我們有相當的經驗了。事情已經變成這樣，世界革命不是三個月的問題，而是更長時間的問題；而且事情又變成這樣，最初以爲單獨一國的革命不能維持得好久，現在卻不然。這就是我們之所以對於將來的事情，比從前更爲實在的理由。』齊諾維夫繼續着說，俄國的革命並不

孤單，因爲它有資產階級國家裏的無產階級作強有力的聯盟。(註一)

齊諾維夫在共產國際第五次會議作就職演講時，發展同樣的意見。他批評一九一九年後所經過的革命運動，及勞動的領袖們爲叛逆，因爲他們使世界革命不能實現。(註二)在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報告書裏，他也認各國共產黨在誕生後的頭幾年間，只算宣傳的團體。羣衆自然發動的運動，給人家誤認爲真正轉變到共產主義。實際上，這是『視力上之幻覺』(optical illusion)。(註三)齊諾維夫懇求鞏固共產黨的時候，也與他的批評家同意，謂列寧的逝世是共產主義無法補償的打擊。因爲一切議決案沒有經過列寧革命的遠見的核對，所以羣衆和領袖們對於他們的政策之健全與否，都起動搖。(註四)齊諾維夫的討論結束時，帶着深刻悲觀的論調。『叫第三次會

(註一) 俄國共產黨第十三次會議報告書，第四二頁。

(註二)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至七月八日共產國際第五次會議報告書，第一卷，第九頁以下。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註三) 前揭書，第四五至四六頁。

(註四) 前揭書，第八八頁。

議做一種紙上的計劃，證明一兩年內完全推翻資本主義，並不是難事。但是，假如事實上並不如此，那麼，這計劃有什麼用處？這幾年來我們得了不少教訓。我們逐漸知道『推翻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應該小心使用。資本主義的推翻，委實是免不了的。資本主義的命運定了。不過我們要看清事實，對於『時間』的估計，應該比從前加倍小心。真的，齊諾維夫離一九一九年原來的地位很遠了！（註一）

如謂最近革命前途的失望，便是放棄鬪爭，這不消說是完全錯誤。反之，方法雖然不同，鬪爭還是繼續着。不過革命運動不能靠最遠的將來的期望，不管後來的情形是怎麼樣動人。現在需要更切實的具體的易於接近的目的，而蘇聯的成立就具有這種目的。蘇聯是個場合，實際上供給年齡較少而有強力的國家以無限的熱誠、能力和教導。我們知道內政在蘇維埃領袖們的成見越來越重要。蘇維埃著作家們的一種責任，是要給自己和外國證明凡是俄國所做的事情都不是為自私或為國家着想，而是以世界無產階級為前提的。從這觀點看來，當共產國際第五次會議的時候，布哈林所以起來擁護新經濟政策。大家記得，這政策是一九二一年春天列寧所發起的，它要恢復一

（註一）前揭書，第四三八頁。

九一八至二〇年的戰時共產主義所完全毀壞的市場，並且給私人資本和私人創辦以一點自由。這政策自然大受共產主義正統派的批評，他們覺得屈服於資本主義是恥辱。布哈林給共產黨會議的報告書裏說，就是蘇維埃負責的領袖們也爲新經濟政策辯明，並且把它當做政治上方便的策略和應時對小資產階級讓步。他說，這種態度現在已完全變換了，新經濟政策現在在一般的理由上都對的。據他的意見，在新經濟政策下，國家所統制的大事業以市場競爭的方法向小規模的私人生產挑戰。從表面上看來，這情形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相同；不過其中有重要的區別。這區別是，蘇聯的大企業是屬於國家；這就是說，屬於無產階級。所以布哈林說，無產階級的大企業與小本的私人的企業相競爭，可以算真正的階級競爭，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競爭。『市場競爭這樣平凡的事情，只是新式的專門的階級競爭。』這就是給世界革命製造廠的貢獻。（註一）

第五次會議的議決案分析世界的情形，它的結論謂『民主和平的時期』（指英國的勞工政府和法國赫禮歐（Herriot）與「笨人團」（Cartel des Gauches）實際上與民主或和平無

（註一）前揭書，第四九六至五〇〇頁。

關。這不過是一種烟幕彈，把反動的進展掩飾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一天比一天明顯，而軍備的競爭更非常厲害。這些問題在共產國際每次的議決案中，不消說是常有敘述。共產國際所處的新地位，可看下列的議決案：『世界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了。它的發展一般的速度，和某洲或某國革命進展特殊的速度，都不能很正確地預定。以整個情形而論，倒有二條可能的路線。（甲）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免不了會遲延；（乙）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基礎已經毀壞了，資本主義的矛盾更迅速地發展，所以各國資本主義的崩潰不久便會實現。共產國際應該使它的政策能夠適應任何路線。共產國際的政策，的易變性（Flexibility）應該達到這種程度，使它能夠適應任何新情形。姑定事件會遲延發展，但共產國際應該代表無產階級暴動的總機關，把羣衆集合起來，準備作奪取政權的革命的鬭爭。』（註一）

共產國際實行這種責任，並且繼續注重第三次會議的口號：『到民間去！』此外還有一種責任——把共產國際各局部（各國共產黨）布爾希維克化了，這就是說，按照俄國共產黨的經驗，

（註一）前揭書，第二卷，第四七頁。

再組織各國的共產黨。這種方法倒含着幾個普通的原則。真正布爾希維克黨的基礎是這樣：（一）它應該是羣衆的黨；它應該與勞動羣衆發生密切的關係；「並且作他們所需要的和所希望的東西的喉舌；」（二）它應該易變；（三）它應該充滿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四）它應該中央集權，禁止黨內的組織；（五）它應該以資產階級的軍隊來作宣傳。（註一）這些要求沒有一件是新的，除了現在是以「布爾希維克化」這個動人的名詞發表出來。這會議也通過了一項議決案，叫它的信徒們準備與資本主義鬭爭，我們知道，一九二四年的時候，他們對於戰爭的來臨不敢像從前說得那麼容易。

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有一種平凡的理論，謂資本主義會使階級間發生矛盾，而這矛盾一定會引起階級鬭爭。列寧對於各國的關係，也應用相同的分析，他創設了帝國主義的理論，據這理論說，

（註一）前揭書，第四七頁。

各國間的矛盾會繼續增加，結果一定會引起國際上公開的武力的鬪爭，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大戰便是一個先例。帝國主義鬪爭之無法避免，共產黨的團體中從沒有人作嚴重的質問。大家既承認這事實，同時又相信這種戰爭也許給革命以利益，那蘇維埃的領袖們對於國際和平的問題自然不發生很大的興趣。一九一八至二〇年的經驗，表明革命，尤其是社會革命，不一定在戰敗後發生。我們知道，把俄國當國際共產主義的中心點，逐漸變成莫斯科領袖們的主要成見。國際戰爭的問題，現在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了。大家還是相信帝國主義戰爭是資本主義制度必然的結果，不過共產主義的義務應該延長這戰爭，使蘇聯的地位得以穩固。自一九二一年的下半年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這問題，變成許多論文、書籍、演講辭和議決案的主要題目。譬如說，一九二二年三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一個議案說：『阻止將來戰爭惟一有效的方法，是推翻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此後便可以實行經濟改造，取消階級間的矛盾和各國利益上的矛盾。』這議決案便定了詳細的法則，怎樣實行爲阻止國際戰爭的階級鬪爭。（註一）一九二三年四月，齊諾維夫討論蘇

（註一）來克與（Tekin），共產國際的戰爭，載在共產國際第五至第六號，第六六至六七頁。

維埃對於新戰爭應採什麼政策的問題，他自然說這戰爭是免不了的。他問：「俄國在將來的戰爭中應站在什麼地位呢？」他自己答道：「假如我說我們的策略是很簡單，我將犯了漏洩國家祕密的罪名。我們應該準備抵受更壞的情形。不過同時我們又應該盡力延長我們在這鬭爭中不得不活動的時間。我們需要和平，我們的國家也這樣。無產階級革命應該使俄國經濟獨立。我們應該把參加鬭爭的時間盡量遲延。」（註一）拉狄克也有同樣的意見，他論俄國在第二次鬭爭中所處的重要地位時，便引用列寧的意見，謂蘇聯的存在使無產階級革命大成功的機會從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三十。這話並沒有過火，只要把新戰爭爆發後所發生的情形拿來考察一下，便會明白。俄國地理上的位置，西鄰德國，東鄰英屬印度，使她在第二次國際鬭爭時所處的重要地位的可能性大見提高。她的政策也許是「等一等看」，等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羣衆已經起來，然後跑他們那邊去，一擊即能得世界革命最後的勝利。或者俄國爲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着想，也許會與一個交戰的黨聯盟。受極端剝削的殖民地也許會幫助俄國，作東方反抗壓迫者的聯合戰線。關於西方

（註一）俄國共產黨第十二次會議報告書，第十三頁。

的國家，他便繼續使用一切適當的工具——不管是鏈或是鎚——來毀壞資本主義的鏈鎖。拉狄克繼續着說：『資本主義就是戰爭。凡人要毀滅戰爭，便應該毀滅資本主義。』（註二）以後幾年間他常常發表同樣的意見。不過蘇維埃的領袖們越來越注意國內的事情，以毀滅資本主義來取消戰爭的大目的便越來越模糊，他們盡力阻止最近將來的戰爭，作國家經濟改造的必要條件。

新定理

布爾希維克的理論實肇基於一個學問淹博的德國教授，它顯然帶着整齊的有條不紊的研究的意味。所以對世界革命的態度改變時，這理論自然會作教義式的陳述，以取悅教授的心理。這種陳述就是俄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五年四月第十四次會議時所採取的議決案，討論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的目的。議決案有一部分是和我們現在所注意的問題有特殊的關係，它起頭是引用列寧對於世界革命真正發生的時間的誤會。一九一五年，列寧說：『革命也許要多年的戰爭，打了

（註一）拉狄克十年之後，載在共產國際第五至六號，第八四至九三頁。

幾回仗後又有暫時調停的時期——資產階級制度反革命的時期。』議決案說：近年來的事情大可證明這預言是對的。議決案繼續說：『一個人應該分別（甲）革命的環境，（乙）最近革命的環境，和（丙）馬上革命的環境。』以下又引用列寧的話來作證：『馬克斯主義者都知道，沒有革命的環境便沒有革命，並且每種革命的環境不見得都能發生革命。這思想在實際上的應用，可以舉例子來證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德國已有革命的環境了。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它就變成最近的革命環境；到一九一八年年底，最近的革命環境又變成馬上革命的環境，結果墮落爲資產階級的革命。一九二三年，德國又有馬上革命的環境，結果也是不能實現革命，一九二五年，德國又變成只有革命的環境的國家。』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俄國有一定的革命的環境。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就變成最近的革命環境，到一九〇五年年底，又變成馬上革命的環境，結果是失敗了。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最近的革命環境還是繼續存在於俄國。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五年，雖然算專制『穩定』了，但是還有革命的環境。一九一六年，最近革命的環境已經來到了，所以第二年革命便成功，推翻專制。

現在（指一九二五年）英國革命的環境已開始了。不過英國離最近革命的環境還很遠哩。從全世界看來，現在（指一九二五年）是有革命的環境的，下列的議論可以證明：（甲）引起一九一四至一八年戰爭的經濟的矛盾還沒有消滅，除非發生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這矛盾是無法消滅；（乙）資產階級的歐洲會產生帝國主義的戰爭；（丙）東方醒來了，所以革命的情形可以看見；（丁）第一次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現在已佔了地球上六分之一的領土；蘇聯的存在可以繼續把世界革命化。所以從全世界看來，現時是有革命的環境的。（註一）

這種有學識的論文，毫無疑問地給紅色的教授和蘇維埃領袖間有學問的人以精神上的安慰。不過我們要知道，大部分俄國人不識字的，對於共產黨淹博的邏輯自然不能理會。所以更切實的，更具體的，更容易懂的東西，變成很需要。假如現在要恢復革命初期英雄的精神，那俄國應該規定一種易於理會而又比較簡單的工作，不要叫一般人坐下來回想革命的環境，最近革命的環境，和馬上革命的環境這種奧妙難解的變遷。如蘇維埃的領袖們由艱苦的奮鬥中懂得馬上革命

（註一）俄國共產主義布爾希維克黨第十四次會議報告書，第三〇六至〇八頁，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是一種冒險的事情。在工業化和改造國家整個組織的偉大的綱領中，會規定了新的必要的工作，這工作實肇基於斯達林的口號：「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因為有這種理論，黨的鬪爭便於一九二四年秋天開始了。

第四章 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

黨的鬭爭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是記載着長期的內部鬭爭和分裂。一九〇三年，布爾希維克（多數黨）與孟雪維克（少數黨）在倫敦會議時的決裂，雖然當時並不覺得怎麼樣重要，但對於將來有很大的關係。那時候所注重的是策略上的問題，不是原則上的問題，並且這種鬭爭很像黨的領袖們的相互競爭，不像真正的分裂。布爾希維克黨與孟雪維克黨劇烈的鬭爭，在以後的幾年間還繼續着，就是社會民主黨內的布爾希維克黨所採取的政策，也缺乏和諧的精神。大家記得，一九一七年專制顛覆，革命初起的時候，有幾個後來當蘇俄重要領袖的人物（斯達林也在內）對於列寧所提倡的無產階級獨裁，設立蘇維埃的國家爲本黨最近的目的等綱領，毫不同情，並且願意援助民主共和國，聊當進行社會主義的初步工作。關於十月至十一月的政變使布爾希維克黨得勢

的時間性的問題，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托洛斯基到一九一七年才加入布爾希維克黨，許多老同志們看見他在十月革命和內戰的時期佔着重要的地位，很難諒解。就是布爾希維克黨變成神聖俄國的領袖，如採用俄國共產黨的名詞後，黨員中也不能完全不發生意見。我們已經知道，反對列寧的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政策者，是左派共產黨和托洛斯基自己。一九二〇至二二年，所謂『勞動反對黨』成立了這團體常與史來亞尼可夫 (Shlyapnikov) 的名字聯在一起，它給新經濟政策以嚴厲的批評，謂這政策是把布爾希維克黨真正革命的目的完全放棄了。列寧與『中等階級』的農民聯絡，勞動反對黨則認為出賣無產階級。柯倫泰夫人 (Madame Kollontai) 在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裏說：『我們不能容認，新經濟政策是使資本主義能夠站得住，能够在俄國復活。』安他諾夫 (Antanov) 很粗魯地說道：『黨的中央委員會爲了一碗好菜湯把無產階級出賣給農民。』據左派反對派的意見，新經濟政策完全破壞革命的工作，把『萬千俄國無產階級送給這個可恥而又可憐的制度。』世界革命也不能使俄國脫離新資產階級——農民和小商人——的統治。假如無產階級要達到它的目的，第三次革命是必要的。(註一)

一九二四年列寧逝世後，黨的內訌達到一種新的更尖銳的時期，逐漸變爲托洛斯基與斯達林公開的鬭爭。個人爭取領袖權的問題固然也有，不過在共產黨內不能同時容納斯達林和托洛斯基。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則上的問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與斯達林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不能兩立的。共產黨第十四次會議時（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托洛斯基、齊諾維夫和加孟涅夫所領導的『新反對派』接近，這派人從前曾反對托洛斯基和斯達林的意見。一九二六年，新反對派與托洛斯基聯合起來，他們否認社會主義能够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實行。這兩派間的鬭爭在各種蘇維埃的組織和共產黨的會議中繼續進行。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會議，就是一九二六年十月至十一月所開的第十五次會議。這會議實際上斷定反對派的罪狀，它的判決書經該黨第十五次會議批准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那時候，托洛斯基在蘇維埃行政上的一切職務一步一步被人褫奪了。一九二五年正月，他被罷免海陸委員會的職務，一九二六年秋天，他被逐出政治部，一九二七年，開除黨籍。第十五次會議後，他被放逐到亞爾瑪。

（註一）吉新斯基前揭書，第七〇至七一一頁。

亞塔(Alma Ata)一九二九年到土耳其。俄國革命一個領導的人物從此離開蘇維埃的舞臺了。那班遲延懺悔和遲延宣布托洛斯基主義爲異端的信徒們，也受同等的虐待。

爭點

斯達林與托洛斯基的爭點並不算新奇。一九〇五至〇六年，社會主義的著作家已經有這種爭論，一九一五、一九二一，及以後的幾年間也有爭論。新經濟政策成功後，這問題變成很重要，而且由理論的方面進爲實際的政策了。蘇聯在最近的幾年間將採什麼政策呢？它的目的——毀滅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沒有變更；它的方法，應以『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之有無而定。假如這種辦法是沒有希望，那麼俄國的經濟改造顯然是站在次要的地位，而蘇聯的整個力量應集中起來，與資本主義的國家作直接的即刻的鬭爭，因爲資本主義的推翻，是達到最後目的的唯一方法。另一方面，假如不管敵對的資本主義的環境是怎麼樣，在蘇聯境內可以成立社會主義，那麼俄國的經濟改造便有完全新的意義，從國家的觀點看來是這樣，從世界無產階級

的眼光看來也是這樣。社會經濟的成功，拿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相對照，對於促進共產主義的工作更有無限的影響。當資本主義的國家正鬧着失業及『無政府的生產』和浪費所造成的經濟恐慌的時候，社會主義的俄國則過着興旺的、快樂的、自制的生活，這種情形實有利於蘇聯。但是蘇聯暫時不妨對階級的敵人退讓，這種退讓並不是退卻；它只是策略上的運用，最後使蘇聯的地位更形鞏固。從共產黨內大部分同志看來這種似是而非的議論顯然是違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教訓。因此，舊的理論必須加以修正，使黨相信『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創造者是列寧自己。這意見經過黨的會議的議決案正式承認，並且變成蘇維埃信條的主要部分。

斯達林的新理論變成劇烈辯論的焦點，這辯論達三年之久，雖然在一九二五年四月黨的十四次會議所通過的那個著名而又常被引用的議決案『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的目的』裏已經正式承認。這理論引起幾千頁辯論的文章。幸虧它的基本的論點很簡單，使研究這種驚人的辯論文章的人不感着多大困難。這大概是因為雙方的作家都採取一致的方法的緣故。關於這方法，想讀者早已知道，在蘇聯裏要證明什麼問題，必須先證明列寧曾有同樣的主張，因為他是最大

的權威。列寧與「在單獨一個國家裏成立社會主義」這問題沒有直接的關係，在他的著作裏關於這問題的意見也不很多。所以在整個辯論的過程中，無論贊成或反對的人常常複述相同的引言和解釋。爲明瞭「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正式的議論，我們將根據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至十一月三日俄國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時，斯達林所呈交的那篇論反對派和國內情形的報告書最新的最可靠的譯本。（註一）

三個問題

斯達林很適當地指出，黨的分裂是集中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是否可能的問題。這問題內又包含着三個單獨的問題：（一）雖然蘇聯現在是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惟一國家，雖然世界革命的速度來得很遲慢，但是俄國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否可能呢？（二）假如這種勝利是可能，那麼它可以稱爲完全的最後的勝利嗎？（三）假如這種勝利不能稱爲最後的勝利，那最

（註一）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報告書，第四二九至五六頁，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後的勝利所需要的條件是什麼呢？

這三個問題中，頭一個最困難。要得到滿意的答案，斯達林覺得自己不得不修正「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

修正恩格斯的理論

斯達林承認前世紀中葉（指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內——主張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一定不能成功；必須幾個更前進的更文明的國家同時發生革命才行。這意見在那時代完全是對的；這就是說，在壟斷的資本主義與列寧所發現的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定律（關於這問題，下邊有所討論）還沒有出現以前。恩格斯的共產主義的原則那篇草稿裏已經明白說過，後來這草稿變為共產黨宣言的基礎。這草稿成於一八四七年，但是到最近才發表出來。恩格斯問：「〔無產階級〕革命能否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呢？」答道不能。創立世界市場的大規模的工業，使世界上一切人民，尤其是文明國的

人民，發生密切的關係，彼此都是相互依賴的。大規模的工業把一切文明國家的社會的發展弄平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到處變成兩個重要的社會階級，這兩個階級的鬭爭便是我們這時代主要的鬭爭。所以共產主義的革命不是在單獨一個國家，而是在一切文明的國家裏同時發生的，最少是在英美法德四國。每個國家進展的情形，須看工業發展的程度，財富的積聚，現有的生產工具的多寡而定。所以它的進展，在德國是特別慢而難，在英國特別快而易。對於世界各國，它也有相當的影響，並且完全變換和促進它們發展的路線。這是世界的革命，所以必需有全世界作競爭場。」

(註一)

斯達林指出恩格斯沒有提到俄國，可以算一個特點。不過事情自然會這樣，因為當四十年代恩格斯著作的時期，俄國還沒有無產階級。不過八十年前非常對的學說，對於二十世紀世界的一般情形已失去效力了。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承繼者的資格而論，列寧的真正偉大處，在乎他不肯做馬克思的死文字的奴隸。他充分地捉住馬克思所時常注重的思想，謂他的教訓不是什麼教義，只

(註一) 恩格斯：共產主義的原理。參看俄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第三一七頁，一九二三年版。

是行動的指導罷了。列寧不把馬克思主義當做一種教義，而把它當做一種方法，以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情形。斯達林說：「列寧的真正偉大，在乎他肯公開地、忠實地、無畏地提出新公式的必要問題，同時他又敢宣稱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是有成功的可能性。」不管人家怎樣反對，上述的一段話，大可以應付那班老是堅執馬克思的舊公式的人。

帝國主義

據斯達林的意見，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預見五六十年後的情形，沒有一個人可加他們以嚴厲的批評。不過托洛斯基和他的朋友們則罪不容恕。列寧是馬克思信徒中第一個把帝國主義當做資本主義最新最後的階段，並且把它拿來作深刻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他的結論是：在單獨一個國家裏成立社會主義是很可能。一九一五年列寧說：「以獨立的口號而論，那個「世界聯邦國」的口號是很不適宜的第一點，因為它與社會主義混爲一談；第二點，對於單獨一個國家裏社會主義成功的可能性，和該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都不甚明瞭。經濟的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是

資本主義絕對的定律。所以社會主義在幾個或單獨一個國家裏得勝利，本來是可能的。已勝利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既沒收資本主義的財產，組織國內社會主義的生產後，便可以起來與其餘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反抗，並且引誘各國的被壓迫階級也組織起來與各該國的資本主義反抗，遇必要時，還可以使用武力以反抗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因爲『除非社會主義共和國先與其他的國家作長期的鬭爭，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團結是不可能的。』（註一）

列寧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是由資本主義發展不均衡這定律演繹出來的，這定律到底是什麼呢？斯達林說，這定律可以簡述如下：列寧以自己所分析的現時的一般情形當做出發點，他覺得舊時的資本主義已轉變爲帝國主義；世界經濟的發展是在劇烈的鬭爭下進行，主要帝國主義的國家，爲領土、市場、原料等東西而鬭爭；世界瓜分爲若干帝國主義國家所統治的勢力範圍已經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很不均衡，這就是說，它們不肯按先後發展，或按平行線發展；它的路線非常不規則，它證明那個最前進的國家一定被擠出，把新的國家放在最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三三頁。

前線；在這種情形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不免會引起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鬭爭和戰事，藉以重新分配這個已被瓜分的世界；這種鬭爭和戰事會把帝國主義弄得衰弱；結果各國的帝國主義很容易毀滅，因此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是很可能的。

爲證明這種議論的真實性起見，他便徵引現代世界史的例子。直至最近，英國是主要的帝國主義的國家。以後德國想在世界上佔一個地位，把各國，尤其是英國犧牲了。這種利益衝突的結果，是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大戰。大戰以後，美國是做領袖，英國和其他歐洲的國家都落後了。這種情形毫無疑問地會引起新的鬭爭和戰事。

俄國革命的經驗，證明在現代的情形下，並不一定如恩格斯所說的帝國主義勢必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裏崩潰下去，而是在無產階級能與其他社會團體作有力的聯絡的國家，如俄國的無產階級之與農民合作一樣。帝國主義的鏈鎖最微弱之處一定先被打斷。所以第二次的革命很可能地在印度得到勝利，那裏的無產階級有強有力的聯絡，以作國家解放的運動，而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者。

列寧與托洛斯基

斯達林指出，列寧這種意見，馬上引起托洛斯基的爭論。一九一五年托洛斯基說：「反對『歐洲聯邦國』的口號比較具體的歷史的議論，是見於瑞士社會民主黨報（*Sotsial Demokrat*）」當時布爾希維克黨的機關報，用俄文寫成的。」這種議論是：「政治的經濟的發展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絕對的定律。」因此社會民主黨便下了一個結論，謂只有一個國家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所以叫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獨裁制都依賴「歐洲聯邦國」的設立，未免太多餘。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毫無疑問地是不平衡的。英、奧、德、法帝國主義的水平線是不一樣的。不過拿這幾個國家來與非洲和亞洲相比較，那它們可以代表社會革命已經成熟的資本主義的歐洲。現在必需複述一種初步的原則：在鬪爭的過程中，沒有一個國家肯等待另外一個國家的，恐怕平行的國際行動，被人誤會為耽誤國際行動。我們既然不等待別人，所以我們便在自己國內繼續鬪爭，深信我們這種啓發會引起其他國家也起來鬪爭；假如這事情沒有希望，那麼我們也不能希望俄國能够在

資本主義的歐洲維持下去，或者社會主義的德國能够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孤立。」（註一）

斯達林指出，托洛斯基的意見與列寧大相反。列寧說，假如無產階級能够在一個國家裏奪到政權，它不但能生存，而且可以往前幹——沒收資本家的財產，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援助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托洛斯基則相信，假如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勝利，沒有別的國家馬上跟着革命，那麼這個已勝利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勢必喪失它的政權，更不用說創設什麼社會主義了。列寧把無產階級當做有積極的力量，富有創造性，組織社會主義，和準備幫助其他國家。托洛斯基把它當做消極的羣衆，靠其他國家馬上革命的援助，自己『躲』在政府裏，生怕馬上喪失政權。

斯達林說，列寧與托洛斯基的意見這樣分歧，在後來的幾年間還是這樣。一九二一年，因為新經濟政策，勞動反對黨謂蘇維埃政府已經出賣社會主義。列寧常說新經濟政策沒有放棄舊目的，它只是變更方法罷了。它把「我們的經濟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和農民」……「都受勞

（註一）托洛斯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八九至九〇頁；這篇文章先在報紙上發表，以後收在他的文集和平的綱領裏邊。一九一七年八月版。

工階級的領導』

托洛斯基似乎故意要辯駁列寧的意見一樣，他於一九二二年一月發表他所著的一九〇九年的新版。在導言裏他說已經奪到政權的無產階級『不但會與革命初期幫助它的資產階級的團體鬭爭，而且會與那般幫助它奪取政權的農民鬭爭。在一個廣有農民的落後國家的工人政府裏，一切矛盾都要在大規模的世界革命的場合裏才得到解決。

大約一年之後，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演講時，又提到俄國社會主義的問題。他說：『社會主義已經不是最遠的將來，或是抽象的，或是偶像的問題了。對於偶像，我們還是像從前那樣反對。我們已經把社會主義放在日常生活內了，現在我們應知道怎麼樣幹。這是我們這時代的問題。在座諸君啊，我對你們說，雖然這問題很困難，雖然這問題與從前的不一樣，雖然一切工作都要等我們幹，但是我相信我們能够犧牲一切來解決這問題，使現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註一）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部，第一〇八頁。

針對列寧這種說法，斯達林又在托洛斯基於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和平的綱領的導言裏找到一個答案。托洛斯基說：『有的讀者以為和平的綱領裏邊常見的爭點——無產階級革命不能不在一個國家裏得勝利這爭點——已經給蘇維埃共和國五年來的經驗駁倒了。不過這結論是不對的。工人政府既然能够在一個落後的國家裏得生存，足證其他更前進更文明的國家裏無產階級的力量，一定能做更好的奇蹟。不過以政治的軍事的觀點而論，我們的國家還沒有達到設立社會主義的社會……只要其他歐洲的國家還受資產階級的統制，我們因為經濟孤立，不得不想法與資本主義國家成立諒解；同時我們相信這種諒解最多能補救我們經濟上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促進這方面或那方面的進步，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真正的發展，必須等主要的歐洲國家的無產階級勝利後才可能。』

據斯達林的意見，列寧關於『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重要議論，實見於他死前所發表的兩篇論文，這兩篇論文應視為列寧的政治遺囑。一九二三年，列寧寫了一篇論文，批評沙克哈諾夫（Sukhanov）及其他『第二國際的英雄』的嚴格的態度，因為他們不能

充分把握住馬克思的革命辯證法，只知道一點皮相的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列寧說：「他們的爭點是多麼陳舊啊。在西歐革命的時期，他們已經學到這爭點，並且宣稱社會主義的時期現在還沒有成熟，用一個「博學」的紳士的語氣說來，成立社會主義客觀的物質條件，我們還沒有得到。」列寧提出一種意見，謂沒有一個普通的計劃可以應用於一切情形，反之，某種計劃應按某種情形而定。他說：「假如社會主義的成立，需要一定的文化水準，那麼我們爲什麼不用革命的方法來取得這水準所需要的東西？我們現在既然是屬於蘇維埃制度下的工人農民的政府，爲什麼我們不進一步把俄國與其他國家間的鴻溝彌補起來？」（註一）

列寧死前所著的最後一篇論文論合作社，其中有段斯達林認爲很重要的。在這篇論文裏列寧說：「一切生產工具都受國家的統制，而政府則受幾百萬無產階級的統制。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是這樣，後者是受前者的領導。合作社的成立，從前我們認爲是商業的機關，就是在現時新經濟政策下，我們還這麼看法。要成立完全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是不是需要合作社呢？合作社雖不算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部，第一一八至一九頁。

建設很完備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但是那種社會已經能够供給我們的需要的……假如不是因為我們的國際關係，假如我們的義務不是為全世界而奮鬥，那麼我便很願意說，我們活動的中心現在已移到文化的工作上面了。』（註一）

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

但是這就算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麼？對於這問題斯達林作否定的答覆。蘇聯已毀滅了俄國的資本主義，她自然能够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不過外國干涉的危險和復辟的可能性還是無法擔保。蘇聯是處在有敵意的資本主義的環境中。她的生存對於全世界有很大的影響。如謂資本主義的政府對於蘇維埃的發展和增加權力會善意相待，這未免把實際的情形當做幻想了。資本主義者討厭俄國革命，一天比一天增加。為使蘇聯免得陷於被干涉和復辟的危險，現時資本主義的環境必須先換成社會主義的環境；要達到這目的，必須先有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無產階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部，第一四〇至四四頁。

級得到勝利。所以俄國社會主義的勝利，不但是目的，而且是達到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勝利的方法。列寧也有這種意見，他說：『我們不但是在一個國家裏生存，而且是在一個統系的國家裏生存。蘇維埃與帝國主義的國家能够共存得多久，現在實不能想見。結果一定有一個國家勝利。但是在過程中，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的國家自然免不了有劇烈的鬭爭。這就是說，假如無產階級要實行統治權的時候，必須以軍事組織來證明。』（註一）由這段文章裏，斯達林下個結論，謂外國的干涉將來還會繼續實行。至於資本主義國家敢不敢嚴重地干涉俄國，那又當別論。一切問題都以資產階級國家的勞工階級的態度為轉移。蘇聯的國際地位，大部分是看國際無產階級能否同情。假如不同情的話，那麼它們早已準備進攻布爾希維克的國家了。列寧的話是很對的，他說：『在蘇聯還是與資本主義的國家為近鄰的時候，如謂這種危險能够消滅，未免過於滑稽。因為只要基本的矛盾還存在，這種危險自然也會存在，無法避免的。』（註二）因此，列寧說『最後的勝利必須等世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〇二頁。

（註二）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四〇八至〇九頁。

第四章 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

界各國的工人肯共同奮鬥，才有希望。」（註一）

「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勝利是有什麼意義？這就是說，設立無產階級獨裁，創設社會主義的經濟，以消滅國內資本主義的成分。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是有什麼意義？這就是說，完全保障沒有干涉和復辟，這種保障是由其他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可以得到。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是把國內的矛盾消滅了，如俄國一樣，這辦法很可能；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是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國際矛盾解決了，要達到這目的，必須有國際無產階級革命。

新理論的重要性

有人會覺得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討論，實在荒謬絕倫，共產黨最好集中精力做實際的工作，不要浪費時間作這種無益的辯論。斯達林是第一個作這種批評，他說這與列寧主義的態度毫不相干。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二八七頁。

斯達林說，除非蘇聯知道往那方向走並且有一定的目的，它是不能前進的。假如不堅信成立社會主義是很可能的話，這目的便無由實現。假如共產黨能看清它的前途，它便能指導社會主義的改造。它不能接受柏因斯坦（Bernstein）只顧行動不問目的這意見。反之，共產黨的行動必須適合階級鬭爭的最大目的。這才不至陷於機會主義。除非看清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除非確信它能够成功，那無產階級的羣衆便不能盡心參加和領導農民。對於革命的前途如失去信仰，結果便增強國內資本主義的成分，而把各國革命運動遲延下去。大家須記得世界無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有無限的趣味，並且希望它能够成功。世界各地的大批勞動代表到俄國來熱心研究新的發展，從促進世界革命的觀點看來，這種情形可以證明俄國在經濟那方面的鬭爭是非常重要。凡人想遲延蘇聯社會主義的成立，同時便會毀壞國際無產階級的信仰。這就是說，他已毀壞國際無產階級的信條。列寧的話是很對的，他說：「我們現在是以新經濟政策來促進國際革命。世界各國的工人都注意蘇維埃共和國的，這並沒有例外，也沒有說得過火。在這方面，這次鬭爭已算大規模了。假如我們能解決這問題，那麼我們毫無疑問地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之所以特別

注重經濟改造的問題者，就因為這緣故。我們必須慢慢地（其實是快不來的）往前進展的。（註一）

斯達林主張，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討論，並不是無用或迂腐的討論。我們是討論迫切的真正的問題；這問題之能否解決，是靠蘇維埃所做的工作及最近的將來它所用的方法能否成功。（註二）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部，第二八二頁。

（註二）斯達林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先驅，應算服爾馬（Volman）於一八八七年所發表的論文『單獨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服爾馬說：『在現在的一般情形下，將來恐怕也是這樣，我們知道幾個國家同時起來革命的假設是絕對不可能……我們現在成爲單獨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了，雖然這並不是惟一的可能性，但最少趨勢會這樣。』服爾馬這種議論是與當時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相似，他們謂無階級獨裁制不能同時發生。不過他的議論比較的前進，所以能與後來斯達林的主張有密切的關係。據服爾馬的意見，社會主義的德國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在經濟上有密切的關係，並且能夠利用自己的低廉的生產和高尚的技術。他的整個理論是根據這種假設，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能相安無事地共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進展，證明它的生產組織的大勝利，並且把世界革命的必然性消滅了。社會主義之戰勝資本主義，完全因爲市場，及其低廉成本所生的廉價的工具。（托洛斯基：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第一三六至三七頁，一九三〇年，巴黎版）。否認世界革命的必然性，不消說是與斯達林的主張相衝突。

托洛斯基的批評

我們已經知道斯達林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是與讀者所知道的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相衝突的。這問題的中心思想是，世界各國是有密切的相互依賴。一個國家社會的經濟的組織不能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恰如社會主義不是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一樣。托洛斯基和他的朋友們也不承認，列寧之所以偉大在乎他是新主義的真正創始者。托洛斯基們也研究過列寧的著作，他們覺得其中有很多材料，與斯達林的意見完全相反。托洛斯基發現列寧於一九〇五年所寫的一篇論文的草稿裏邊有下列的一段饒有趣味的話：「在民主革命的時

候，勞動運動得勝了。資產階級便起來做反革命。小康的農民和許多中等階級決定採取慎重的態度。可是後來他們也屈服了，並且參加反革命，致使他們從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掌握中奪回政權。……假如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及時起來援助俄國的無產階級……那俄國農民的鬭爭一定了無希望，它的失敗一定無法避免的。」（註一）托洛斯基指出，上邊的一段議論確是托洛斯基

義，不過以一種最卑鄙的方式表現出來。

列寧又說：『俄國的〔民主〕革命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得到……除非西方也起來革命。假如沒有這個條件，復辟是免不了的，因為一切私有財產者都是復辟的主要人物。無產階級成功後，小資產者勢必反對無產階級。』（註二）

托洛斯基認為俄國蘇維埃的政治成立後，列寧還是這樣主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列寧說：『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社會主義不能得完全的勝利，它必須有幾個先進的國家努力合作的。』托洛斯基堅主：『列寧的最後的勝利，』並不是指保障外國不干涉，而是指幾個先進的國家的真正合作。列寧的意思是：俄國的落後情形所生的內部的矛盾，除非有世界革命，便無法消滅。托洛斯基覺得，這就是他自己與列寧完全相同的地方。（註三）

（註一）列寧的論文集，第五卷，一九二六年列寧格勒列寧研究院版。蘇聯共產黨第十次會議的報告書第五一六至一七頁曾引用此文。

（註二）列寧全集，第十卷，第四一五頁。

（註三）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報告書，第五二三至二四頁。

托洛斯基還提出其他證據來擁護他的主張。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列寧說：『我知道一班自信是聰明，並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的學者們主張我們不要負政府的責任，除非等各國的革命都告成功。他們不知道自己所說的話是否認革命，而與資產階級相提攜。要等待勞工階級來做大規模革命，就等於叫我們一動也不動地坐下來期待。這話是太荒唐。革命的困難誰也知道。現在雖然有一個國家得到勝利，但革命一定會經過大困難的時期，因爲只有各國的工人肯共同奮鬥和作大規模的運動，才有成功的可能。』（註一）

一九二一年俄國共產黨第十次會議時，列寧說：『近十年來，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裏有雇傭的農工。只有雇傭的農工這階級充分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才能變爲社會主義。在我們的許多著作和宣言裏，我們說過俄國的情形並不是這樣。俄國的工業工人佔少數，而小農民則佔絕大多數。在這樣的國家只有下列的兩種情形可以使社會主義革命得最後的勝利：第一種，是一個或幾個先進的國家以及時的社會革命來援助它；第二種，是無產階級與大部分的農民成立諒解……我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二八七頁。

們知道，與農民成立諒解，才能够保護俄國的革命，並且等各國也起來革命。」（註二）托洛斯基指出，列寧在這兒說任何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最後的勝利必須有兩種條件，第一種是一個或幾個先進的國家及時起來作社會主義的革命；這種條件，對於像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尤其重要。（註二）

托洛斯基自然承認，蘇聯在恢復經濟這方面不消說有長足的進展，但是他又抗論這意義不可說得過火。據最高經濟委員會的估計，俄國到一九三〇年才能够恢復一九一三年的經濟水準。但是，一九一三年的水準是怎麼樣呢？這水準是痛苦、落後、和野蠻。它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沒有關係，因為後者是要消滅城市和農村的矛盾，增進普通的福利，物質的安樂，和文化。這一切情形要到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卷，第一三七至三八頁。

（註二）托洛斯基也指出，布哈林所主持的委員會曾起草了共產黨青年團的簡章，這簡章曾經列寧於一九二一年批准。簡章的第四條說：「蘇聯政府的統治權已經在勞工階級的掌握中了。在反抗資本主義的三年間，無產階級已增強蘇維埃的權力了。雖然俄國的富源很雄厚，但她是個工業落後的國家。她要得到社會主義的革命，必須經過無產階級革命；不過我們現在已進到無產階級革命這時期了。（托洛斯基：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第一三一至三二頁。）

最遠的將來才能實現。列寧於一九二二年也發表同樣的意見。他對於布爾希維克主義成立的第一个蘇維埃國家的成功——開人類歷史上的新紀元——予以很大的褒獎，但他也很坦白地說：「我們還沒有完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呢。資本主義的餘孽說不定還會起來把我們已經做完的成績毀壞。我們應該認清，並且公開地承認，沒有一件事情比幻想更危險的。我們已經承認並且宣稱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謂社會主義的勝利必須靠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之共同努力。」（註一）

斯達林（註二）引用論合作社那篇論文來證明列寧贊成「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可是托洛斯基覺得那篇論文的意思是完全相反。在那篇論文裏，列寧指出成立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他舉了五點：第一點，是生產工具的所有權；第二點，無產階級的政府；第三點，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絡；第四點，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第五點，合作社。最後的一點是不很完備。共產主義者沒有主張社會主義能够在「任何」單獨國家裏成立的。譬如說，假如保加利亞已具備這五

（註一）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部，第四八七頁。

（註二）參看前揭書，第一四二至四三頁。

種條件，恐怕也沒有人肯真正相信保加利亞會成立一個完全社會主義的制度在任何單獨國家裏，社會主義的成功，顯然需要其他重要的條件，如地理上的地位、富源、技術的知識和文明。列寧所說的，是單指政府所有權、組織的形態。他並沒有說過他所開的條件是很完備而詳盡。他那篇論合作社的論文，不過擴大他從前的意見；並沒有修正它。（註一）

「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辯論令人難解的地方，是斯達林最近轉變的理論。一九二四年四月，他說：「在單獨一個國家裏，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把它轉移到無產階級，並不見得能夠完全保障社會主義的勝利。因為社會主義的最大目的——社會主義生產的組織——還沒有達到。假如沒有幾個先進國家之共同奮鬥，這問題便能夠解決，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的社會主義便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麼？這是不可能的。根據我們革命的經驗，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力量自然能夠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但是為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一個國家，尤其是以俄國這樣多農民的國家的力量是不夠的；這事情必須幾個前進國家的無產

（註三）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報告書，第五二七至二八頁。

階級之努力。對於別的國家革命的發展和援助，是革命已成功的國家的重要職務。所以革命已成功的國家，不該把自己看做一個自足的國家，反之，它應該援助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得到勝利。」

(註一)

上述的一段話，與幾個月後斯達林所發表的意見完全相反。同年十二月，他寫了一篇論文來解釋，它的內容就是我們現在很熟悉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基本思想。他把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社會主義的勝利和最後的勝利分別得很清楚：前者是很可能，後者則單指消滅外國干涉的危險。(註二)托洛斯基和他朋友們之不能接受這種解釋，實不足深責。他們總不會忽略這種事實，在斯達林舊的論文裏，他並未有提出干涉的問題，反而很明顯地說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社會主義生產的組織——在俄國這樣多農民的國家不易達到。托洛斯基說：

(註一)斯達林：論列寧與列寧主義。第六〇頁，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

(註二)斯達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之策略。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斯達林：論反派那篇論文第一五五至五九頁，又把它再印出來。參看斯達林問題與答案。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

這種思想是很健全的。假如把俄國的情形寫成這樣，以為俄國的共產黨好像蓋了一座屋子，而站在外邊的敵人會把它的窗子打破，這未免太滑稽了。干涉就是戰爭，戰爭就是政治鬭爭之另一種說法，而政治鬭爭本身又受經濟成分的決定。所以這問題包括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整個經濟關係。如謂俄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只限於干涉，這實在有點幼稚，他們的關係是無限深刻而又更具體的。

據托洛斯基的意見，在單獨一個國家裏成立社會主義的整個問題，是玄學上的，不是實際政策上的問題。假如我們承認，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是可能的話，那麼問題便發生了。在這過程中，歐洲會怎麼樣幹呢？據托洛斯基的意見，蘇聯經濟建設的完成，最少要三五十年。在這時期內，假如歐洲無產階級一定能勝利，那麼這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同時共產主義的前途也很安全。但是，假如不勝利，那麼會發生什麼變卦呢？托洛斯基指出有三種可能性：（一）現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均衡還維持下去；不過這種辦法太不穩健，恐怕繼續維持三五十年也不可能。所以托洛斯基不贊成。（二）資本主義恢復原狀，繼續發展表明它還沒有完全盡它的歷史使命。這種假

設與共產主義的基礎相反。假如有人證明這假設是對的話，這就是說布爾希維克主義現在還來得太早。這樣一來，資本主義便可以利用武力和勞工來消滅共產主義了。（三）資本主義已經衰落了；爲什麼勞動者不起來設立無產階級獨裁制，以得最後的勝利呢？多麼悲觀呀！如有人相信，在單獨一個國家裏以農民的幫忙來成立社會主義，比較援助歐洲先進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還容易，這話是沒有政治上的或理論上的根據。托洛斯基說，假如上邊的議論是有理由，那麼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問題便不發生了。（註一）

齊諾維夫的態度

把『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切批評拿來作詳細的研究，是大可不必。上邊所說的東西，已經將雙方意見的矛盾及其引用和解釋列寧時所用的笨重的方法說了一點。從廣義說來，在辯論的初期，批評斯達林的人所注重的地方，在乎俄國實行社會主義時所遇的困難，這

（註一）蘇俄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報告書，第五三一至三三頁。

種困難是由俄國的教育基礎和文化水準的低下發生出來的。在辯論的後期，尤其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開第七次執行委員會大會的時候，（註一）因世界各國有密切的相互依賴所生的國際上的障礙，更受人特別注意，並且給人用來作反對新理論的主要理由。這就是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主要的部分，想大家是早已熟悉的。

關於齊諾維夫的態度，這兒要敘述幾句話，一半是因為他還在共產國際佔重要的地位，一半是因為他的態度有顯著的轉變。一九二四年，齊諾維夫是托洛斯基主義最激烈的敵人，而且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共產黨第十四次會議的議決案的創造者，這議決案是『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之權威言論。他以雄健之演講來援助它，這正得斯達林的贊成。（註二）以後的幾個月間，他的意見變換了很多，我們知道一九二六年他與托洛斯基合在一起，對於從前自己所

（註一）世界革命的方法。載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報告書，卷一和卷二，一九二七年莫斯科版。

（註二）齊諾維夫：資本主義局部的穩定和共產國際的目的。載在共產國際第五號，第二八至四六頁，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

促進的理論大加反對。一九二六年夏，他甚至宣稱『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教訓，與斯達林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機會主義的無稽之談，毫不相干。』

(註) 據說齊諾維夫的轉變，是因為他到很晚才知道，如接受斯達林的意見，勢必使蘇聯對於促進世界革命和集中精力於國內改造的問題的熱心冷淡下去。

一九二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共產黨開第十五次會議時，齊諾維夫站在托洛斯基那邊來反對斯達林他特別討厭斯達林打算修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訓。他不承認這種主張，謂共產黨宣言所根據的原則現在已經太陳腐。他說，在列寧的著作裏並沒有這種言論。反之，一九一八年列寧會這樣說：『社會主義偉大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經過數十年時間觀察勞動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深知資本主義的變動必須悠久的過渡時期，在這時期內，一切舊的東西和資本主義的一切制度都被毀滅；這種工作是需要各國工人的合作，他們應共同努力以得最後的勝利。他們說：「法國人開始，德國人完成這工作。」……我們現在知道國際社會主義力量的聯合，是與

(註) 齊諾維夫列寧的共產國際二十一條件。吉新斯基於前揭書第一四〇頁曾引用。

前不同。我們說，在壓迫階級的國家裏容易開始運動，因為它們有機會掠奪和利用勞動階級的領袖……我們現在知道革命是怎麼樣發展；俄國開始，德、法、英三國將完成這工作，使社會主義得到勝利。」（註一）齊諾維夫說：『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綱領的修正，不過這綱領是與「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毫不相干。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從來不放棄原有的意見，謂達到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是國際革命。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當共產黨宣言發表了之後，馬克思有一句我們時常引用的名言：「任何歐洲的國家或整個歐洲的政變如果沒有英國參加，便等於在茶杯裏起颶風一樣。」一八八五年恩格斯注重這事實，謂第一次共產組織的黨員間主要理論上的聯系，是他們相信歐洲的革命能夠勝利。」（註二）

齊諾維夫宣稱，俄國不消說會成立社會主義，不過她之成立社會主義，必須與世界各國合作，與世界革命合作；這種革命一定會發生的。列寧很明白地說出，在這時期內應怎麼樣幹。一九一八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八七至八八頁。

（註二）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報告書，第五七一至七三頁。

年四月，他說：『當我們還是孤立的時候，我們的目的在乎保護革命，最少要保護這革命根據地——不管這根據地是怎麼不重要——等到各國也發生革命。』（註二）這才是蘇聯真正的唯一的旨趣，這與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荒謬思想，沒有一點相同。

新國家主義

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討論，大可證明齊諾維夫謂新理論會放棄世界革命和發展新國家主義，並不是毫無根據。這種國家主義精神的表現，使斯達林陷於指使俄國共產黨變成非馬克思主義的罪名。人家常說，俄國共產黨把自己看做選民的領袖，並且充滿着救世的精神，這與社會主義者所厭惡的俄國反動者的思想很相似。但是，更令人討厭的是，俄國共產黨對於內政的問題有一種純粹資產階級的『國家自給自足』的趨勢，這與他們從前想做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嚮導的思想大相反。蘇聯一部分人對於世界革命採取兒戲的新觀念，自然會引起革命『狂飈時代』的

（註二）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二三二頁。

領袖們的反對。一九二六年秋天共產黨開第十五次會議時，斯達林及他的屬員會這樣說明。

斯達林關於這問題的意見，我們已經很熟悉。這時期內斯達林最熱心的擁護者布哈林說，雖然資本主義的國家所加於俄國的壓迫是很嚴重，不過這種壓迫並不是絕對不能克服的。他覺得俄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部分，但是他的態度是與齊諾維夫不同。他覺得，增強蘇聯的地位就是促進世界革命。沒有一個國家會給中國革命以精神上的援助，工團對於英國礦工的罷工也沒有幫忙；所以『俄國共產黨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根據地』（註一）這話實不能否認的。

奧新斯基（Ostinsky）宣稱蘇聯設立社會主義，不但是爲自己，而且是爲世界無產階級，『因爲俄國既然得到設立社會主義的經驗，世界無產階級也可以用得到。從這一點說來，光是我們的國家已算設立社會主義了。』不但經濟方面是如此，其他範圍也莫不如此。譬如說，國家行政方面，很可以給新成立的蘇維埃國家以實際上的教訓。蘇聯的軍事組織——紅軍——尤其是俄國的

（註一）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報告書，第六〇三頁。

文化工作，也有同等的好處。凡此種種都是屬於世界無產階級。奧新斯基說：『就是現在，我們也不能不承認蘇聯已變成社會主義文化的中心點。』（註一）

列寧死後，人民委員會主席的繼任者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時常複述大家已經熟悉的議論，謂俄國無產階級一定能很成功地實踐它的職務。蘇聯之能夠達到它的目的，實在毫無疑義。同時他又說，大家須記得共產主義很迅速地傳播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工階級，俄國偉大事業的成功是促進無產階級革命的要素。蘇聯每次的新勝利，給世界無產階級以更直接的更有效的幫忙。所以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很可能地與世界革命同時發生，或者相連屬着。『這就是說，假如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因故遲延，那麼單獨一個國家（指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就等於最後的勝利；這就是說，這種勝利不但能取消內部的，而且能取消國際上的障礙，以完成社會主義的發展，因此達到共產主義的勝利……現在和將來我們的黨的政策，是要使我們國內的社會主義得到勝利的政策，同時也是使世界社會主義得到最後勝利的政策。』（註二）

蘇維埃領袖們這種宣言，不外複述斯達林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共產黨第十四次會議時

所發表的意見。在斯達林給該會議的政治情形報告書裏邊，他敘述黨在國際革命運動上的目的。他說，這目的中有三項已經得到公衆的承認：（一）堅固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叫羣衆信仰共產主義；（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團可以與蘇聯和勞動聯合會發生密切的合作；（三）蘇聯可以與被壓迫國家的解放運動作密切的合作。除上述三項大家都已承認的目的外，斯達林加上第四項，在蘇聯本部，社會主義必須戰勝資本主義的份子；俄國社會主義的成立是把其他國家的工人革命化的主要因素。以促進世界革命運動所採取的政策而論，斯達林指出大家時常忽視下列的事實：『俄國爲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份子的鬭爭，爲建設的鬭爭，在本質上便是國際鬭爭，因爲我們的國家是國際革命的基礎，因爲它是革命發展的原動力，所以我們如果能使俄國進展得很滿意，這就是說，我們已經按本黨的需要，在國際革命運動的各方面盡我們的職務。』（註三）

（註一）前揭書，第六一六頁。

（註二）前揭書，第六七三至七四頁。

（註三）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會議報告書，第二六頁，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我們知道，從世界革命的觀點看來，斯達林在一九二六年的時候已經不再說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重要性被人家忽視了。反對黨已完全失敗，托洛斯基已被放逐，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不但得正式承認，而且很努力地置諸實行了。

共產黨內兩個敵對的份子之解釋列寧的學說是否不錯，我們用不着多事嘆舌。自然托洛斯基和他的朋友們的情形很值得嚴重的考慮。另一方面，斯達林的理論對於進行這樣明白而有力的國內政策，是有顯然的方便。此外，斯達林有些政策在文字上精神上都違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教訓。不過我們知道，斯達林從來不承認他有什麼違背的行動。不管共產主義新理論在學理上是多麼微弱，它在實際上的影響是不錯的。據斯達林的意見，這新理論把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暴發的前夜的俄國情形告一結束，那時候年青的共產主義者很想放棄他們在莫斯科的研究和工作，跑到柏林去，因為他們覺得俄國的革命已經沒有希望了，他們的義務應該是保護德國的京城。這種態度現在給人認為『反革命的機會主義』。蘇聯現在是開始實行工業化和經濟改造這種空前的大計劃。這大事業的理論上的辯護，已見於斯達林的新理論了。

第五章 新理論的國際意義

最近的推論

俄國共產黨因世界革命不能實現致陷於絕境，自從該黨正式承認「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正統的列寧主義後，它便得到一條出路。當它接受斯達林的理論的時候，同時它也承認資本主義穩定的時期。一九二四年共產國際開第五次會議時，還堅持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最近的鬭爭是非常迫切，可是到了一九二五年，它又正式承認資本主義已達到暫時穩定的時期。(註一)蘇維埃的領袖們現在很鎮靜地把世界革命的問題攔置下來，因為他們在國內要應付一種偉大的工作，我們知道他們認為這種工作就等於促進共產主義的最高目的。五年計劃已經擡頭了，不久就可集中全國的注意點。

(註一)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會議報告書，第十和第九五七頁。

資本主義世界所流行的「無政府的生產」勢必發生生產過剩和蕭條的經濟恐慌，可是計劃的經濟便沒有這種毛病，這就是大家所公認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假設。當蘇聯與白色軍隊和資本主義國家作戰的時候，它自然沒有工夫實行計劃的經濟。一九二一年，採取新經濟政策和恢復各國的常態關係之後，蘇聯在內政和國際上的地位都有顯著的改良。因此，蘇聯馬上便提出國家經濟計劃的綱領。國家計劃委員會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倒是一九二一年設立的。

(註一) 最初，這制度不大引人注意。直到「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被人正式承認後，它的範圍大見擴充。一九二五年，它發表了第一任「統治的人物」一九二六年，提出五年計劃，一九二七年，又加以修正，這是大戰後世界史上最重要的發展。這計劃是經濟的實驗，所以必須等到內戰停止，協約國不封鎖俄國，及新經濟政策的採用使經濟逐漸恢復後，才能够實行。

這些條件雖然都很重要，但它們不足以說明蘇聯所開始的新而偉大的工作，除非先把握着蘇維埃政府近來已經得到的「信心」——不管資本主義的國家怎麼樣，反正社會主義能够在

(註一) 一九二〇年二月選出國家電業委員會，這是比較早的計劃團體。

俄國境內實行。把斯達林的言論複述一次，假如有人不深信這種工作可能的話，那社會主義便無法成立。在沒有叫全國爲這個偉大目的的最後勝利作大犧牲以前，共產主義的領袖們要自己和黨徒們相信這種犧牲不是白費的，並且他們現在所幹的偉大事業已經得到革命先知的列寧的祝福。這種方法的應用，我們早已知道了。

新理論必然的結果，是以五年計劃來作實際上的表現，這就是把共產黨領袖們的趣味從國際轉移到國內問題上面。俄國迅速地工業化，如斯達林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所說的一樣，必須與先進的國家作密切的合作。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會議時，斯達林宣稱：『以國際關係而論，我們必須發展當時形勢危急的整個時間內俄國與資本主義共存的情形，雖然這兩個對立的團體的競爭是越來越利害。這可以保障國內的經濟改造，同時因爲外國發生經濟關係，把我們經濟改造的速度增加了。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的關係逐漸增進，使我們更要依賴他們，所以本黨在經濟改造的過程中，必須注意這種新危險，努力保障本國的經濟獨立。』（註一）因爲必須

（註一）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會議報告書，第五一三頁。

與國際經濟合作而發生的許多重要問題，是不容易和共產主義傳統的方法相調和的。

中國革命

如謂莫斯科政府之更改遺訓和國內政策，使蘇聯的外交政策有突然的轉變，這不消說是錯誤了。東方的問題當一九二三至二七的幾年間，頗費蘇維埃的領袖們的考慮。蘇聯之與歐洲各國發生關係，並不是放棄革命的活動。西方革命的失敗，自然令他們轉向列寧所認為很重要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

世界帝國主義根據地的中國，似乎能够使革命宣傳煽動整個東方。真的，大戰後中國的一般情形給共產主義作活動最適當的場合。蘇聯駐華公使加拉罕稟承莫斯科的計劃，在中國活動，頗得相當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九月，鮑羅廷 (Michael Borodin) 跑到廣東，不久就變成中國政治上的重要份子。莫斯科在斯達林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下，不惜犧牲精力和金錢以造成中國蘇維埃共和國。關於這種辯論，我們不想詳述。不過大家要記得中國的共產革命恰如西歐一樣，沒有成功。一

九二七年夏天，鮑羅廷被逐回俄國，他的最高目的沒有達到。現時東方也不肯聽從莫斯科的領導。這是一種新的嚴重的打擊。因此蘇維埃的領袖們更堅決地要實行他們已經開始的計劃——在俄國國內成立社會主義。

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

把工業化的綱領所生的國際經濟合作的政策，變成共產主義的一種理論，這工作的確是很繁重。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八月所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便實行這種工作，滿足了斯達林和他的朋友們的願望。上一次或第五次會議是一九二四年夏天開的。第五次至第六次會議，中間斷了四年，這中斷的原因並沒有正式說明。托洛斯基說，這是因為共產國際的領袖們老是希望國際的發展，希望最少有幾個殖民地的革命會成功，或者會發生大罷工，以證明資本主義行將衰亡。我們也許可以猜想遲延召集世界革命的重要團體的原因，是在乎莫斯科要避免蘇聯和資本主義間的衝突，因為這種衝突對於工業化綱領所依賴的國際貿易關係有所妨害。資本主義國家非常注

意，而又疑懼共產國際的活動，尤其是自所謂「齊諾維夫的信札」發表了之後。還有一種遲延的原因，是在修正共產主義基本理論和預備共產國際綱領這種重要文件時所發生的難題。在這綱領裏，斯達林的新理論已視爲共產國際政策的主要部分。

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完全受斯達林和布哈林的支配。齊諾維夫、托洛斯基及反對派中次要的領袖們，已經退出政治舞臺了。從外表看來，布哈林也許可算第六次會議的主要領袖，不過這一次也可算他的最後的活動了；因爲他是右派反對派的一個黨員，該派對於斯達林的過激政策多所評論，所以他不久便湮沒無聞了。（註一）雖然他在第六次會議時的地位很不穩固，但是關於召

（註一）關於這問題，大家須記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會議時，斯達林的預言式的議論。那時候，

齊諾維夫、加孟涅夫二人與托洛斯基非常不對，他們要求開除托洛斯基的黨籍，斯達林獨不謂然，他說：「我們與齊

諾維夫、加孟涅夫兩位同志的意見不同，因此我們知道開除黨籍對於本黨有很大的危險。開除黨籍就等於流血的
方法；今天開除一個，明天再一個，後天又一個，結果黨內還能夠剩餘幾個人」（報告書，第五〇二頁）。齊諾維夫和加

孟涅夫後來從艱苦的經驗裏學到這種教訓。

集國際會議，決定將來世界革命運動的計劃，他倒負大部分的責任。

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盡了一種偉大的職務。它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預備了一個綱領，內容不但包括了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決定共產國際與共產黨所實行的一般政策。據說，這政策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客觀分析來研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鬭爭的情形，尤其是根據一九一七年後革命運動的實際經驗。爲充分明瞭共產國際的綱領起見，我們必須同時研究第六次會議所採取的『論文和議決案』(Theses and Resolutions)，它們是討論國際的情形，反對帝國主義的鬭爭，殖民地 and 次殖民地的革命運動，特別討論共產國際在各種情形下的任務。這種重要的文件，洋洋數萬言，並且奠定了很完備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倫理的系统。所以用幾頁文字來敘述這具體的思想，誠非易事。但是一般的理論背景，還須加以敘述，使讀者能够明瞭蘇聯最近的態度，尤其是它與外國的關係。

共產國際的綱領

共產國際在第六次會議以前還沒有成文的綱領。它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於一八四八年所寫的共產黨宣言，與共產國際列次會議所發表的宣言和議決案作嚮導。從前最重要的宣言，譬如說，一九一九年第一次會議，和一九二〇年第二次會議的宣言，都出於托洛斯基的大手筆，可是到第六次會議的時候，他已給人放逐了。在蘇維埃統治的初期，大家已經渴望有一個完備而又具體的共產主義的理論，一九二二年第四次會議時又討論這問題。那時候，有幾個國家的共產黨，如德、保（保加利亞）意、日等國的共產黨，曾提出綱領的初稿。這事情當時便擱置下來，因為列寧提議此事須詳加研究。第六次會議的初稿，是由一個特別委員會預備的，並且大部分是出自斯達林和布哈林之手。

如謂共產國際這樣的國際共產主義的團體，敢公開地反駁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教訓，不消說是近於妄想，雖然我們也知道局部的修正是很可能的。共產國際的綱領，保存共產黨宣言內全部革命的語法；從文體和不妥協的語氣的觀點看來，它與最初幾次會議的文件實相彷彿。不過革命的語法可以包括許多事情，恰如基督的教訓與異教徒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的酷

刑絕對不相同。所以，在這不妥協的革命的言論裏邊，我們應該努力去發現這綱領及其實際的意義的眞意。在沒說我們的重要任務以前，略述這綱領的內容，未始毫無補益。

這綱領分爲六部分和一篇導言。(註一)開頭它便說明帝國主義的時代就是行將死亡的資本主義的時代。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大戰，及戰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不過是各國間的矛盾直接的結果。它們成立了一種難堪的情形，其補救的方法，只有把資本主義推翻。現在這機會已經來臨了。資本主義慣用鐵血和饑餓的方法，迫得一切種族一切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推翻他們的敵人。帝國主義不但成立了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而且『同時召集軍隊來掘自己的墳墓』。它使無產階級團結於第三國際的旗幟下，這第三國際是各國人民爲毀滅帝國主義而組織的軍事團體。『共產國際的綱領，是國際革命的無產階級運動整部經驗最精密的概論，它變成世界無產階級獨裁鬪爭的綱領，就是爲世界共產主義而鬪爭的綱領。』共產國際是站在『革命的馬

(註一)這綱領的英文本，是根據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會議紀錄的一部分，載在國際通信第八卷第三九至九二號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五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維也納版。

「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立場上。它毫不妥協地反對任何階級合作的理論，它是唯一的國際力量，以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並且公開地認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者。

導言之後，就是第一部，「世界資本主義的制度，它的發展及其無法避免的衰亡。」開頭便簡述以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生產工具私有權的罪惡；剝削工資勞動者；無政府的生產，致使生產過剩，循環的經濟恐慌，和羣衆失業；資本的集中，小本生產者的落伍，大部分實因工藝的前進和大規模生產的利益；工人越來越依賴資本家，致使無產階級大受剝削，女工童工大見增加；社會上分爲兩個敵對的團體，一方面是沒落的資本主義者，另一方面是不斷地增加的被剝削的痛苦羣衆。普通說來，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外發展，犧牲落後的國家以成立殖民地帝國的時代。

二十世紀初期，帝國主義或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開始了。這時代的特點是，工業資本給銀行資本吞併了，從前是自由競爭，如今則一切事情都被財政資本所支配。雖然競爭並沒有消滅，不過現時因財政上的合併，把競爭的規模更放大了。因爲需要投巨資於重要的機器和大規模的生產，

所以發生這樣的競爭，利潤率的降低，和奪取新市場。同時國外投資也迅速地增加；爲取得燃料原料而發生的鬭爭，更是到處都是。這一切情形自然會引起帝國主義國家設法重新分配現成的領土。在表面上是什麼封鎖政策，提高保護關稅，但是結果總不免有帝國主義的戰爭。帝國主義的發展，不但使無產階級羣衆與雇主發生尖銳化的衝突，而且與整個資本主義國家衝突，同時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的人民也有所衝突。帝國主義只是把工業資本主義的矛盾放大了，而且生產力大發展的結果，使世界更易變爲社會主義。帝國主義的戰爭，給無產階級增加了許多負擔，這正表明這個制度活該沒落。壟斷的生產者爲延緩生產力發展起見，於是便採取劃一物價的政策。社會民主黨所主張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只是一種幻想罷了。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矛盾也無法補救。『這時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後階段，同時又是世界社會革命的起點。』資本主義行將沒落了，無產階級獨裁制勢必取而代之。

這綱領既然成立資本主義一定沒落的理論，它便進一步考察實行的方法。該綱領第二部便討論這問題『資本主義的一般經濟恐慌，及世界革命的第一階段。』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戰爭，

就所謂第一次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爭想重新分配領土的结果。它震撼帝國主義的全部機能，所以必然地發生階級鬭爭的深刻化和內戰。截至現在止，只有俄國在內戰上得到勝利。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都告失敗，因為勞動領袖們時常叛變。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蒂主義，是無產階級和世界革命的最大敵人。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的穩定，不過是暫時的事情。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把世界分成兩個敵對的營壘：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一方面是无產階級獨裁的蘇聯。這兩種制度是完全對立的。自俄國的無產階級得到永久的根據地後，無產階級的鬭爭才變成大規模的鬭爭。『蘇聯的存在，及它對全世界勞苦而又被壓迫的羣衆的影響，正是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和階級鬭爭達到空前的擴大化深刻化的表現。』在這當兒，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最明顯的是，經濟中心已轉移到美國了；此外，『因金圓共和國變成全世界的剝削者，使美國和歐洲的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國帝國主義的關係破裂了。』美國和英國的衝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時又有德國和舊協約國的衝突，美國和日本的衝突。擁有雄厚的燃料和原料的蘇聯之退出帝國主義壟斷的團體，更加重資本主義間的鬭爭。殖民地和外國壓迫者的對敵，資

本和勞動的對敵，也非常深刻化。勞動者之所以參加革命，因為他們的組織、政權、生活程度都被人干涉。這一切條件——資本主義的相互衝突，殖民地的不忠，國內工人之不滿意，蘇聯革命的影響等等——對於資本主義不完全的穩定有很大的阻礙。世界革命快要降臨了。『帝國主義集中全力對付這革命。它的重要政策，是打算怎樣征服殖民地，怎樣反對蘇聯。這樣一來，國際革命的一切力量都得解放，而資本主義一定難免於沒落。』

第三部很簡單地討論『共產國際的最高目的——國際共產主義』，它要取消社會的一切階級，生產工具的私有權，人與人間的相互剝削，最後，要取消國家。共產主義的社會的最高形態是要實行這原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過當這世界沒有達到這時期的時候，必須先經過一度比較平易的組織，這種組織是沒有完全脫離資本主義社會所受的矛盾。

第四部是討論『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獨裁。』從帝國主義獨裁的世界到無產階級獨裁的世界，是要經過許多工夫，在這過程中，什麼經濟恐慌、戰爭、內訌、與相對的和平等事，都是在所不免。當這帝國主義的時代，資本主義之不均衡發展，各國不能同時發生革命。只有一兩

個國家先得到革命的勝利，因而把世界革命的基礎放大。無產階級之奪取政權，獨裁之成立，是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先決條件。這時期的特點是：資本主義者的反抗大受壓迫，並且把階級社會逐漸消滅了。無產階級獨裁制之設立，不能用議會式的和平手段。資產階級的統治是靠武力，所以推翻它時，必須使用更利害的武力。它應該毀滅資產階級國家的統制機關，而代以無產階級政府的新機關。

新國家的形式——如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形式——是蘇維埃的國家。這是無產階級民主國家的最高形態，與資產階級的完全相反。蘇維埃的國家是由無產階級獨裁的，並且也這樣地公開承認；可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制度下，實際上是獨裁，表現上又說什麼階級合作。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實行經濟革命，沒收土地，和轉換財產權必要的步驟。無產階級經濟政策的性質，是由各該國的階級關係而決定。在實行獨裁制的初期，買賣的一般情形還是維持着；它的本分是要把國家統制的工業以至農民的生產都能够得到適當的平衡。不過擴大的社會化的工業，和大規模的合作農業，應該完全不讓私人參加，結果市場的問題也逐漸能够消

滅。『戰時共產主義』雖然在奪取政權的時期是很對的，但是不可視為無產階級獨裁制的經濟政策的常態。

在無產階級獨裁制下，階級鬭爭還繼續進行。為消滅資產階級社會起見，武力的行使自然是免不了的。雖然從前的上層階級現在已經消滅，不過無產階級還須找到一部分有技能的知識份子，尤其是『貧』農和『中』農的羣衆。工業的工人掌握無產階級獨裁制的領導權，同時他們應該和農民聯絡。現在勞動羣衆的組織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組織必須以共產主義的思想灌輸一般羣衆。鄉村的合作社也有同等的工作。但是在無產階級獨裁制下，共產黨應掌握領導權，使蘇維埃的政府一定能得到羣衆的援助，反之，它便無法生存。除經濟的政治的革命之外，還有文化的革命，它的目的在取消階級社會，和完全改變人類的性情。資本主義惡勢力中有一種必須除掉的事情，這就是宗教——人民的麻醉劑。

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得很慢，它必須經過民族解放，和殖民地革命的階段。世界無產階級獨裁制就是這種革命運動的最後階段。從革命形勢的觀點看來，世界各國可以分爲三類：（一）資

本主義最發展的國家，如美、德、英等國，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獨裁制的環境已完全成熟了；(二)資本主義沒有十分發展的國家，如波、葡、匈和巴爾幹各國，這些國家的農業還是在半封建時代，所以要在這些國家成立無產階級獨裁制，必須先取得農民的援助；(三)「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印度和「依賴」的國家 (dependent countries)，如阿根廷 (Argentina) 和巴西 (Brazil) 等國還不能夠成立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共產主義的職務大部分在乎組織農民革命，及與外國壓迫者鬪爭。要在這樣的國家成立無產階級獨裁制，只好慢慢而來，同時也需要已勝利的無產階級國家的援助。至於非常落後的如非洲某部的國家，實際上是沒有本地的資產階級，所以無產階級的鬪爭應該集中起來，反對外國人，及為民族獨立而鬪爭。落後的國家既然有已勝利的無產階級獨裁國家的幫助，所以它們當進行社會主義時，可以完全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這樣一來，蘇聯在領導世界革命的工作的地位，便大見提高。殖民地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是反對帝國主義最重要的工作。工業的國家和殖民地的國家的關係，好像工業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關係一樣；殖民地是「世界的鄉村」，工業國家則是「世界的城市」。二者在軍事上的聯絡，是

過渡時期萬分重要的工作。

這綱領的第五部是討論「國際社會革命時的無產階級獨裁」這就是說，它討論蘇聯與世界革命的關係。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大可以證明戰後的世界是分爲兩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和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成功，蘇聯對於無產階級羣衆和殖民地的被壓迫人民的影響的增加，就可表明國際社會革命之繼續深刻化和擴大化。」這十年來俄國共產黨所做的成績，很可以證明它的政策是怎麼樣，而且俄國現時設立社會主義，這工作一定能够在國內弄得成功，不管技術和經濟是怎麼樣落後。蘇聯既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唯一國家，它必定會變成世界上被壓迫階級運動的基礎，國際革命的中心，和世界歷史上的重要成分。蘇聯之所以重要，因爲它擁有世界的偉大革命的威權；它是世界革命的原動力，它給人一個很好的榜樣，謂勞工階級不但能奪取政權，而且能成立社會主義；它是將來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先驅。蘇聯的地位既這樣重要，它更應該爲生存而奮鬥，同時以「經濟的策略」來保護無產階級國家的利益。它的經濟政策，在乎擴大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只要後者對

於社會主義的建設有所補益。蘇聯在經濟上如能够獨立和自給自足，它便能奠定鞏固的基礎，作設立社會主義的偉大工作，免得它只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扈從。雖然資本主義國家現在喜歡和俄國發生貿易關係，它們也深知俄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點；它們的政策是要包圍蘇聯，把它打倒，因而設立世界資產階級的恐怖制度。但是，危險雖然到處都是，蘇維埃的國家還能够實踐它的使命，給世界各地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以援助，來反抗資產階級。

以蘇聯的地位而論，國際無產階級應該給蘇聯負一點責任。它的義務在以各種方法避免資本主義國家之進攻蘇聯。這是指先進國家的工人和殖民地的民衆。蘇聯社會主義的進展，及其在國際上勢力的增加，不但會引起資產階級國家和它們的社會民主黨的嫌恨，而且鼓勵世界工人的熱心和羨慕蘇聯的勝利，並且鼓勵他們堅決地擁護蘇聯，免得受外國的侵略。這事情會使資本主義的矛盾更深刻化，使革命的爆發更容易，結果資本主義自然而然地陷於崩潰的狀態。

這綱領的第六部是略述『共產國際爲無產階級獨裁制而鬪爭時所用的策略。』它開頭便否認一切非共產主義的勞工階級運動，如社會民主黨、阿姆斯特丹國際（Amsterdam Interna-

lional) 英國勞工黨 費邊社 (Fabianism) 法國季特 (C. Gide) 『合作的』社會主義 霍布孫和奧來格 (Hobson and Orange) 的『基爾特』社會主義 奧國的馬克思主義 無政府主義 革命的工團主義 和民族的過激運動；如孫中山 甘地 和格味 (Garvey)。這一切運動都是會叛變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他們唯一真正的代表，只有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在先進國家裏，共產主義的策略，大約與共產國際前幾次會議所定的原理相符：統制羣衆，援助殖民地解放運動，實行『勞動者聯合戰線』的政策，叫工團信從共產主義。共產國際特別與反抗帝國主義的鬭爭有關係。它應該否認資產階級和平的組織，尤其是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因為它們要縮小危險性；它應該做宣傳，以贊成共產國際的意旨，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裏宣傳。這種工作的基礎原則是這樣：把帝國主義的戰爭變爲內戰；打敗國內帝國主義的政府；擁護蘇聯和殖民地的國家。最重要的是，它必須揭破資本主義國家所成立的國際聯盟的陰謀。

這綱領最後引了共產黨宣言裏很有名的一段文字作結論：『共產主義者們不肯掩匿自己的意見和目的。他們公開地宣稱，只要以武力來推翻一切現存的社會制度，然後才能够達到他們

的目的。讓統治階級在共產革命時動搖罷。無產階級們只要脫離他們桎梏，便能夠得到全世界各國的勞工們，請你們團結起來罷！

綱領的分析

這綱領的簡述，已可以證明一般的趨勢和議論。它的內容包涵着不少革命的語法，使年青的男女們和太怯弱的政治家相信，共產主義的流毒好像傳染病一樣，能夠傳入國內，散布各處。布爾希維克主義好像傷寒病或猩紅熱一樣會傳染全國或國內某一部分。我們知道這綱領大抵是說資本主義無法避免的崩潰，並且擔保蘇維埃能夠援助世界革命。不過我們如果細心考察這綱領，那結論也許有一點不同。

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批評共產主義對工業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分析，雖然我們也敢說這綱領並沒有把馬克思的辯證法發揚光大。托洛斯基把斯達林和布哈林關於這綱領的政策當做「盲目的經驗論加上迂腐氣」。(註一)在極端反對和大公無私這方面，托洛斯基可告無罪，

而且他給斯達林的批評自然會帶一點諷刺的意味。他是世界革命忠實的名將，所以他對於共產國際的綱領的意見，是很有趣味的。

他把這綱領比做一個船，這船內滿載着一切現代的（馬克思主義）的工具，不過它的大槳帆故意往『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註二）這種種風浪裏衝。在這種情形下，風浪可以決定船的行徑，船內的工具則無能為力。雖然這綱領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可是它的明顯的弱點是在基本主題的矛盾，這主題是國際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是與國家政治上的阻礙不同，所以資本主義制度一定免不了沒落——此外，斯達林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也是弱點之一。世界經濟的相互依賴既然能使資本主義沒落，為什麼對蘇維埃的國家便沒有一點影響呢？這事情很難令人明瞭。這綱領之與從前共產國際的宣言不同，是因為它把蘇聯當做世界革命的重要成分。大家記得這綱領宣稱，蘇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日益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成功，

（註一）托洛斯基：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第二二頁。

（註二）前揭書，第一一六頁。

蘇聯給羣衆的影響的增加，使「國際社會革命繼續深刻化擴大」；蘇維埃政府的義務是要和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密切的關係；而國際無產階級的義務是要行使一切手段來擁護蘇聯。共產黨宣言裏的名句「無產階級們只要脫離他們的桎梏，便能夠得到全世界」並不是指俄國的無產階級。他們已經打破一切桎梏，而得到報酬了。不管世界革命的情形是怎麼樣，反正在俄國境內已經得到勝利。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所用的政策的不同，在服加（Varga）給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那篇論蘇聯經濟情形的報告書裏，已經說得很明白。他說：「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政府；在蘇聯裏，他們便擁護政府，擁護無產階級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我們贊成革命在蘇聯裏，我們贊成演進，贊成國內和平，贊成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我們要毀壞資本主義的制度；在蘇聯裏，我們要把階級社會變爲社會主義的社會，最後變爲共產主義的社會。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我們極端反對階級合作；反之，在蘇聯裏，我們便主張階級合作；並且無產階級之與勞苦的農民聯盟，正是蘇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真正基礎。」（註一）

（註一）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報告書。第五卷，第四頁。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這綱領宣稱，只要全世界無產階級得到勝利，把自己的權力變成鞏固之後，社會主義進展的時代才能降臨。假如這裏所謂的勝利是指蘇聯，那麼，如托洛斯基所說的一樣，（註一）叫國家社會主義進而為將來的世界社會主義的，確不很切實。當這綱領的作者們熱心做「五年計劃」的時候，他們似乎已忽略或忘記國際分工這個大原則。曼紐斯基（Manuisky）在第六次會議時就提出這批評，他說俄國在經濟改造時所遇的一切大困難，完全因為它與外國間缺乏真正的合作。他說：「我們深知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得我們必須把經濟的基礎放在國際分工上面。」（註二）不過這種意見在該綱領裏沒有說明，而且在蘇維埃領袖們促進工業化的口號中也沒有提及，因為這種意見對於世界革命進展恐怕沒有多大的幫助。

帝國主義的戰爭

（註一）托洛斯基：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第一四八頁。

（註二）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報告書，第五卷第六三頁。

我們已經說過，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裏，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如今斯達林的理論又使共產主義者陷於不易解決的難關。資本主義的矛盾因而使帝國主義的戰爭無法避免，這問題在第六次會議的綱領和議決案裏不知道說了多少次。帝國主義的戰爭既無法避免，並且會變成內戰，又會進為革命，那麼諸位可以說共產國際一定歡迎帝國主義戰爭，因為這種辦法正是世界革命成功的捷徑。可是共產國際偏不肯這樣幹。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時，大部分的時間都拿來討論這問題，結果就定一種議決案，討論「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及共產主義者的任務，這種文件只有把這綱領的言論更加充實罷了。」共產國際宣稱，戰爭的真正原因，自然不在人類天性之不良，或者政府所用的政策之欠佳，只因社會分成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所致。雖然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戰爭是無法避免，但蘇聯則一切和平。據說，這種政策全是為俄國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着想；因為他們的目的在乎擁護國際，保護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它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及資本主義的假裝和平。所以蘇聯的政策，並不是如社會民主黨和托洛斯基所說的一樣，與資本主義相提攜。它不過是現在對資本主義進攻別種更有利的方法。俄國無產階級

怕帝國主義戰爭會影響他們，所以他們也準備採取一切必要的方法。『帝國主義者一面修理軍備，一面佯論和平，這種政策是有很大的矛盾。反之，蘇維埃政府爲自衛爲革命而戰爭，及其一貫的和平政策，其中並沒有一點矛盾。無產階級獨裁制所發生的革命的戰爭，可以算是用「其他方法」來延續和平的政策罷了。』上述的一段話似乎有點模糊，不易令人取信。但是共產國際會議之害怕帝國主義者『必然地』會進攻蘇聯，及蘇聯之採取自衛的手段，免得世界無產階級受影響，這種事情是非常明顯的，就是局外人也能够看得到。自一九二五年以來，蘇聯越來越厭惡戰爭，這心裏也許與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戰爭是無法避免的，戰爭會引起內戰和革命——相矛盾。不過它倒是斯達林『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必要成分。恰如第六次會議時，英國的代表貝爾（Bell）所說的一樣，『蘇聯現在沒有別種野心，它只注意做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的事業，它需要和平好像人家需要空氣一樣，它需要和平來發展無產階級的國家。』（註一）蘇維埃的領袖們現時只注意這種事業，所以他們對於最近世界革命的事情已經冷淡下去了。

（註一）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報告書，第二卷，第二四頁。

帝國主義的戰爭既無法避免，蘇聯又堅決地不要戰爭，這種矛盾的情形，始終未見過蘇維埃的著作家們有什麼充分的解釋，除非我們肯使用上邊引用的話，說「無產階級所發生的革命的戰爭，可以算是用「其他方法」來延續和平的政策罷了。」我們承認這個莫明其妙的句子的真意，實在不能明白，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不大熟悉的緣故罷。不過列寧和布哈林二人曾負了第六次會議的大部分責任，據說他們自己也不能夠充分瞭解這意思。

蘇聯戰前的政策，在理論上不管是有怎麼樣弱點，但是在實際上的重要性，是毫無疑義的。雖然蘇維埃的報紙頭幾張老是記載戰爭的問題，雖然坦克車機關槍運過赤區列寧墓前發出嘈噓的聲音令膽怯的外僑看了害怕，可是蘇維埃的政策顯然地要避免新戰爭。我們已經知道這理由：蘇聯需要和平，恰如人家需要空氣一樣，使本國內能夠設立社會主義。

第三時期

第六次會議那篇論國際情形的「論文」也反映出蘇聯要保護社會主義這事情。我們曾指

出，蘇維埃的領袖們頂喜歡整齊的富有組織的歷史的系統。現在我們想敘述的『論文』就可以證明。據這篇『論文』說，大戰後世界已經過好幾個時期，每時期都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制度日就衰落。第一時期，是最尖銳化的經濟恐慌的時期，它的特點是公開的革命鬭爭。一九二一年，它已達到高峯，一方面是打破外人的干涉，蘇維埃統治的鞏固，和共產國際的組織，另一方面是西方的無產階級給資本主義打倒。直至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失敗，這第一時期才告一段落。這次失敗也可以算第二時期的開始，它的特點是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和蘇聯的迅速地恢復經濟狀況。第三時期就是現在，它的特點是，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經濟發展的水平線都比戰前為高。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這樣迅速地發展，它的內部的矛盾也迅速地加重，這原因在乎生產力不能與市場按比例發展，蘇聯的繼續生存……等等。這第三時期免不了有各種戰爭——帝國主義間的相互戰爭，反對蘇聯的戰爭，民族解放的戰爭，和大規模的階級鬭爭。國際矛盾和內部矛盾的深刻化，加以殖民地運動的發展，自然使資本主義不能穩定，而且加重一般的經濟恐慌。總之，第三時期是資本主義穩定行將結束，新的革命戰爭無法避免的時期。這樣，使蘇聯的改造在國際革命上的地位更形重

要了。

這『第三時期』大受反對派和托洛斯基的批評。托洛斯基說這是『共產國際錯誤的第三時期』。他們說，偉大的革命鬥爭快要臨頭這話，是毫無根據。自然他們贊成新的經濟恐慌和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但是他們也指出，共產國際的情形好像一個人天天預斷第二天會日蝕一樣。姑定有一天是日蝕，但沒有人肯相信這位先生是個真誠的天文學家。共產國際的領袖們之相信『第三時期』也是這樣。（註一）雖然托洛斯基自己的預斷也有錯誤，但是他的批評我們是很同意的。本來討論將來的事情，尤其是討論世界的事情，是一件冒險的工作。從斯達林布哈林二人在第六次會議所定的一般政策說來，『第三時期』把蘇聯所遇的困難更說得非常嚴重，對於蘇聯是很有益處，因為這樣能引起國內外的同情者肯努力擁護無產階級獨裁制的第一個國家。

國家共產黨

（註一）托洛斯基『第三時期』共產國際的錯誤，第三五頁。第一九三〇年巴黎版。

非共產主義的讀者們很辛苦地看完各種蘇維埃團體的報告書和記錄後，暫時不必再去研究高深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或那種乾燥的事實，只來討論共產主義運動的真正發展，這也許會給他們以精神上的安慰罷。這些實際而又平庸的插話，使人知道一點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運動的真正進步的，確是比較親切而有趣味。這種好處完全因為共產主義的領袖們肯坦白地和開誠布公地作自我批評，而且像他們擁護真理時毫不妥協一樣，他們對於實際上的錯誤和失敗也願意承認。第六次會議的議程，大可證明共產黨在組織和工作兩方面都有可以改良的地方。我們現在隨便引了幾個批評來作例子。服薛梨夫 (Vasiliév) 在那篇國際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報告書裏，很悲哀地承認本團還有許多應該幹的事情。在蘇聯以外的國家，本團的團員不上十萬人，就是這個不關重要的數目，也時常變動，現在毫無繼續發展的表現。這種組織的主要目的——叫團員加入大工業的機關，以便成立共產主義的細胞——完全沒有實現。一九二七年年底，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共產主義青年在大工廠裏做工，其餘百分之八十四人在小商店裏工作。團員名單的『流動』是很明顯的。(註一) 瑞士的代表鮑特曼 (Bodemann) 訴說共產國際中央機關的趨

勢是把小國內共產黨員的數目看做不甚重要。就是關於非常緊急的問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不肯答覆。他說：『我可以下個結論，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只是自己空忙，實際上與共產國際的政治領袖們毫無關係。』從莫斯科寄到瑞士的大部分『文件』都是過時的，或者是不能應用，就是宣傳的方法也不很適當。譬如說，共產國際的主要刊物今天在第一版上用大號字說明，反對派的被逐是由於資產階級通信社的造謠，明天在同一刊物的社論裏說，反對派的分子已放逐到西伯利亞。無論如何，這種宣傳的方法，把羣衆對共產主義刊物的信仰都消滅了。（註二）

服辭梨夫又報告了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這事是關於美國春田城（Springfield）（註三）的共產黨的不幸情形。春田城原來有三十六個黨員，等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只剩了十六個。其餘的人到底是怎麼樣，誰也不知道。該黨員的社會地位是這樣：四個機械工人，三個拉大車的人，一個管家

（註一）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報告書，第一卷，第一二一至二七頁。

（註二）前揭書，第一三一頁。

（註三）該洲的名字沒有說明，也許是馬薩出塞州（Massachusetts）罷。

婆，二個金屬業工人，七個織物工人。該城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支部只有十二個團員，其中七個是中學生。春田城是一個有幾千從事工業的人民。服薛梨夫說：『像剛才我所說的那種社會基礎的黨，能够當真反對戰爭嗎？惟一的答案是，『不能！』』（註二）在其他共產黨的組織裏，反對戰爭的工作恐怕也不切實。第六次會議並且宣稱這種反對戰爭的活動是『太抽象太淺薄。』（註二）自然共產黨也有更完備的更實在的組織，但是當牠們還沒有變成強有力的工具，以推翻資本主義而代以無產階級獨裁制以前，還有許多事情是應該幹的。我想共產國際的領袖們當專心注意俄國革命及其成就的時候，他們免不了有這樣的考慮。

共產國際

一九一九至二〇年以來，共產國際所經過的悠久的路線，在第六次會議所提出的共產主義

（註一）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報告書，第二卷，第一三三頁。

（註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論，第六七篇論文。

運動的目的裏已明白的說明，姑再簡述如下：打倒行將臨頭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聯，反對外國干涉和瓜分中國，保護中國革命和殖民地暴動。（註一）在這些目的中，擁護蘇聯是佔第一位。該會議宣稱，假如帝國主義者戰勝蘇聯，這比俄國無產階級的失敗更厲害；同時這也是國際勞動運動史空前的失敗。結果便引起全世界的反動和白色恐怖。『因此，我們必須集中精力擁護蘇聯。我們大聲疾呼帝國主義快要集合武力來進攻蘇聯了，同時我們也應該努力把反對蘇聯的鬪爭變為帝國主義政府的內戰，藉以擁護蘇聯。』（註二）這就是共產國際最近的目的。不管共產國際的綱領和議決案裏的革命語法是怎麼樣，它顯然地從世界革命不妥協的戰鬥的總機關降為擁護蘇聯的國際組織了。它的最高目的，固然是世界革命，不過在實際上這目的已不重要了。真正的目的，還是關於蘇聯現在和最近的將來的政策。這政策在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時，已說得很清楚。它的內容是不顧一切犧牲來防止資本主義國家之干涉俄國的事務，並且在紅軍和世界無產階級

（註一）國際情形論，第三〇篇論文。

（註二）前揭書，第三二篇論文。

的保護下，努力在俄國境內建設很完備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還要看看這政策到底是怎麼樣實行。

第六章 向合作之路

第一步

第三國際第六次會議時承認蘇聯的經濟發展是世界革命的重要成分，及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接近是很必需的事情，這不過是正式追認莫斯科政府近年來所實行的政策罷了。大家記得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的密切關係的重要性，布爾希維克的領袖們於一九二一年已經承認，並且這也是新經濟政策必然的結果。直至斯達林戰勝反對派，和工業化的大綱領已採用後，這新理論的實際意義才被人賞識。恰如一九一四至一八八大戰的時候，各交戰國的政策都給『爲戰爭而犧牲一切』的口號一樣，『爲工業化而犧牲一切』的口號變成蘇聯最高的原則。

我們知道，蘇聯人民這方面的犧牲頗大；同時共產主義的基本思想也經過相當的修正。蘇聯的工業化政策，好像一個國家努力應付軍事危急的時期那樣努力。俄國共產黨的專門術語是，

「爲國家的生存而奮鬥。」蘇維埃的報紙老是說什麼「動員」、「前線」、「前攻」、「猛進隊」、「有策略的退卻」、「勝利」等等。鼓動全國熱心做五年計劃和擁護它的生存，這種辦法好像大戰時各處所用的一樣。不過這種類似軍事行動的政策，其實爲的是和平。蘇聯是個「準備軍實」的國家，打倒落後和貧窮，使它能够在本國境內設立社會主義。它很想先進的國家肯幫忙它作這樣的鬭爭。蘇聯這種對外政策的態度是不錯的。它與外國的關係，很一貫地採取兩條主要的路線：發展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和阻止新的國際戰爭。我們不知道蘇維埃的領袖們當真相信人家會進攻蘇聯呢，抑還他們只想國人以爲他們是這樣。不過帝國主義侵略無產階級制的危險，對於目前蘇維埃的思想也有兩點好處：它保存五年計劃的軍事精神，同時它與世界革命的道理永遠發生關係。

大家記得，一九二一年蘇聯與許多歐洲的國家恢復貿易關係，一九二四年得幾個主要國家的正式承認，其他弱小的國家也繼續這樣幹。同年英國與蘇聯的工團打算成立密切的合作。兩國間的工團大會也開始商議。至一九二五年四月，英俄開會議，結果產生了一個英俄委員會，作俄國

工團與國際工團聯合會聯絡的初步工作。英俄委員會的綱領的內容是，共同反對預付資本，阻止新戰爭，和團結國際勞動運動。但是俄英的勞動團體的合作並不成功。當英國工團不肯接受蘇維埃的提議去援助英國的礦工罷工的時候，衝突便發生了；後來該工團又不肯援助英國對待中國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三月），結果到那年九月，全盤計劃都失敗了。本來莫斯科政府想與英國的勞動運動和第二國際作大規模的「勞工聯合戰線」，這種工作是共產國際第三第四兩次會議時所接受的原則，不過共產黨本來不想「勞工聯合戰線」那些勞動的領袖們負世界革命運動失敗的責任。一九二六年七月，斯達林在中央統制委員會開執行委員會時，他把蘇聯對英俄委員會的希望說得很明白。他說：「英俄委員會的目的，在乎組織大規模的勞工階級運動，反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外國的干涉俄國，尤其是反對英國。」接着他便提出那種論調，謂國際無產階級的責任是要擁護第一個工人共和國反對干涉。他又說：「假如反動的英國工團願意與我們的革命工團聯絡，以抵抗他們本國反革命的帝國主義者，我們爲什麼不贊成這種聯絡？」托洛斯基指出，假如斯達林當真相信英國的工團是反動的話，那麼他希望他們反對英國帝國主義者這件事，

很難令人明白。雖然他把英國的新朋友叫做『反動』，但這不過是習慣上的說法，因為他的心裏真正希望他們會鼓起革命的精神。（註一）斯達林之渴望找得一種新保障，以抵抗外國的干涉，這也許對英俄委員會的運命有重要的關係罷。

經濟合作

蘇維埃的經濟政策，及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態度所根據的一般原則，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俄國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所接受的議決案裏，說明得很清楚。『自所謂的新經濟政策——使社會化的國家工業得與小農業的生產者同時存在——實行，我們的經濟發展的結果，已經充分證實列寧的論文，謂本國內有設立社會主義的一切必要的成分；蘇聯在經濟的社會的發展上一切客觀的內部的條件，完全不能表示它會崩潰，或者無產階級獨裁制會解體；農民的所有權與社會主義制度共同合作，並不一定使俄國的進展限於純粹的農業國家……國家設計的經驗，證明我

（註一）托洛斯基：列寧死後的國際，第二二七頁。

們的計劃必需時常修正，而且真正的計劃一定會作有機體的發展，和改良我們估計預料的方法。……據反對派的意見，在國際關係上我們的經濟活動的計劃，千萬不要把這種活動的最高限度的發展當做我們的出發點——這樣的原則，假如按部就班地實行起來，便等於取消國外貿易的壟斷，而把經濟軍事兩項都投降於國際資產階級。這樣一來，我們經濟的進展和社會主義的成立的速度都緩慢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根據我們與外國的經濟關係最高限度的發展的思想，只要這種關係（擴大外國貿易，外國信用，租界，聘請外國技術顧問等）對蘇聯的經濟能力有貢獻的話。我們應該使蘇聯不依賴資本主義的國家，擴大社會主義的基礎，作蘇聯工業上繼續發展之需。只要這樣幹，然後我們可以談到經濟關係最高限度的發展。」（註一）

自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後的幾年間，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上，倒能一貫地根據上邊我們所討論的假說來切實施行。從前不顧一切犧牲熱心作世界革命的人，如今放下刀槍來駕馭機械，他們寧願用勞動而不想用直接行動去達到無產階級最後的勝利。

（註一）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報告書，第二二九一至九二頁。一九二八年列寧格勒莫斯科版。

蘇聯必須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的關係，這個題目是蘇維埃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們最喜歡討論的。舉個例說，共產黨機關報——真理報（Pravda），考察工業化和集體農場對於俄德關係的影響後，很有力地說道：『這種種發展對於德國在蘇聯的利益毫無害處，反之，把德國在蘇聯的經濟活動的範圍更擴大了。大家記得，當德國工廠的煙囪吐出一陣陣黑煙的時候，俄國還是一個農業的國家。蘇聯很希望德俄兩國工廠的煙囪都能够吐出煙。』（註一）幾天後該報的社論裏又陳述蘇聯國外貿易政策所根據的原則。它說：『那些可以在國內生產的東西，不必再從外國輸入。這並不是說我們想禁止入口。我們要擴大，不要限制我們與世界經濟的關係；同時我們應該努力把我們的國外貿易達到這樣的地位，使我們的經濟得以發展，使我們的國家變成一個工業的國家——能够生產機器的國家。我們的入口應該幫助我們吸收最近的技術上的知識。』（註二）

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消息報（Izvestia），論俄德簽訂商業協定時，也發表同樣的意見。

（註一）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的真理報。

（註二）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的真理報。

該報的社論說「政治上沒有愛情，只有相互的利益。蘇聯不責備這次協定雙方簽字的人之坦白宣言。反之，我們非常贊成政治的實在性。我們只希望各國的工業家都受德國監督的領導。牠們既然滿意蘇聯的能力和干涉計劃的危險性後，便會注意到蘇聯工業化所擴充的商業範圍……在這世界上絕對的獨立是沒有的；我們的國家不管進步到什麼程度，我們只要有充分的能力以抵抗資本主義的國家，免得把我們降為奴隸就算了。至於國際分工之有利益，我們自然會利用。」

（註一）兩天後，該報又寫了一篇重要的論文來發展這種富有趣味的意見。「蘇聯願意與外國發生經濟關係，並且準備了一切必要的條件，使這種關係能夠成功。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能力的發展，同時便能增進世界市場的關係。只要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相安無事，（註二）這種發展是無法阻止的。」（註三）這意見我們覺得是很對的，不過蘇聯斤斤焉宣稱全不依賴資本主義國

（註一）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之消息報。

（註二）俄文原本是用斜體字印成的。

（註三）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之消息報。

家的話，未免與這意見分歧了。

外交

蘇聯之希望與外國接近，在它的外交上可以見到。自然它現行的政策並不是與從前截然不同。關於這方面的困難很多，但是這些困難並不一定都是蘇聯自己找來的。這時期內蘇維埃政治上最嚴重的打擊，是一九二七年五月英蘇斷絕關係。直至一九二九年十月才復交。

一九二七年世界經濟會議在日內瓦開會的時候，蘇聯的代表很動人地表示這種新態度。那時候，資本主義國家必需與社會主義制度合作的官方言論才尊重地宣佈出來。

更可觀的，是李維諾夫於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國聯裁軍預備委員會所擬的裁軍的綱領。大家記得，李維諾夫要求『即刻實行普遍的裁軍，』限一年內達到目的，雖然這綱領沒有實際的影響，可是它已經讓世人知道蘇聯不採取侵略的政策了。

一九二九年張學良搜查哈爾濱的蘇維埃領事館後，便於七月十日佔領中東路，這次事件馬

上發生萬分緊張的國際局面，即全世界對於遠東最近的將來的情形也很驚慌。蘇維埃政府訴於凱洛格約（Kellogg Pact，即非戰公約，因為這公約係美國國務卿凱洛格所提出，所以使用這名稱），但是，經過相當的軍力表示之後，這問題便由莫斯科與遼寧作直接磋商結果，中東路歸中俄兩國合管。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旬，日本佔領滿洲，又發生非常危險的新局面。一般的說來，蘇維埃政府對這次事件的發展（註一）是盡量表示退讓，因為蘇聯外交政策的總關鍵，在乎犧牲一切以避免戰事。固然莫斯科的外交部和蘇維埃的報紙會反抗日本的行動，同時報紙上也常說蘇維埃的軍隊往滿洲的邊界移動，但是蘇聯始終沒有阻止日本的佔領，甚至准許日本得在中東路運輸軍隊。這種辦法是侵犯朴次茅茲條約（Potsmouth Treaty）第七條，它的內容謂雙方贊成把滿洲的鐵路專門作商業上的使用，『不拿來作戰事用。』

蘇聯人民委員會的主席莫洛托夫，利用滿洲的機會來表示蘇維埃政府對於國際條約的態

（註一）截至作者執筆的時候止（一九三三年三月）還沒有解決。

度。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他說：『關於滿洲的問題，我們之所以採取不侵略的政策，實由我們尊重國際條約，尊重別的國家的主權獨立，和我們無條件的反對任何軍事佔領和干涉。不管帝國主義的干涉政策使用什麼外交手段來掩飾，我們蘇聯不得不擁護這目的。對日本的行動採取消極的態度。此外，我們實在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態度能夠表現蘇聯維護和平的一貫精神。』（註一）共產黨領袖的言論，也肯這樣贊成國際法，倒是令人驚異。真的，莫斯科的共產主義者頗懷疑自己對國際法這樣贊成，會不會引起遠東的朋友們謂自己反叛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此消息報很耐心地說明，雖然紅軍沒有親自援助中國，可是他們的心已經充滿着中國的問題了。該報說：『從遠東衝突的第一天起，蘇聯便採取嚴格的中立態度。蘇聯的工人，毫無疑問地是同情中國的人民，雖然後者在帝國主義的束縛下已陷於萎靡不振的狀態。我們對中國工人農民努力奮鬥的同情，絲毫不受我們嚴格的中立態度的影響，因為這種態度不過是遵從蘇聯一般和平的政策。』（註二）一九二

（註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消息報。

（註二）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的消息報。

三年，年青的共產主義者恨不得從莫斯科直衝柏林，包圍德京，爲世界革命奮鬥，如今這時代已過去了。中國的工人農民們，只好對俄國朋友的同情心表示滿意罷了。

不侵犯公約

比較莫斯科政府對滿洲問題的態度更明白的，是它對所謂不侵犯公約 (Pacts of non-aggression) 之非常熱心。大家記得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時，曾討論戰時侵犯的問題，並且加了幾點值得注意的評論。該會議決定，假如兩個資本主義國家打仗的時候，只要這戰爭是帝國主義必然的產物，那這問題便不會產生了。假如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與革命的國家相抗衡的時候，那麼重要的問題並不在乎誰是侵略者，而是要看一看那邊是反動，反革命，和剝削者，那邊是反對革命的帝國主義者。(註一) 這些議論似乎沒有餘地作不侵犯公約的政策，但是蘇聯當全世界沒有接受不侵犯公約和凱洛公約的時候，已經很熱心地懷抱這種思想了。在蘇聯執政的初期，它已接

(註一)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論，第九篇論文。

二連三地與亞洲各國商定了許多不侵犯公約。它對亞洲各國採取這種政策，並不是完全爲促進和平着想，而是要鞏固蘇維埃對東方人民的影響，因爲後者在世界革命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一九二六年八月，開始與波蘭商訂不侵犯公約，不幸第二年六月蘇聯駐波公使服可夫（Volkov）被刺，這事情便擱置下來。蘇聯也與立陶宛（Latvia）、伊索尼亞（Estonia）、芬蘭（Finland）商訂類似的公約，但當時也沒有成功。後來她們又繼續商議，直至一九二九年二月簽訂了李維諾夫的不侵犯草約（Litvinov non-aggression protocol）。蘇聯、伊索尼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Rumania）是這次協定的各方，後來又加入土耳其和波斯。雖然蘇聯已經有李維諾夫的草約，它還是與近鄰商訂直接不侵犯的公約，這次頗得到相當的成功。一九三一年七月，蘇聯與阿富汗在喀布爾（Kabul）簽訂不侵犯公約。同年蘇聯與立陶宛和蘇聯與土耳其的不侵犯公約重新更訂。同年九月，蘇聯與意大利成立協定，互通兩國的軍事消息。一九三二年一月，蘇聯與芬蘭簽訂不侵犯公約；二月與立陶宛；五月與伊索尼亞；七月與波蘭；十一月與法國。這一大批不侵犯公約頗引人注意，最少蘇聯自己是這樣想。此外，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蘇聯也與中國恢復邦交。

蘇聯對不侵犯公約的重視，於下述的事情中可以見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當滿洲事變最危極的時候，日本新任外長芳澤正要從莫斯科回到東京，李維諾夫代表莫斯科政府請日本外長也贊成不侵犯公約。這次商議就擱了好久，至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拒絕簽字。據莫洛托夫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報告這次商議的失敗經過說：『我們希望日本的拒絕簽字只是暫時的事情。我們的地位還是守中立和不干涉。不過最近日本某官長發表了錯誤的談話，這對於邦交很有阻礙。然而我們還想繼續我們的和平政策。』（註一）莫洛托夫關於外交的演講辭，是瞭解蘇聯的和平工作的關鍵。

蘇維埃政府非常注意不侵犯公約，蘇聯的報紙也時常登載這一類的文章。下邊引了一篇消息報所載的論俄波公約批准的文字做例子：『蘇聯的外交政策，除使用和平政策以號召羣衆外，沒有什麼一定的方針。我們想擴充和平政策到一切國家去；假如有的國家肯迅速地給我們以友

（註一）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紐約泰晤士報登載的杜安特（W. Duranty）報告書。這報告書與莫洛托夫演講辭的原文頗有出入。

誼的答覆，這也可以說他們已變換方針。蘇聯的政策是固定的。我們喜歡以互助的精神與各國實行和平合作；我們攻擊那些準備向我們挑戰的國家。」（註一）蘇維埃的報紙說話頗審慎。當蘇日公約正在擬議談判的時候，消息報說：「我們這樣崇拜不侵犯公約的重要，諒不至有人懷疑，這種公約能够阻止戰事的準備，同時也是以和平的方法來解決鬭爭。」（註二）

蘇維埃政府於一九二八年所簽訂的巴黎公約，或凱洛公約，始終得不到蘇聯報紙的好評。莫斯科政府很審慎地指出，它不相信這個新的國際的手段有什麼效能，它之所以簽訂該公約者，爲的想避免人家誤會它的和平政策。莫斯科宣稱，巴黎公約不但不能增加世界的穩定，而且是有害處；因爲這公約會發出無謂的幻想，把世界無產階級所遇的真正的難題蒙蔽了。（註三）實際上這公約的條款太空虛，範圍太廣大，這自然與共產主義的世界發展的觀念不易調和。據共產主義者

（註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消息報。

（註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消息報。

（註三）參看凱洛公約，載在共產國際第三五號，第八至一一頁，一九二八年版。

看來，這公約不過是國際資產階級包圍蘇聯的另一種方法罷了。雖然如此，蘇聯還是耐勞忍苦地建設自己的不侵犯公約的系統。

經濟的不侵犯草約

大家記得，莫斯科爲和平的努力，是蘇維埃外交政策兩大臺柱之一，這個不過是第二個更重要的臺柱——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合作——必然的結果。二者都是蘇聯工業化成功的必要條件。蘇維埃國外貿易常態的發展，假如一遇阻礙，它便要停頓五年計劃的實行，說不定對它還有莫大的打擊呢。當人家提到蘇維埃的吞併政策的時候，許多國家對於蘇聯的出口貨加以不好的待遇，外國報紙和國會也時常恫嚇它。因此，蘇維埃政府提出經濟不侵犯公約於歐洲聯邦研究會（Commission of Inquiry for European Union）。蘇維埃不侵犯公約的成功，給這種公約以相當的鼓勵。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八日，李維諾夫代表蘇聯出席日內瓦的會議，在那兒他宣稱蘇維埃的政策大綱，他所說的話不但是內容重要，而且因爲外表的尊重和直捷，表明他不像從前那樣

令人觸怒和刺激。

他說：『雖然蘇聯的國外貿易受目前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但是我並不希望現時歐洲的兩個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能夠調和。這兩個制度的困難永遠存在。從它的存在和發展的觀點着想，它們永遠會相互攻擊的。不過問題是這樣，這兩個敵對的團體將來會不會有一天變成雙鋒的利器……如望資本主義國肯誠心地幫助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或者叫蘇聯誠心地鞏固資本主義制度，這未免太幼稚了。唯一的問題就是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成立經濟協定，使各方面都能够得到益處。暫時我不談蘇聯有被攻擊的可能性，我只論相當悠久的和平時期。』（註一）

李維諾夫所提出的草約的序文，很值得全部引用下來。『已簽字的國家的代表承認：（甲）要減輕各國所受的經濟恐慌，除停止戰爭以解決國際的衝突外，還須停止一切經濟侵犯——不管是明爭或暗鬥，不管是幾個國家的相互鬭爭；（乙）停止經濟侵犯是各國經濟的和平合作的主要條件——不管各該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是怎麼樣；（丙）停止經濟侵犯，可以杜絕現時的不信

（註一）國聯編歐洲聯邦研究會，第三四頁，一九三一年版。

任，不實在恐怖的空氣。』

不論人家對於李維諾夫的草約的實際價值有什麼感想，但是我們承認，這草約可以表現蘇聯這幾年間所實行的政策。剛才我們所說的莫斯科政策的大綱，足證這草約不是一種空洞的外交手段。自一九三一年五月後，這草約實無可足述。它已交到支會去討論，始終沒看見有什麼行動表現。李維諾夫想盡方法通過一議案，但不成功。至一九三二年十月，日內瓦又重新討論這個問題。

(註一)

改造的問題

蘇維埃的報紙，領袖們的公開演講，和蘇維埃共產黨各團體的議案，都可以證明蘇維埃政府除避免帝國主義戰爭外，對於外交的問題非常冷淡，同時也可以證明政府所持的新態度。自一九二五年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會議批准工業化的政策，認可第一次第二次五年計劃後，俄國越來

(註一)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的消息報。

越注意經濟的問題。雖然每次官廳的會議也報告國際情形和世界革命運動的進展，但是這些報告多是官樣文章，不能引人發生趣味，因為大家所注意的是：新工廠的建設，糧食的供給，集體農場，將來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單就共產主義的理論的發展而論，自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後，實際上沒有增益什麼。俄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既然專門做建設的事業，只好時常複述那些單調的革命的方式罷了。

蘇聯一面很誠懇地希望和平，一面又說什麼『第三時期』，這顯然是非常矛盾。大家記得，『第三時期』——指現在——是各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的時期，結果會引起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反蘇聯的戰爭，和偉大的階級鬭爭。這『第三時期』係共產黨的教義之一部分，所可惜的是他們所希望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尚未實現。爲什麼『不能避免的』帝國主義戰爭停滯了這麼久還不開始呢？關於這問題，斯達林在一九二六年已經有答案。那時候，他提出這個假設，謂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雖然沒有充分準備推翻國內的剝削者，但是它們已經有能力阻止本國不進攻蘇聯。（註）一九三〇年六七兩月，俄國共產黨開第十六次會議時，斯達林更盡量發揮這種議論。

他說：『干涉好像一把兩頭利的軍械，這個東西帝國主義者懂得很清楚。假如干涉進行得很順利，而且能够打敗蘇聯，那他們就這樣幹。但是，假如干涉的結果，會打敗資本主義，那麼他們將怎麼辦呢？……假如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反對干涉蘇聯，甚至罷工以搗亂後方，那他們便怎麼樣處置呢？……凡此種種，都可證明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繼續維持和平的關係。』（註二）因此，該會議通過了一種議決案，謂『蘇聯經濟能力的發展，使資產階級干涉蘇聯時更有危險，尤其是在現時經濟恐慌革命運動發展的時候，使資產階級某集團不得不與蘇聯發生經濟關係。』（註三）在這次會議裏，斯達林又發表一句名言後來各種論文、演講辭、議決案、和軍令都引用它：『我們不要外國一點土地，同時我們的土地也不准人家奪去一點。』（註四）這種言論倒像出於舊式英勇的帝王之

（註一）世界革命的路線，載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體大會報告書，第二卷，第十二頁。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註二）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會議報告書，第二三頁。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註三）前揭書，第七一二頁。

（註四）前揭書，第二四頁。

第六章 向合作之路

一九五

口，絕不像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的說話。

蘇聯領袖們當他們不再無厭地提到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中已失其重要性的信條時，他們對於國際事務希有的關係，就是專一地從事國外經濟合作。甚至紅軍的領袖服洛士羅夫 (Voroshilov) 於一九三〇年五月演講的時候，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拿來討論這問題。自然他也常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並且也盡量恭維紅軍。不過他的軍事演講還是次要的，主要的事情在乎承認蘇聯從和平的邦交裏能夠得到不少利益。(註一) 一九三〇年六月，蘇聯主席加列寧 (Kalinin) 演講時，他舉出幾點來證明蘇聯國外貿易的發展。他說：『從政治上經濟上着想，這事對各方都很重要，因為它擴大商業發展的可能性，同時又鞏固歐洲的和平。』(註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莫洛托夫的演講辭更有益處。莫洛托夫調查了蘇聯國外貿易的進展及其在世界市場上所佔的地位後，便宣稱蘇聯與外國經濟關係的發展，對於一切有關係的方面都有

(註一) 一九三〇年六月七日的消息報。

(註二)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九日的消息報。

利益。『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與各國和平關係經濟關係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這目的——鞏固和平關係，與各國成立經濟關係的目的——是現時蘇聯政策的基礎。尤其重要的是，莫洛托夫演講辭最後幾句。他說：『在一九二七年的經濟會議裏，我們的代表曾發表下述的言論：「社會主義不但是是一種經濟上社會上平等的制度，頭一點是，它即是和平。現時兩種經濟制度的對立，並不妨礙二者之間的調和。」我們相信，以政策而論，蘇維埃政府這種態度是對的。我們說在歷史上某階段時間內，兩個原則不同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能够同時共存，我們這話是根據某種推論而說的。我們知道資產階級也有這種推論。我們的推論是，在某時期內，我們必需好生利用機會，以達到最後的勝利。而我們敵人的目的則在消滅蘇維埃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兩個團體現在短兵相接了。我們的目的是要在蘇聯裏成立社會主義，並且為共產主義，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主張的最後勝利，而繼續奮鬥。』（註一）這次演講，大博聽衆的喝采。

莫洛托夫在蘇維埃第六次會議沒有閉會前的演講辭裏，又複述蘇維埃政策的基本原則。他

（註一）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一至十二日的消息報。

說：「我們的基本職務是要實踐五年計劃，和確定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這決定了蘇維埃政府的內政和外交。我們的口號還是一樣——爲維持世界和平，鞏固蘇聯與各國的和平關係而奮鬥。」

(註一)

再引用這樣的言論是很容易的，不過沒有什麼用處。在本章的開頭，我們所提的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三年一月演講辭，大體與二十個月前他的演講辭相似。自工業化的時期開始後，蘇聯的外交政策完全給五年計劃遮蔽了。

其他前進的步驟

德國有一句格言，非議某甲的人，一定會非議某乙。自「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被接受後，蘇聯與世界革命的路線便分離了，並且使蘇聯逐漸與階級的敵人作密切的友誼的合作。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李維諾夫在日內瓦裁軍會議裏的演講，很可以代表蘇維埃政府

(註一)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四日消息報。

的意旨。那時候，日本提出種種議論以擁護自己的滿洲政策，李維諾夫則逐一把它駁倒。據李氏的意見，日本犯破壞國際協定的罪狀十餘條。（註一）蘇維埃的代表這樣責備日本爲國際的罪人，令日內瓦的聽衆感覺很有趣味。

大家記得，蘇維埃之擁護國際公法，並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因爲莫洛托夫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已經發表同樣的意見。李維諾夫在日內瓦的演講之所以有趣味，實因莫斯科之重視這問題。一九三三年二月八日，消息報的社論裏說它是「人民的安全和獨立權的特許狀。」該報敘述蘇維埃的希望，謂安全是到裁軍之路——這就是說，接受法國的提議，謂先求安全，然後裁軍。自然蘇維埃的宣言並不是說完全承認現時的疆界，因爲這些疆界是不能代表國家的利益的。不過疆界的變更，應該出於協定，不必擅自宣戰。尤其重要的是下述的蘇維埃政府機關的言論：「李維諾夫的宣言的目的，不但要阻止人家之干涉革命的國家，而且爲蘇聯起見，情願不干涉那個反革命的國家。」杜蘭特先生按：李維諾夫曾替蘇聯允許「不採積極的行動，假如德國、波蘭或羅馬尼亞發

（註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紐約泰晤士報。

生革命運動的話。消息報這種評論實在沒有別種解釋法。」（註一）我們充分同情杜蘭特先生的推論，因為世界革命非常的態度，是與俄國共產黨的行動不符，並且蘇維埃政府不能同時毀滅資本主義，而又與之合作。莫斯科必需選擇一條路。至於它所擇的路線，已經在消息報評論李維諾夫在日內瓦的演講辭裏說明得很清楚了。

第三國際

假如莫斯科當真放棄世界革命的活動，而且願意這樣正式宣言，那麼問題便發生了，世界革命大本營的第三國際到底處什麼地位呢？這答案已見於我們對共產國際綱領的分析中，這答案證明共產國際已逐漸變成世界的團體，它的主要目的，在乎擁護蘇聯，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遺留下來的革命語法還時常使用。這事情的真意是，第三國際已大受蒙蔽了。我們曾指出，蘇維埃的報紙和公開討論已經不甚注意國際事件。共產國際也遭着同樣的運命，關於它的活動，在蘇維

（註一）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紐約泰晤士報。

埃各團體的報紙和議決案裏，已不常見了。自一九二八年後，共產國際的會議也沒有開。它的組織固然繼續存在，並且做一點例行的職務，但是，如托洛斯基所說的一樣，共產國際現在只是別的政府的一部分，它的工作只有雇主注意。我們可以說，俄國共產黨的黨員也不得過分注意國際勞動運動了；報紙上關於國際勞動運動的問題的消息，大抵和戰前差不多。（註一）從前蘇維埃的雜誌的大部分篇幅都登載世界革命快要降臨的問題，這時代已經過去了。近年來的第三國際，如大戰後所發起的許多國際團體一樣，到處皆是；在日內瓦湖畔，國際的團體更不斷地增加。這些團體並沒有做過什麼大事情，它們的職權好像它們的名稱一樣，只令局外的大眾莫明其妙而已。

雖然第三國際的活動已經失去從前的光輝，但是他們還是有活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還照常開會，嚴重地討論世界革命的進展，一似世界共產主義的衛城莫斯科不必變更一般的方針一樣。一九三二年秋天，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大會在赤都舉行，討論的結果非常的滿意。可是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消息報——並沒有登載該會議所接受的『論文和議決案』。這東西在一九

（註一）托洛斯基：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第三九七頁。

三二年十月十一日的真理報上佔了重要的地位，奇怪得很，該報是從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道報——翻印出來。莫斯科之所以採取這方法，爲的叫人知道蘇維埃和共產國際間沒有隔膜。但是爲什麼執行委員會的議案不直接登載於真理報上，偏要從法文報轉載下來，這事情我們實在不能解釋呢。

關於這問題，真理報發表了一篇相當要緊的論文，說明「論文和議決案」，「對於國際革命運動非常的重要。」這些話說得不甚適當，它們只因襲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的一貫用法罷了。爲充分瞭解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政策起見，作者將不辭艱苦，把那些繁重的紀錄作個簡述。「資本主義穩定的結束和蘇聯的發展的論文」複述資本主義迅速地解體的理論，及蘇聯的經濟改造對於這事情的重要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已進入尖銳化的階段了；革命運動也發展了；資本主義間的相互矛盾正在增加，經濟戰爭和努力軍備便是這種矛盾的證明；此外，資產階級的團體更積極準備干涉蘇聯。金融資本的集中，利潤總量的低少，使爭奪市場和勞資衝突更嚴重化。這一切條件自然會引起各國間和各階級間的相互鬭爭。那篇「世界新戰爭的論文」是討論行將實

現的鬭爭，這鬭爭已經發起於遠東，但對於美、日、英都有直接的影響。「帝國主義的戰爭恐怕會變爲內戰，同時因爲殖民地暴動的威脅，使資本主義者不敢擅自干涉。」那篇「資產階級國家主義，法西斯蒂主義，和社會法西斯蒂主義獨裁制的論文」否認資產階級政府一切反動的趨勢，本來這種趨勢只是表明各政府之怯弱無能罷了。經濟恐慌鼓勵極端的國家主義的發展。法西斯蒂主義，和社會法西斯蒂主義，不外是資本主義的忠僕。主張國家統制各種工業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不外是勞工階級的叛徒。他們的勢力逐漸消沈了。那篇「革命高潮和準備爲無產階級獨裁制而奮鬥的論文」是詳述世界各地革命的發展：如中國、西班牙、波蘭、德、英、捷克、法、比、印度、日、美各國時常都有罷工，和退伍的軍人、農民、失業者的遊行示威。最近十六年來，共產主義運動在許多國家都很得手，如德、中、波、捷、西和芬蘭等國。該論文宣稱，「雖然共產黨對於各國羣衆還沒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從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看來，共產黨已經表明自己是無產階級真正的革命先驅。」世界革命暴發的時間快到了，所以我們必需充分利用這機會把羣衆盡量「布爾希維克化」。爲達到這目的計，各國共產黨的義務應該要與全體工人，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的工人組織、工團和失

業者發生密切的積極的關係。共產黨應該製造具體的流行的口號，應該從下層建設起『聯合的勞工戰線』，應該鞏固自己的黨的組織，應該準備應付任何危急的事變。那篇『各國共產黨最近的目的的論文』定了下列的原則：反對法西斯蒂主義和反動份子！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及其干涉蘇聯！要達到這種目的，最好的方法是準備羣衆的政治罷工，藉以聯絡無產階級的鬪爭。該論文接着便考察每個國家的共產黨應該遵從的政策。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大會，實際上對於前人的思想並無增益。真理報張大其辭，謂那次會議的議決案爲『對於國際革命運動非常重要』，這正可以證明第三國際衰落的象徵。假如有人想根據共產主義理論的死文字來評論蘇聯的外交政策，那麼第十二次大會的論文的確有很多材料。這種宣言，是與蘇維埃政府在莫斯科和日內瓦所發表的合作政策，全不相同。這些異同的地方，我們不能把它減少，因爲我們現在所注意的是言論不是行動。記得美國研究蘇聯問題很有資格的學者杜蘭特先生曾注意這種『奇怪的似是而非之論』，謂『布爾希維克的衛城 (Kremlin) 現時看歐洲革命運動的發展反非常焦急。』(註一)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如有人肯耐心地跟我們討論這個『奇怪的似是而非之論』也許會感覺這議論雖然似是而非，但倒不甚奇怪。自這次經濟恐慌開始後，蘇聯常常把自己經濟的進展拿來與資本主義經濟的蕭條相對比。如真理報所說的一樣：『當資本主義國家陷着經濟恐慌的時候，只有蘇聯能够倖免。』（註二）蘇聯希望第二次五年計劃成功後，自己能够在工業發展上坐着歐洲的第一把交椅，而本國也不必再輸入歐洲的機器和工業的用具了。俄國共產黨第十七次會議有一條議決案說：『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正可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我們發現有幾百萬工人失業，和幾千萬農村老百姓的極端窮困。在蘇聯裏，我們沒有失業，貧窮也漸漸減少，工廠一天只做七小時的工作，城市鄉村勞工階級的生活也時有改良。』（註三）大凡研究蘇聯經濟發展的人自然都明瞭這種興盛的情形，不過與外國完全脫離經濟的依賴，還是將來的事情。我們知道現在蘇維埃的領袖們再三再四着重國際經濟合作的必要，五年計劃，及作整個工業化

計劃的『主要人物』都把蘇維埃出口的總量拿來作根據；這樣，他們可以決定到底可以輸入多少必需的東西。出口的總量自然要靠世界市場的購買能力和國際貿易的流通。蘇聯謂自己能够免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這種誇張的言論實等於空洞的宣言。其實，在現時的情形下，叫一個國家能獨自繁榮，未免近乎幻想。固然在理論上，謂一個擁有多數人口，儲積相當富源的國家，儘可以實行自給自足的國家經濟，與世界各國脫離關係，恰如個人一樣，他儘可在理論上想象自己可再過漁獵時代的自給自足的生活，不必求助於他人。在這兩種情形下，只要受莫大的犧牲，才能够過那種自給自足的生活，如降低現時的生活程度，和拒絕現代文明的一切東西。不管是好是壞，世界各國必須共存共榮，假如大家能承認這事實，那前途誠大可樂觀。

我們敢說蘇維埃的領袖們現時沒有什麼幻想。杜蘭特先生說得好，『莫斯科現時預覺歐洲

(註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紐約泰晤士報。

(註二)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的消息報。

(註三)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會議報告書，第二八〇頁。一九三二年莫斯科版。

無法避免災禍。蘇聯不但不想發動革命，而且很熱心地以誠懇的態度來共同撲滅經濟的不景氣，因而恢復經濟的秩序。」（註一）因為有這個結論，我們才作整個的分析。（註二）

（註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紐約泰晤士報。

（註二）當本書的原稿付印之日，正值六個英國工程師和三十五個俄國人因偵探、賄賂、罷工被控的動人的案件開審之時。大家記得，這六個英國人都是首都維克斯公司（Metropolitan-Vickers Company）——一個在俄國做發電機器和渦輪的英國公司，它的歷史大約有十年之久——的職員，於三月十一至十二日在莫斯科被蘇維埃的政治警察逮捕去的。其中二人——蒙克霍斯和諾特華爾（A. Monkhouse and C. Nordvall）——於三月十四日即釋放；其他三人——桑頓（W. H. Thornton）、葛趨尼（J. Gushny）和格里高來（A. L. Gregory）——則於四月四日被保釋。只有一個被告的英國人麥克唐諾（W. L. MacDonald）在審判的過程中總是關在監獄裏。這次審判自四月十二日起至十九日才止。格里高來免受責罰。蒙克霍斯、諾特華爾和葛趨尼則被逐出俄國，為期五年。桑頓判定徒刑三年，麥克唐諾二年。桑麥二人都呈遞悔過書。當開審的時候，桑氏否認自己的悔過書，因為他寫悔過書時，完全受『道德上的縛束』，但麥氏則始終堅持到底。

關於這次動人的案件的性質及其真正的動機，現時很不容易發表什麼意見。假如有人不承認英國工程師的罪狀的話，那麼桑麥二人的悔過書更令人莫明其妙。另一方面，大家記得，蘇維埃罷工的案件非常的合法，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庭上從沒有看見過。法庭對英國被告們的寬厚，與平常蘇維埃的嚴厲正成一個對照。六個犯死罪的被告中，五個人在開審以前還能夠逍遙法外，這是任何法庭中空前未有的情形。這次的判決確是很寬大了，一人釋放，三人受普通放逐的刑罰，只有兩個人坐牢。假如以案情的輕重而論，那麼這兩個人坐牢的時期可以算很短促了。據美國報紙的報告，這兩個被囚的英國工程師，特別受優待，並且享受一切特權。不管案件的起源是怎麼樣，但是這一切經過都可以證明蘇維埃政府還沒有放棄這幾年來與資本主義合作的政策。截至執筆時止（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桑麥所提出的減刑起訴書，還沒判定，這也可以證明英俄恢復邦交的一種方法。（參看附錄）。

當倫敦一知道這判決書的時候，英國政府即禁止各種蘇維埃的貨物入口——約佔蘇聯輸入英國的貨物總數百分之八十。蘇維埃政府為報復起見，三天之後便封鎖英國貨，和英國的船隻。關於此事，蘇維埃外長李維諾夫發表了下列的一篇有趣味的言論，討論蘇聯與外國的貿易關係所根據的原則。「自俄國與外國交通往來，我們的國外貿易政策所根據的基礎絲毫沒有變更，就是將來也不打算變更。這政策是根據：（甲）與世界各國發生經濟的關係，尤

其是於主要的國家發生經濟的關係，不管它們的社會政治的制度是怎麼樣；(乙)爲實踐商業上財政上的義務起見，訂約的各國得增加利益和信任；(丙)有貿易關係的各國間，須防止政治上的騷擾，藉以維持商業關係的穩定；(丁)有貿易關係的國家，得自由派遣代表，以履行貿易上所需要的常態的職權；(戊)有貿易關係的國家的政府代表和公民，須維持法律的關係；(己)外人須遵守住在國的法律。入口的伸縮性是蘇聯的特點。關於我們入口的伸縮性，大家須記得，入口不但可以盡力擴充，而且可以盡量縮少。』(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泰晤士報)。

兩難

假如我們把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三年的年頭，蘇聯的對外關係及其主要的思想作個鳥瞰，那麼我們便遇着很奇怪的情形。我們知道有一批專門的革命家，因爲經濟、社會、政治的情形之同時變動，逐漸變爲這個偉大帝國的首領。起初他們作世界革命運動，如今他們又負起一種大責任，想在這貧困的落後的國家裏建設將來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這次轉變的樞紐，在於斯達林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之被接受。這班工廠的建設者，這班實際上計劃大

規模的集體農場的領袖們，這班咀咒宗教爲庸俗迷信的共產主義的審判官們，都是信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革命的理論。他們的理論曾被修正，以適應一切新的情形，可是蘇聯的實際政策與共產主義的教訓，其間真判若鴻溝。不過，只要蘇聯還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它永遠不會拒絕世界革命的理論的。由資本主義很和平地進展到社會主義，實在沒有這麼一回事，這種轉變必須以階級鬭爭，和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強暴手段置之實現。

研究俄國情形的學者，如想把握住蘇聯在國際政治的真意義，一定會陷於兩難之地。一方面，蘇聯想以誠懇的堅決的努力，把俄國的羣衆從過去愚蠢、貧窮、痛苦、不幸的狀況中拯救出來，使他變成有思想有知識的人類。我們覺得，他們想達到這目的所用的手段，似乎不健全和令人生厭。我們也許可以說他們的努力會歸於失敗。不過這目的的本身——取消人類之相互剝削，設立一個沒有痛苦不幸的社會——就是反對共產主義理論的人也應該努力。過去十餘年間，蘇聯的政策，只在進行這目的，可是我們要複述一句，它的政策我們是不贊成的。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他們有多少迂腐的理論，如階級鬭爭，資本主義「無法避免」的崩潰，內

戰，殖民地暴動，和無產階級獨裁制等不妥協的言論——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一切苛酷的可怕的革命字彙。我們既然要與世界發生密切的合作，同時蘇聯又叫我們以一切方法來擁護它。我們必須先經過無產階級獨裁制長期的痛苦的生活，和犧牲我們所愛好的一切東西，然後才能夠過着千年太平的日子。

上述的兩種情形，到底那一種能夠代表現時的蘇俄呢？它的代表是誰？可不是留着鬍子穿着黑道袍的德國教授和那位發明世界革命情形的具體計劃的列寧麼？或者還是年青的工人和農民？可不是那班想避免舊時俄國鄉村的痛苦，盼望征服——雖然不必要用武力——全世界的年青男女們麼？

附錄

七月初有兩件事情與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有關，可惜已經來不及加上去。但是，我覺得讀者們也應該加以注意。

第一件是，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蘇聯、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伊索尼亞、立陶宛和芬蘭（註一）等國在倫敦簽訂不侵犯公約，這就是末章我所討論的合作政策進一步的表示。

第二件是，關於首都維克斯公司的兩個工程師因在俄國監獄的事件，經西門爵士（Sir J. Simon）和李維諾夫的商議後，已告一結束。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倫敦外交部發表下列的言論。

『蘇維埃公使照會我們的外交部長，謂桑吞和麥克唐諾二君——本年四月判決他們處有期徒刑三年和兩年——的請願書，已經遞到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之前了，現在判詞已更改，所

（註一）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的法國泰晤士報。

以這二位得馬上離開蘇維埃的領土。他們今晚使得釋放。同時貿易委員會也不再封鎖英國的入口貨了。

『今晚倫敦官報 (London Gazette) 登載皇上今天會議時，宣布取消本年四月十九日禁止俄國入口貨的法令。』

『因為首都維克斯工程師被捕所生的英蘇貿易關係上的阻礙，現在必須馬上設法恢復。』
(註一)

三月十一日的不幸事件的解決法，恰好和上邊我所提出的情形很相同。
這兩件事情的發表，正可證明我的末章的結論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四日於巴黎。

(註一)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泰晤士報 (倫敦)。

譯後

譯者介紹本書的原因，已在「譯者序」中說得很詳細。惟本書內容是說明蘇聯當局鑒於世界革命不易立即實現，不得不放棄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而樹立斯達林的「在一個單獨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引錄共產國際綱領第三國際歷次宣議決案，和共產黨內重要人物的言論很多。我們如細閱一遍，就可發現蘇聯當局許多荒謬的見解，誇大的言論，怪誕的夢想，錯誤的觀察，矛盾的主張，以及第三國際赤化歐洲和東方的陰謀。讀者若不推究體驗，難免爲所矇蔽。茲爲審慎起見，將其中比較重要各段，特別提出，或引伸著者的原意，或發抒譯者的管見，一一加以按語，俾供讀者的參考。

第一章

「但是，假如世界革命和推翻資本主義的世界這兩件事情，是迫切而又快意的話，那麼現

時蘇維埃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合作的政策，應該怎樣解釋呢？……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是不是出賣共產主義的呢？（第二頁）這就是共產主義者所常用的辯證法。辯證法的難題，不在理論的深奧，而在實際的應用。說起應用，問題便發生了，因為同一事實，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張三說他的看法很對，李四說他的看法也不錯，朱五說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經來臨了，陳六說現時還沒有成熟，各人各擁護自己的主張，結果誰是誰非，一時也難斷定。蘇聯的領袖們對於這些矛盾的事實，很難有滿意的答案，而且引起了黨內嚴重的爭論。

「……共產主義能得羣衆忠誠的全副精神的幫助，因為它允許他們將來有更好的生存，而資本主義的世界常見的不平等、痛苦、不快樂、卑鄙等事情都消滅了……」（第四——五頁）共產主義果真能爲人類謀更好的生存，而將一切不平等、痛苦、不快樂、卑鄙等事情都能消滅嗎？中國民衆這幾年來所受共產黨蹂躪的痛苦情形，是個很顯明的反證。

「……在共產黨的討論裏，從來沒說過列寧有什麼錯誤，或者不能預見未來的發展。他的著作是一切靈感的來源，任何新的政治情形，都以他的著作爲最可靠的嚮導。他的地位超過馬

克思和恩格斯，因為他是現世界和未來世界的先知，他是惟一的真理的源泉。」（第七頁）這個精神，分明是帶宗教的意味，把列寧視爲神聖的偶像，充分表示共產主義與宗教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證明蘇聯已經發起真正宗教的崇拜了。

「……布哈林不但是本黨內最有價值的最重要的辯證法家，而且應視爲全黨內最可愛的人；但是他的理論的觀點，不能認爲是真正馬克思的觀點，因爲他還帶一點迂闊的意味，我想他一定沒有受過辯證法的訓練，並且不能充分瞭解……」（第一二頁）這是列寧批評布哈林的話，前後顯然矛盾。一個人既沒有受過辯證法的訓練，又不能充分瞭解它，然而這個人偏能做黨內最有價值的最重要的辯證法家，要明瞭這件事情，實與應用辯證法一樣困難！

「……列寧的信徒相信資本主義崩潰臨頭，而且完全知道會這樣，所以他們老是愛談將來的事情，尤其是愛談最近的將來的事情……」（第一三頁）利用未來的事情作政治上的討論，使人生出美麗的幻想，以爲將來會過舒服的日子，尤其是這種好日子，可以一捉即到，或者近在身邊，使人避免現時不如意的情形，和忘記現時的失望艱難，這是共產黨騙人的巧訣。但是

因爲預期的不能實現，使人發生很大的失望，也是常有的事。

『……不斷革命的理論含有三種思想：（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便取消民主革命；（二）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社會便逐漸變動；（三）社會主義的國際性……』（第一九頁）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與斯達林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處了相反的地位。當歐洲和東方共產革命失敗之後，蘇聯不得不暫時放棄世界革命的政策，從事於社會主義的內部建設，托氏的「不斷革命論」現在被視爲「異端」了。

『……它們完全取消「民主」獨裁的可能性。無產階級獨裁，是惟一可信的實際的方式』（第二三頁）這是一種抹殺事實的偏見，就拿蘇聯革命來說，也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在一起的。

『據托洛斯基的意見，在國際的方面，不把無產階級獨裁的原則爲惟一可能的方式，使斯達林和第三國際在組織，指導，贊助各國，尤其是東方革命的暴發等事情上，完全失敗。照他看來，最大失敗的例子，是莫斯科的共產黨對中國的政策，及中國革命的相繼沒落。』（第二四頁）

托氏指出蘇聯當局和第三國際的種種失敗是事實，但他對於中國革命，卻沒有十分研究。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中國國民黨的偉大的領袖孫中山先生所發明的三民主義，是中國革命唯一最高的法則。蘇聯及第三國際想用種種方法，硬把中國赤化，這是不可能的。戴季陶先生說：「第三國際之策略，係使中國先亡國而後革命；先教民死，而後再作共產之企圖；先犧牲國家之存在，及民衆之生存，以鞏固第三國際之基礎，而後圖世界革命之成功。」由此可見共產主義革命和三民主義革命的區別，共產黨在中國的失敗，正可顯示中華民族自信力的堅強，國民革命基礎的鞏固。

「……要成立民族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而犧牲世界革命，不但是出賣共產主義，而且也是自殺的瘋狂的政策……」（第二五頁）這是托洛斯基批評斯達林的政策，也是共產黨領袖間對於世界革命理論所見不同的地方。據托氏的意見，世界革命如終於不能實現，則蘇聯想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必將自陷於不可避免的沒落。

第二章

「……一九一八至一九九年的歐洲，滿藏着炸藥，俄國革命的成功，恰如星星的火花一樣，會引起世界的大火……」（第二九頁）這是一九一八至二〇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普遍態度。後來歐洲和東方革命的相繼失敗，證明這完全是一種夢想。共產黨類此的夢想是常有的。

「據說有一次喬治路易曾說過齊諾維夫的演講是他的勁敵……共產主義是有科學的理論，它的政策是根據客觀地公正地研究現存的情形；所以它比其他一切制度下政治經濟的理論都佔了極大的便利……」（第三六頁）這是多麼主觀的誇大的論調！共產主義果真科學的理論嗎？它的政策純粹根據客觀的公正地研究現存的情形嗎？這些都是疑問。所以齊氏對於這種主張的證明，也沒有什麼貢獻。

「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產生了……我們現在執筆寫這幾行文章的時候，第三國際已經有三個蘇維埃共和國當做它的基礎，但是當這篇文章拿去付印時，我們不只有三個，而且有六個以上的蘇維埃共和國，對於這種奇蹟，大家也不會驚異。舊歐洲迅速地趨向無產階級革命……所以我們敢堅決的說，十年內共產主義已經用不着在歐洲奮鬥了，因為

在這一年間，整個歐洲將變成共產黨。共產主義的鬭爭，將移至美國，或亞洲及世界上其他的部分。」（第三七——三八頁）這是齊諾維夫的荒謬的誇大的觀察。自一九一九年到現在已經有十五年了，而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還不過蘇聯一個。第三國際對於西歐和東方共產革命的計劃整個失敗，蘇聯只好回頭來從事於國內的建設了。

「無產階級獨裁是當今整個文明世界的秩序。……第三國際的基礎是奠定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沒有一種建築比它更耐久。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下，勞工階級在整個世界都勝利。」（第三九頁）這又是齊諾維夫的怪誕的夢想。蘇聯自斯達林主義勝利後，世界革命的政策，早就擱置，第三國際顯然從世界革命不妥協的戰鬪的總機關，降為擁護蘇聯的國際組織了。它現在不過是供蘇聯玩賞的點綴品，當然更談不到領導全世界的勞工階級了。

「……凡是大革命，一定會影響到全世界，取得無產階級的同情，奪回帝國主義的武器，以發展到世界革命。……同時也是世界革命發展的問題。」（第三九頁）這是布哈林的論斷，和齊諾維夫同樣的陷於不符事實的錯誤。

「……工人只信託自己的領袖，我們與資產階級毫無妥協的餘地，反之，只在莫斯科政府和莫斯科國際的領導下，爭取最後的勝利。」（第四三頁）這又是一套哄人的老調。莫斯科政府和莫斯科國際領導工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欺騙工人。

「……然而，事情並不是這樣，所以各國也許要走俄國自一九〇五至一七年的革命所經過的路線，假如它們要知道怎樣領導無產階級的羣衆的話。」（第四四——四五頁）這是沒有注意到主義的時間性和空間性。各國的環境，因時因地而不同，在任何情形之下，沒有一定要追步蘇聯後塵的理由。

「……齊諾維夫宣稱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全在領導羣衆，不要等羣衆來推動它。……我們已經等了好久，勞工階級已經等了好久，殊死戰的時期現在已臨頭了。」（第四七頁）共產黨果能如齊氏所言的去做麼？它們在各國的行動，不是領導羣衆，而是奴隸羣衆，以羣衆爲工具。現在全世界的勞工階級，大都已覺悟了！

「……共產國際的目的，是以一切有效的方法——包括武力——來推翻國際資本主義，

設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以達到國家完全消滅……」（第四八頁）這完全是一種空幻的理想。蘇聯和共產國際經多年失敗的教訓，已從沈醉的迷夢中，慢慢地醒覺過來了。

「……共產國際以蘇聯的主張爲自己的主張。國際無產階級非達到蘇俄會復成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聯盟裏的一員，定不停止作戰。」（第四九頁）現在蘇聯已經轉變方針，遵奉「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新理論。共產國際和國際無產階級也該放棄以前的主張了罷！

「……從地理上看來，無產階級是從東方方向西方移。無產階級革命這種趨勢現在已經確立了……」（第五〇頁）齊諾維夫曾經這樣宣稱。不過事實上非但沒有無產階級從東方方向西方移的現象，而且東方各國的無產階級也並不贊成共產主義的革命。

「……東方社會關係的非常複雜，封建制度和氏族家庭組織的存在，正是共產主義的領袖們認爲最有希望的地方。」（第五一頁）這又是錯誤的觀察。東方社會組織的特殊和社會關係的複雜，正足以證明不能適合於俄國所實行的共產主義，中國是一個例子。

「第一步工作是要向東方的人民證明蘇聯不像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它是他們真正的朋友，它很關懷他們的福利，自己並不貪什麼東西……」（第五一頁）這是一種笑裏藏刀的手段，欲取先與的策略。蘇聯不是對於中國也有過同樣的表示嗎？中東路外蒙新疆的警耗，是它的實際的禮品！

「布爾希維克與資本主義和地主鬪爭，他們對這種事情有什麼感想？」齊諾維夫問一個出席東方人民會議的一個土耳其的教授而又做「團結與進步」派的代表。他的回答是：「這種事情土耳其人不感興趣。」（第五二——五三頁）從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土耳其人對於共產主義的觀念。他們向俄國唯一的要求，只是武力，不是赤化！

「這會議決定設立的永遠的組織，不消說是失望了……而東方人民會議會正式稱為「第一次會議」以後沒開第二次會議……」（第五三頁）從這樣不景氣的現象，我們很可以預測蘇聯領袖們所號召的世界革命的前途了。

「……實際上俄國共產黨是統治蘇維埃政府和第三國際，所謂第三國際不依賴蘇維埃

政府者，只是法律上空洞的想像罷了。」（第五五頁）的確，第三國際純粹是蘇聯的產物，所以惟有一切聽命於蘇聯。

「……蘇維埃政府不承認自己與第三國際的關係，這豈不是離開現實的世界，跑到幻想的世界麼？」（第五六——五七頁）這是一個很嚴正的批評，誰也不信蘇聯與第三國際沒有密切的關係。

「……在另一方面，他很耐心地解釋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是與資本主義的相反，因為前者是擁護被壓迫羣衆的利益，尤其是擁護殖民地自決權的利益……」（第五八頁）這又是騙人的話，我們在任何場合，並沒有看見它怎樣擁護被壓迫羣衆的利益，或殖民地自決權的利益！

「這種忠告的真正價值，直到布爾希維克革命的「草創」時期過去之後，纔充分地受人賞識。資本主義的國家不但能够抵受共產主義的進攻，而且沒有很大的損失。以宣傳的方法來實行革命，顯然是不够……」（第六一頁）這段顯示第三國際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弱點，以及世界革命的迷夢所以幻滅的根本原因。

第三章

「……民衆很熱心地歡迎我們的軍隊，他們已經吃過布爾希維克的虧，所以只希望能夠安居樂業……」（第六三頁）這是烏蘭格爾將軍一方面很坦白地說出他們軍隊的弱點，一方面敘述俄人在革命初期對於布爾希維克的觀念。

「……蘇聯之能夠存在，並不見得能夠賠償先進國家和東方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一九二一年，「蘇維埃政府」這個名詞不能再作多數的稱呼了……」（第六五頁）著者歷歷指出世界革命失敗的事實：匈牙利柏拉坎的共產主義的統治，於一九一九年夏天失敗了。德國革命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不與東鄰合成一個「難於克服的革命的團體」，反而與協約國相提攜，這未免是一種大失望。霍因索羅倫和哈伯斯堡皇朝的推翻，與更大的失望相較一下，只算一種很冷淡的安慰。中歐的國家雖然經過戰後所發生的痛苦，但它們的民主革命很難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無情的事實，不問第三國際的領袖怎樣預言，把他的言論的效力全部取消……」

(第六七頁)著者認爲第三國際領袖的預言絲毫不能實現，而且提出許多實證：英國的行動委員會，並沒有設立一個第二政府，與衛斯民士特的國會同時行使職權。意國不但沒有變成共產主義的國家，反而產生法西斯蒂這種新理論，與布爾希維克做勁敵。奧國雖然受和約所加的經濟上的困難，但它寧願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掙扎，不肯受莫斯科的領導。巴爾幹革命也不能實現。種種事實告訴我們：「世界革命」已經成爲過去的名詞了。

「自一九二一年春天實行所謂新經濟政策後，便放鬆中央集權制，恢復市場，准許個人得在國內做生意，鼓勵私人創辦工業，徵收農民的穀稅而不把它全部沒收，這樣一來，戰時共產主義所產生的不能容忍的情形便告結束……」（第六九頁）新經濟政策的實行，至少可以證明蘇聯因爲共產主義的行不通，已經恢復了資本主義的形態。

「……列寧繼續說，莫斯科的政策早已準備與外國成立和平的關係。在這一方面的重要步驟，是准許外國資本主義者租借土地，假如沒有他們的幫助，俄國的經濟改造實不堪設想。……」（第七一頁）俄國的經濟改造，必須要外國資本主義者的合作，這與社會主義的理想

和世界革命的政策，發生多大的矛盾！

「……加孟涅夫宣稱，……爲達到共產主義的最後目的起見，參與一點資本主義以改造俄國，也是很必需的。」（第七三頁）加氏承認社會主義的蘇聯，必須資本主義的歐美去改造，這是很滑稽的一件事。這種矛盾的理論，在蘇聯領袖的言論中，和它所實施的政策中，常常可以看到。

「……總之，我們的路線是健全的。從前的失敗，是由於事前沒有看清路線的變遷，可是我們現在已覺悟了……」（第七六頁）誇大的言論，錯誤的觀察，不正確的估計，是蘇聯領袖們的通病，也是使他們失敗的最大原因。犧牲了無數人民的生命財產，所得的教訓，是「沒有看清路線，現在已經覺悟了！」

「……但大家仍相信大部分的法國民衆很同情共產主義……」（第九一頁）法俄的接近，純粹是根據國際利害的關係，絕不是法國民衆同情於共產主義，否則法國也將實行布爾希維克革命了！

「……總之，我們會把世界發展客觀的趨勢作個精確的分析，不過我們對「時間」的估計，並不見得完全都很對。……我們很不幸，我們誤斷了「時間」的兩種可能性。我們不但誤斷了革命產生的時期，而且不知道有退卻的機會……」（第九四頁）這是共產國際的主席齊諾維夫自己承認過去失敗的原因。當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議的時期，列寧也相信許多歐洲前進的國家裏革命的勝利，只是兩三個月內的問題。有一時期，蘇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以為德奧事件的進展，只是幾個鐘頭內的事情。不消說，這種觀察都錯誤了。共產黨的幼稚病，可以拿齊氏所說的話來描寫：「我們好像沒有經過槍林彈雨的全新的軍隊，既沒有打過仗，又不知道進攻和退卻的規矩，我們不懂空間和時間的定律。」

「……真正布爾希維克黨的基礎是這樣：（一）它應該是羣衆的黨；它應該與勞動羣衆發生密切的關係；並且作他們所需要的和所希望的東西的喉舌……」（第九九頁）這又是騙人的話，共產黨在中國的行動完全沒有顧到這一點。所謂到「民間去」，不過做些掠奪和欺騙的事，以達到它的另一種目的而已。

「……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沒有革命的環境便沒有革命，並且每種革命的環境不見得都能發生革命……蘇聯的存在可以繼續把世界革命化，所以從全世界看來，現時是有革命的環境的。」（第一〇三——一〇四頁）要是列寧的見解不錯的話，那末，中國既沒有共產主義革命的環境，當然沒有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的可能。至於全世界各國，從種種事實去推斷，也沒有充分的條件可以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的環境。

第四章

「……一九二〇至二一年，所謂「勞動反對黨」成立了……它給新經濟政策以嚴厲的批評，謂這政策是把布爾希維克黨真正革命的目的完全放棄了……假如無產階級要達到它的目的，第三次革命是必要的。」（第一〇七頁）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蘇聯共產黨內部意見的紛歧，互信的不堅，黨爭的激劇。蘇聯自實行新經濟政策後，共產主義的基礎根本動搖。「新經濟政策是使資本主義能夠站得住，能够在俄國復活。」這是柯倫泰夫人在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裏說的話。

「斯達林承認前世紀中葉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主張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一定不能成功；必須幾個更前進的更文明的國家同時發生革命纔行。這意見在那時代完全是對的。……」（第一一二頁）斯達林反復論述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環境與現在不同，所以從前馬克思派主義者主張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一定不能成功的理論，現在必須修正了。這明明是指主義是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斯達林懂得這道理，所以放棄了世界革命的政策，而專門從事於蘇聯內部的社會主義的建設。那末，我們要問爲什麼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各國一定要接受前世紀中葉的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學說呢？一定要實行俄國式的共產主義革命呢？

「……最後的勝利，必須等世界各國的工人肯共同奮鬥，纔有希望。」（第一二三——二四頁）這是列寧的銳利的觀察。現在世界各國的工人並沒有趨向布爾希維克革命的現象，所以共產主義運動終於得不着最後的勝利，而且到處遇着失敗。

「……大家須記得世界無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有無限的趣味，並且希望它

能够成功。世界各地的大批勞動代表到俄國來熱心研究新的發展……」（第一二五頁）這有些近於虛張聲勢，那是蘇聯共產黨領袖們的慣技。

「列寧又說：俄國的民主革命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得到……除非西方也起來革命。假如沒有這個條件，復辟是免不了的，因為一切私有財產者都是復辟的主要人物。無產階級成功後，小有產者勢必反對無產階級。」（第一二八頁）這是列寧對於蘇聯社會革命前途的預測。現在西方並沒有起來革命，從而可以推知蘇聯的基礎仍然是在風雨飄搖中。

「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討論，大可證明齊諾維夫謂新理論會放棄世界革命和發展新國家主義，並不是毫無根據……俄國共產黨對於內政的問題有一種純粹資產階級的「國家自給自足」的趨勢，這與他們從前想做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嚮導的思想大相反……」（第一三九頁）這是著者對於蘇聯現狀的嚴正的批評。事實上，蘇聯的領袖們也早就放棄想做「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嚮導」的迷夢了。

「……自然托洛斯基和他的朋友們的情形……這種態度現在給人認為反革命的機會

主義……」（第一四三頁）這一段是著者敘述共產黨內兩個敵對的領袖之解釋列寧的學說之分歧。他認為斯達林有些政策在文字上精神上，都違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教訓，不過斯氏從來不承認有什麼違背的行動。

第五章

「世界帝國主義根據地的中國，似乎能够使革命宣傳煽動整個東方。真的，大戰後中國的一般情形給共產主義作活動最適當的場合……不過大家要記得中國的共產革命恰如西歐一樣，沒有成功。一九二七年夏天，鮑羅廷被逐回俄國，他的最高目的沒有達到。現時東方也不肯聽從莫斯科的領導。」（第一四七——一四八頁）這是著者敘述蘇聯對於中國革命的情形。上面說過，中國沒有實行共產主義革命的環境，所以蘇聯和第三國際的陰謀，終於失敗。布爾希維克的領袖們把大戰後的中國看做共產主義活動最適當的場合，這是和估計土耳其意大利的情形一樣的荒謬。中國民衆深受了赤白帝國主義者的摧殘，和國內軍閥政客的痛苦，愈加堅強了中國必須實行三民主義革命的信念，大家集中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下，艱苦奮鬥。中國國民

黨於民國十五年從廣州誓師北伐中以共產黨陰謀叛變，阻撓革命，纔於十六年舉行清黨。現在國軍已將豫鄂皖三省的共產黨根本肅清，川黔殘匪，也如強弩之末，不久即可消滅了。

「這綱領的第六部是略述「共產國際爲無產階級獨裁制而鬭爭時所用的策略。」它開頭便否認一切非共產主義的勞工階級運動如社會民主黨……和民族的過激運動；如孫中山、甘地和格味。這一切運動都是會叛變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他們唯一真正的代表，只有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第一六一——一六二頁）這是極端主觀的抹殺事實的武斷的論調，既不研究各國的革命環境，也不瞭解各種革命運動的真實意義，好像癡人說夢般的胡亂批評。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以全民爲基礎，無產階級當然包括在內，只要讀過三民主義的就可知道。「他們唯一真正的代表，只有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這是共產黨的一種最無恥的大言不慚的革命術語！

「帝國主義的戰爭既無法避免，蘇聯又堅決的不要戰爭……」（第一六九頁）著者對於這種矛盾的情形，表示很大的懷疑，其實，就是負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大部分責任的列寧和

布哈林也不能够充分瞭解。我們始終未見蘇聯的著作家對此有何充分的解釋。

第六章

「蘇聯願意與外國發生經濟關係，並且準備了一切必要的條件……只要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能够相安無事，這種發展是無法阻止的。」（第一八三頁）這是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消息報——所發表的論文。著者認為這意見是很對的，不過蘇聯斤斤焉宣稱全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的話，未免與這意見相衝突了。蘇聯常常發生許多言行矛盾的事實使我們無法瞭解！

「一九二九年張學良搜查哈爾濱的蘇維埃領事館後，便於七月十日佔領中東路……」（第一八四——一八五頁）中東路事件的發生，完全由於蘇聯的侵略政策所致。當時雙方磋商的結果，中東路名義上雖歸中俄兩國合管，但大權實操於俄方。

「……從遠東衝突的第一天起，蘇聯便採取嚴格的中立態度，蘇聯的工人，毫無疑問的是同情於中國的人民……」（第一八六頁）這是消息報對於「九一八」事變的論調。蘇聯素

以援助被壓迫民族的救世主自居，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紙上談兵的態度，惟有使中國的民衆感覺很大的失望。布爾希維克黨的使命，最重要的是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而蘇聯後來竟允許日本在中東路運兵，在在與帝國主義者妥協，近且出售中東路以取媚日本，苟圖本身的安全，這種自私自利的政策與平日所唱的口號完全相反！

「……自一九二八年後，共產國際的會議也沒有開，它的組織固然繼續存在，並且做一點例行的職務，但是，如托洛斯基所說的一樣，共產國際現在只是別的一部分，它的工作只有雇主注意。」（第二〇一頁）自從莫斯科當局擱置了世界革命的活動後，第三國際根本失了作用，誠如著者所說：近年來的第三國際，如大戰後所發起的許多國際團體一樣，到處皆是；這些團體並沒有做過什麼大事，它們的職權好像它們的名稱一樣，只令局外的大衆莫名其妙而已。

「……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正可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第二〇五頁）這不過是蘇聯當局引以自慰的話。誠然，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常鬧失業恐慌，不過俄

人在革命初期所受的痛苦，又是何等的深重！就是現在的蘇聯也未必是極樂世界吧？

『……可是蘇聯的實際政策與共產主義的教訓，其間真判若鴻溝……我們必須先經過無產階級獨裁制長期的痛苦的生活，和犧牲我們所愛好的一切東西，然後纔能够過着千年太平的日子。』（第二一〇——二一一頁）這是著者分析了蘇聯的政策之後，而下的最後的結論：它的手段，是不健全和令人生厭，它的政策，我們是不贊成的。

譯者

国际政治名著



书店
0.50